

中国共产党 对外政策研究

(1921 — 1949)

孙金伟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研究

(1921—1949)

孙金伟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研究(1921—1949)/孙金伟著.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11
ISBN 978-7-215-06345-7

I. 中… II. 孙… III. 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研究-
中国-1921—1949 IV. D8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47232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66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65723341)

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毫米×1240毫米 1/32 印张 8.25

字数 200千字

2007年11月第1版 2007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价:20.00元



作者简介

孙金伟，1965年5月出生，河南省淇县人。现任安阳师范学院政法学院院长，博士，教授。1985年7月毕业于河南大学，1991年、2001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获法学硕士、博士学位。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学与研究。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教材7部，主持和参与完成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5项，获得各类奖励6项。2001年以来，先后被评为河南省高校青年骨干教师、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河南省优秀教师、河南省高等学校优秀党员、安阳师范学院重点学科带头人、安阳市学术技术带头人。

大家一起读 大家一起做

亲爱的读者：

感谢您购买、阅读本书。一本书的写作、出版、传播，离不开大家的鼎力襄助。为了全面、深入地了解您的阅读需要，以更好地为您服务，请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咨询。您的意见对我们极其重要，是我们设计选题的重要依据。让我们携手营造一个书香四溢的社会。

购买的图书：_____

您的姓名：_____ 您的性别：_____

您的职业：_____ 您的学历：_____

您的电话：_____ E-mail：_____

您的地址：_____

1. 您通过何种途径得知本书的信息？

- | | |
|---------|-------------|
| A. 书店 | B. 报刊上的评介文章 |
| C. 他人推荐 | D. 网络 |

2. 您购买本书的原因是什么？

- | | |
|---------------|--------------|
| A. 工作、学习急需 | B. 朋友、同行极力推荐 |
| C. 想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 | D. 与同类书比价格低 |

3. 您将本书看做哪个类型？

- | | |
|---------|---------|
| A. 学术著作 | B. 消遣读物 |
| C. 知识读物 | D. 其他 |

4. 您如何评价本书的内容？

- | | |
|---------------|----------------|
| A. 生动、精彩 | B. 材料较充实，可读性较强 |
| C. 材料较丰富，语言乏味 | D. 材料冗杂，可读性差 |

5. 您如何阅读本书？

- | | |
|------------|------------|
| A. 在工作时间阅读 | B. 在休息时间阅读 |
|------------|------------|

C. 在旅途中阅读 D. 其他

6. 您阅读本书用了多少时间?

A. 3 小时 B. 10 小时

C. 30 小时 D. 一周

7. 您认为本书的定价如何?

A. 很高 B. 较高

C. 合理 D. 便宜

8. 您认为本书印装如何?

A. 精致 B. 尚可

C. 一般 D. 较差

9. 您对本书的综合评价是什么?

A. 难得的好书 B. 物有所值

C. 欠佳 D. 较差

10. 您是否愿意将本书推荐给朋友、同行? (可另附纸)

A. 愿意

理由是: _____

B. 不愿意

理由是: _____

11. 您是否有关于 20 世纪中国思想文化人物、思想文化现象的书稿或写作计划? 如有, 请您与我们联系, 我们会及时、认真地研究。

来函请寄: (450002) 河南省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 蔡 瑛

电 话: (0371) 65788051

电子信箱: caiying2003@yahoo.com.cn

目 录

绪 言	1
第一章 亲苏拉美: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滥觞	7
一、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转变与走向世界的尝试	7
二、中国共产党拉美抗日政策的确立	20
三、中国共产党对苏政策由盲从到自主	39
第二章 亲苏联美: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发展	51
一、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的拥护和对苏关系的淡化	51
二、中国共产党对美新政策的制定与外交新局面的开辟	61
三、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合作的基础	85
四、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合作与冲突	96
第三章 联苏防美: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调整	113
一、中国共产党联苏防美政策的形成	113
二、中国共产党善处对苏关系与争夺东北的斗争	132
三、中国共产党中立美国策略的提出及其实施	143

第四章 联苏反美: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确立	158
一、中国共产党联苏防美政策的终结	158
二、中国共产党对美苏调整对华政策的回应	166
三、中国共产党外交上“一边倒”的战略抉择	182
第五章 历史丰碑:中国共产党发展和处理对外关系的历史经验和历史意义	193
一、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演变原因透视	193
二、中国共产党外交策略思想的主要内容	207
三、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基本特征	221
四、中国共产党发展和处理对外关系的历史经验	230
五、中国共产党发展和处理对外关系的历史意义	238
主要参考书目	249
后 记	258

绪 言

长期以来,在许多人的潜意识中,似乎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以前只有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而没有具体的对外政策和外交实践活动,因为对外政策和外交实践往往反映和处理的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然而历史事实并非如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外来干涉,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一根本目标出发,不仅制定了正确的对外政策,而且大胆地冲破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垄断,跨越意识形态的鸿沟,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对美苏的政党外交和民间外交活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迅速提出并确立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把民主革命时期制定和实施对外政策的历史经验提到新的高度和境界,升华为党和国家的外交政策。

毋庸置疑,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关系及其实践活动是中国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国内斗争与国际斗争相互交织、彼此协调的产物。离开了这一社会历史背景,我们就很难准确地把握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内在实质。

民主革命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逐步从农村

走向世界的重要时期。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相互交错并与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相联系,构成了民主革命时期中国政局发展的主要特点。在这一时期各种政治力量不断地分化组合,各种国际势力都力图对中国内政施加影响。如何妥善处理各方关系,争取有利于中国革命发展的国际环境,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新课题。在国内,中国共产党面对的历史和现实,是民族危机深重,中国政治黑暗。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的枷锁尚未解除,日本的步步入侵又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而掌握国家政权的国民党虽然被迫参加到抗日斗争的行列之中,但它对内没有放弃反共立场,对外依然奉行妥协媚外、受制于人的外交政策。如何把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相结合,冲破国民党政府的束缚和限制,重新建构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让世界了解、认识和接纳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亟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中国共产党与苏联之间既存在着共同的革命利益和兄弟党之间的亲密关系,又存在着矛盾和隔阂。苏联一方面支持中国共产党;另一方面又要求中国革命利益服从苏联民族利益,中国共产党的内外政策适应苏联外交战略的需要。如何把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正确把握苏联利益与中国革命利益的关系,抵制和克服苏联的错误主张和过高要求,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地位,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又一难题。在国际上美国在与中国结盟抗日的同时,又采用各种手段干涉中国内政,以实现其控制国共两党和最终控制中国的目的。如何把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相结合,在对外交往中维护国家主权和革命利益,这对刚刚踏上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无疑是一次严峻的挑战。伟大的实践需要正确的理论做指导,而理论也需要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修正。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和发展起来的。

令人可喜的是，中国共产党已经充分具备了迎接国内政局和国际关系变动带来的挑战的主观条件。综观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中国外交之所以屡屡受挫、蒙受耻辱，其根本原因除了国家的积贫积弱外，就是政府的软弱无能。与旧的统治集团不同，中国共产党有一个坚强的、成熟的领导集体，有一支纪律严明、能征善战的革命队伍。经过国民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的洗礼，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它能够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独立自主地解决各种矛盾和处理各种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国共产党已经具备了登上国际政治舞台的能力，这预示着某个大国、大党影响和左右中国共产党内外政策的历史即将结束。

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关系主要是在国际两大政治力量之间展开的。这两大政治力量是社会主义苏联和帝国主义美国。当中国共产党从农村走向世界之时，正值美苏在中国问题上有合作又有纠葛，对中国内部事务干预达到空前规模的时期。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美苏围绕中国前途和远东国际政治格局展开了激烈的较量和角逐，两国都试图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来塑造中国，把自己放在操纵中国未来发展的主导地位，中国成为两国争夺远东霸权的“竞技场”。美国为了实现尽早打败日本和战后控制中国的双重目标，一方面以允诺苏联在华享有特殊权益为条件，希望苏联在打败德国法西斯后参加对日作战和战后采取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对华政策；另一方面又依恃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力图排斥苏联对中国的染指和控制。苏联为了自身利益和远东安全，则依靠与国共两党的历史联系和参加远东战争的有利条件，努力扩大和保持在华影响和权益。两国在中国问题上有妥协和交易，也有矛盾和斗争。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经历了从战时支持蒋容共到战后扶蒋反共，再到有限支持的变化；苏联对华政策则经历了从战时支持蒋抗日到战后支持蒋限共、

以共制蒋,再到支共容蒋的发展变化。跌宕起伏的美苏关系和美苏向国民党倾斜的对华政策无形中增加了中国共产党制定对美苏政策的难度。当时中国共产党与美苏的关系是十分复杂和微妙的。从对美关系看,中国共产党既要同美国对话,又要对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进行揭露和斗争。从对苏关系看,中国共产党既要维护与苏联的友情,寻求苏联的支持和援助,又要体谅苏联的外交处境,还要善于打破限制,发展自己。因此,在这场斗争中,能否选择正确的外交战略和策略,不仅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外交实践活动的成败,而且直接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

人们常常把外交活动比作没有硝烟的战线,把外交斗争描绘成斗智斗勇的较量。的确,外交本身是一门斗争艺术,是运用谋略克敌制胜的一种手段,其力量和激烈程度并不比战场上的真刀实枪逊色多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处于国共美苏“三国四方”斗争漩涡中心的中国共产党,不畏强权、不怕高压、不等不靠、讲究策略、敢于斗争,独立自主地制定了从亲苏拉美、拥苏联美到联苏防美、再到联苏反美的对外政策,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美苏对华政策中积极的、于我有利的方面,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美苏之间、美蒋之间、苏蒋之间的矛盾和分歧,最大限度地孤立了国民党反动派,争取了有利的军事和政治地位,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准确判定国际政治格局、恰当运用外交策略、妥善处理对外关系、在劣势中求得主动的高超能力。当然,由于国际局势动荡不安、扑朔迷离,加上中国共产党处理国际关系的经验不足,中国共产党与美苏关系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波折。但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确立和实施的对外美苏政策是正确的,成就是显著的。它对于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对于夺取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都起了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对美苏政策从更深层次上来理解,它集中体现在如

何区分国际政治力量,在对外交往中坚持什么原则,如何认识中国革命与世界大国之间的关系,中国革命应走什么道路,依靠什么力量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上。在这些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不仅给予了正确回答,而且以自己的亲身实践作出了表率。试想,如果中国共产党仍然以意识形态划线来区分国际政治力量,那就不可能有实际上的联美抗日的局面;如果中国共产党不能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就不可能有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和自己国际地位的提高;如果中国共产党屈服于大国的压力,放弃自己的立场和奋斗目标,就不可能有后来中国革命的胜利。

历史是一面镜子。当今世界,冷战已经结束,旧的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已被打破,大国之间关系正经历着重大调整,国际局势总体上从紧张走向缓和,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日渐明晰,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两大主题。但世界并不太平,冷战思维仍未消逝,大国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秩序还未得到根本改变。抚今追昔,中国共产党制定对外政策的历史昭示人们:为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国家与国家、政党与政党之间的关系应当严格建立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国际公认的五项原则基础上,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以社会制度异同论亲疏,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人。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公正合理、平等互利的新型国际关系和党际关系。今天中国共产党虽然已经领导中国人民夺取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她在国家政权中处于执政党的地位,她所要处理的对外关系主要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她所制定的对外政策已经成为国家的外交政策,但她依然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作为自己的外交战略目标,愿意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世界上一切国家和

政党开展交流与合作。这一切表明,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对外政策的历史经验仍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制定对美苏政策的理论及其实践的考察分析,阐明中国共产党对美苏政策的内在实质、战略策略思想和对外关系发展的基本规律,揭示国际斗争与国内斗争、国际环境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内在互动关系,为新时期我国的外交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

第一章

亲苏拉美：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滥觞

一、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转变与走向世界的尝试

（一）现实与调整

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从严格意义上讲，是抗日战争时期从处理与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的关系开始的，最早可以追溯到1935年。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在组织上与共产国际之间是上级与下级、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在具体工作上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监督，在政治路线和策略方针制定上，依赖甚至迷信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不折不扣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因此，在对外关系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基本上都是听命于共产国际，严格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来处理对外关系，还谈不上有自己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伊始，就基于中国所处的被多个帝国主义国家所宰割的特殊国际环境，依据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以阶级分野和意识形态异同为标准，奉行亲苏反帝的外交政策，即站在苏联为首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一边，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宣战。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帝国主义是“天下乌鸦一般黑”，不仅日本的扩张是中国的“绝大的危险”，而且美国也是“最会杀人

的第一等刽子手”,英国也没有“比日本好的地方”^①,而苏俄则自愿放弃沙皇政府依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攫取的各种特权,支持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因此,主张联合苏俄,反对一切帝国主义。1922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宣言中明确规定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是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并决定正式加入共产国际,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早期亲苏反帝的对外政策在中共二大上从政治宣言到组织领导都得到了集中体现。1924年1月,中国共产党人参与起草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再次重申了联苏反帝的对外政策。中国共产党对国际政治问题的这种认识,反映了中华民族追求国家独立和人民幸福的强烈愿望,但它也抹煞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限制了利用矛盾策略的提出和利用。

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走上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曾有过反思,但是,在国民党政府的政治高压、经济封锁、军事“围剿”之下,农村革命根据地长期遭到铜墙铁壁般的严密封锁而与世隔绝,这使中国共产党人对外部世界特别是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及其对中国政局的影响的了解,往往受到极大的限制,不得不仍然依赖于苏联和共产国际在理论和政策上的指导,因而在对外政策上更加坚定了亲苏反帝的主张。1928年6月、7月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民主革命的十大政纲中,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与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是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

^① 毛泽东:《北京政变与商人》,载《向导》第31、32期合刊;《中国国民党之反奉宣言大纲》,载《政治周刊》第1期。

代表大会上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第一次以工农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名义，宣布苏联是苏维埃共和国的最好的朋友和同盟者，不承认帝国主义一切在华特权和一切不平等条约。“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中日民族矛盾开始激化，中共中央迅速作出决议，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也发表宣言，主张“以民族解放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中国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①，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抗日外交政策。不过，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如何在认识国际形势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上，居于主导地位的观点是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内容是突出帝国主义国家与苏联的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强调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加剧和世界革命形势的成熟。该理论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革命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1918年到1923年，这是资本主义制度陷于严重危机，无产阶级采取直接行动的时期；第二个时期是从1923年到1928年，这是资本主义局部稳定和经济恢复、无产阶级继续斗争的时期；第三个时期是从1928年起，这是资本主义各种矛盾日益激化、无产阶级开始进行直接革命的时期。正是受这一理论的束缚和共产国际的影响，面对中国民族危机的加深和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矛盾的加剧，以王明为首的“左”倾中央领导人却照搬共产国际关于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是帝国主义国家联合发动的反苏战争的序幕的说法，片面要求中国革命去适应苏联的外交战略，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武装保卫苏联”、“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等“左”的口号，对外继续奉行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策略。尽管，当时中共中央的抗日立场是坚定而鲜明的，但是，把抗日与反帝相提并论，把保卫苏

①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1932年4月15日）。

联作为抗日的目的,却明显脱离了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和帝国主义在华均势失去平衡这一具体实际,使中国共产党失去了根据日益高涨的抗日民主运动和变动了的远东国际关系适时调整自己的内外政策、发展革命力量的有利时机。同时,这也反映了中共中央尚未摆脱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从属地位,更谈不上独立自主地制定自己的内外政策。

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从一成立就以推翻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为己任,其反帝主张是鲜明的,所提出的联合苏联、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政策是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对于推动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1935年遵义会议之前,受自身政治上不成熟和力量弱小的限制,加上共产国际严明组织纪律的约束,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受到很大限制,不仅没有具体的实践活动,而且所提出的对外政策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和绝对性。

1935年是中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的一年,也是中国革命实现重要转折、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关键性的一年。正是在这一年,中国共产党的内外政策开始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即对内从武力推翻国民党统治转向通过民主改革实现社会进步,对外从打倒一切帝国主义转向区别对待法西斯国家和民主国家。促成这一转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三个:

一是遵义会议的召开和红军长征的胜利。遵义会议之所以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不仅在于它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而且在于它是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国际关系的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冲破对共产国际的迷信和共产国际的束缚,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伟大开端。在没有任何外来干预的情况下,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地位,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

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从而为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和摆脱对共产国际的盲目信从,采取务实灵活的路线和方针政策,独立自主地观察、分析和处理国际事务与中国革命问题,创造了组织条件。红军长征的胜利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巩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伟大的战略转移,不仅把中国革命的重心推进到了抗日斗争的前沿,而且有了继续前进的战略基地,为实现内外政策的转变创造了客观条件。

二是苏联外交战略的调整和共产国际策略路线的转变。从1933年起,鉴于欧洲和远东两个战争策源地的相继形成和法西斯势力在世界范围内日益猖獗的严峻形势,苏联开始全面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由与英美法直接对抗转向维护集体安全和与西方民主国家结盟,其主要标志是1933年11月苏联与美国正式建交和1934年9月苏联正式加入国际联盟。为配合苏联外交战略的转变,共产国际也开始调整以往的策略战线,由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推进世界革命转向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1935年7月25日至8月21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在深刻分析法西斯主义的性质及其危害性的基础上,制定了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工人统一战线”和“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政策,并针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具体情况,规定了“建立人民反帝阵线”^①的策略。共产国际策略路线的转变,直接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内外政策的转变。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据此起草和发表了《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不仅明确主张建立包括全国各抗日党派、团体、军队在内的统一战线性质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而且提出了“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

①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48页。

的民族和国家作同盟,与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①的外交主张。诚然,《八一宣言》既非由中共中央作出,又尚未在全党达成共识,却得到了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认可和赞同,虽不能作为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转变的标志,但它却开了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转变的先河,为瓦窑堡会议的召开和党的政治路线的转变奠定了政策基础,无疑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三是华北事变的爆发。日本继武力侵占中国东北后,又得陇望蜀,将侵略的魔爪伸向了华北五省,制造了一系列企图变华北为第二个“满洲国”的严重事件。而国民党政府仍然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对日本的步步入侵忍辱退让,中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华北事变促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引起了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抗日民主运动如火如荼,“立息内争,共御外侮”成为全民族的一致呼声和要求。在北平爆发了青年学生抗日救亡的“一二·九”运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也出现了分化。国内形势的发展状况表明,中国革命已经进入由国内战争向民族解放战争转变的前夜,这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潮流,适时地调整内外政策,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策略方针。

1935年11月间,刚刚到达陕北不久的中共中央便从回国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林育英)口中,获悉了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由于它们与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分析和主张基本上是相吻合的,所以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一致赞同。11月28日,中共中央发表《抗日救国宣言》,重申了与《八一宣言》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24页。

内容基本相同的政治主张和外交政策。可以说,这是中共中央对外政策发生实质性转变的先声。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不仅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而且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的外交主张和对外政策。从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和毛泽东会后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总的原则是在“不放弃一切可能争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卖国贼的胜利的基础之上,同一切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相反对的国家、党派、甚至个人,进行必要的谅解、妥协,建立国交,订立同盟条约的关系”^①,具体来说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首先是联合苏联。决议分析了苏联与日本存在的尖锐矛盾和苏联援助中国抗日的必然性,认为“苏联是中国革命最有力量的帮手”^②。毛泽东在报告中也强调指出:“我们的抗日战争需要国际人民的援助,首先是苏联人民的援助,他们也一定会援助我们,因为我们和他们是休戚相关的。”^③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此时联合苏联抗日的对外政策与王明提出的抗日保卫苏联政策截然不同,联合苏联是为了争取苏联人民对中国抗日斗争的支持,而不是抗日为了保卫苏联。对苏政策的新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共中央开始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外部事务。其次是争取与英美建立某种联盟关系。决议科学分析了日本侵华引起的远东国际关系的变化,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单独吞并中国的行动,使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98—617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0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页。

达到了空前紧张的程度”。美国和日本是“势不两立的,太平洋战争是必然的结果”,这就有可能使英美等国对日态度发生变化,至少“暂时处于不积极的反对反日战线的地位”。因此,会议放弃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把英美同日本加以区别,主张联合一切同日本帝国主义存在矛盾、对中国的民族解放斗争表示同情、赞助或守善意中立的国家和民族。在这些国家当中,主要是指英美等西方国家。同时,毛泽东还指出:“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①这里虽然是针对国内国民党统治集团,但对外同样适用于帝国主义国家。这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第一次明确提出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争取与英美结盟抗日的策略思想。对此,毛泽东在1937年5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了更为全面的论述。他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实行了完全征服中国的政策。因此,便把若干其他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推入次要的地位,而在这些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扩大了矛盾的裂口。因此,便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的任务。这就是说,中国不但应当和中国人民的始终一贯的良友苏联相联合,而且应当按照可能,和那些在现时愿意保持和平而反对新的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②最后是建立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瓦窑堡会议虽然没有提出“国际统一战线”的概念,但其思想是十分明显的。从主张联合苏联,到与反对日本侵略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联盟关系,再到与一切对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表示同情、赞助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或国家建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2—253页。

立亲密的友谊关系，其归结点就是建立一个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反对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我们的统一战线应当以抗日为目的，不是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①国际统一战线政策的初步提出，预示着中国共产党处理对外关系的思维模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开始超越按照国家的阶级性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甚至对苏态度来划分世界阵线的思想藩篱。

瓦窑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发生实质性转变的重要标志。它表现在：第一，从对中国时局的认识上，首次把中日民族矛盾明确界定为国内主要矛盾，把日本帝国主义视为主要敌人，主张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正是从这时起，一切为着抗日真正成为中国共产党制定对外政策的基点。因为外交是为内政服务的，抗日才是外交的重心所在。第二，从对国际关系的认识上，首次突出了日本与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开始区分法西斯侵略国家与反法西斯民主国家，为联合英美、建立国际统一战线打开了通道。第三，从党的对外策略上，全面抛弃了“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和“武装保卫苏联”等不切实际的口号，首次提出有可能和有必要直接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并争取与英美等西方国家发展某种联盟关系。

瓦窑堡会议之后，随着日本侵华危机的日益深重，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也逐步趋于稳定和明确。这就是，在远东，联合苏、美、英和所有同情、支持中国抗日的国家，集中全力抵抗日本侵略者；在全世界，站在世界和平阵线一边，反对法西斯侵略阵线，并利用国际统一战线来影响和推动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3页。

(二)对美政策的初步构想

正如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要处理好与长期处于对立状态的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关系一样,要建立国际统一战线,最初试图要解决的就是处于被封锁隔绝状态的中国共产党与英美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关系。在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的情况下,如何让自己走向世界、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自己、接纳自己,成为摆在中共中央面前的迫切问题。为此,中共中央致电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的宋庆龄,希望能“邀请一位公道的记者”,“到陕北去实地考察边区的情况,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①。中共中央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试图通过“民间外交”的形式,打开与世界联系的窗口。当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将要来访的消息传到陕北后,中共中央极为重视,于1936年5月15日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专门研究。会议认为中国共产党当前的主要目标是反日,从反日统一战线的立场出发,应当顾及其他帝国主义及其人民的利益,并把这些利益与中国人民的利益联系起来^②。6月,中共中央在一份党内指示中明确指出,由于国际关系的分化和重新组合,英美等国有可能“积极参加反日”。因此,“从共产党一直到帝国主义,可以发展到最广泛的抗日讨逆的统一战线的创立”^③。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对争取英美援华抗日持乐观态度。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国际统一战线政策的积极倡导者,而且是积极实践者。

1936年7月,斯诺到达当时中共中央驻地陕西保安。斯诺的陕北之行,为中国共产党向国际社会传递外交信息提供了机会和渠道。毛泽东在紧张的战争和统战工作之余,多次会见斯诺,有时彻夜长

① 尚明轩、唐宝林:《宋庆龄传》,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第322页。

② 《党的文献》,1992年第1期,第94—95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8页。

谈，十分坦率诚恳地向他详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与现状、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外形势的看法及其内外政策。斯诺返回北平后，连续在英美最有影响的《每日先驱报》、《时代》、《生活》、《美亚》、《星期六晚邮报》等报刊上发表了数十篇有关陕北红色区域的真实报道，产生了如同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一样“震撼世界的成就”。中国共产党人的美好形象和政治主张第一次以未经歪曲的真实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继斯诺之后至全面抗战爆发前夕，中共中央又先后接待了美国著名作家史沫特莱、斯诺夫人海伦·斯诺、《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维克多·基恩、合众国际社记者厄尔·列夫、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远东问题专家托马斯·毕森、《太平洋事务》主编欧文·拉铁摩尔、《美亚》主编菲利普·贾菲、《纽约日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等七批共10余人的访问。中国共产党对外国记者的成功接待，冲破了国民党多年的新闻封锁，打开了中国共产党与外部世界接触的大门，扩大和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和地位，这无疑是中国共产迈出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斯诺的陕北之行，是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这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第一次与外国记者进行公开的、正式的接触。尽管它带有民间和私人外交的性质，但架起了中国共产党与外部世界沟通的桥梁，直接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发展的历史进程。因为在此之前还没有一个外国记者访问过革命根据地，加上国民党的歪曲宣传和封锁包围，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并不了解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也不了解西方世界，而斯诺的访问无疑为双方的相互了解提供了一个重要途径。毛泽东紧紧抓住这一难得的机会，在同斯诺的谈话中，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战争时期奉行的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总政策，着重分析了美国对中国抗日可能采取的态度和所能起的作用，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的初

步构想。

首先,利用美日矛盾,倡导联美抗日,建立反日统一战线。毛泽东指出:“日本侵略不仅威胁中国,而且也威胁世界和平,尤其是太平洋的和平。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同时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特别是和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苏等国的人民的敌人。”“这样,日本的侵略就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是应由太平洋地区所有国家来对付的问题。”毛泽东进而把世界上除德、意、日以外的国家分为三大类:一类是“不愿看到日本占领中国”、“不愿参加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的反战国家,如英美等国;第二类是“或多或少都受到日本威胁”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最后一类是“奉行和平方针、无意于征服或剥削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苏联。这三种类型的国家“能够组成一个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美国属于反战国家,“美国的东方利益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紧密连结在一起”。因此,中国同美国建立反日统一战线,不仅是完全可能和合乎需要的,同时也符合美国国家的利益^①。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第一次明确表示愿同美国结成统一战线。

其次,反对“孤立主义”,争取美国援华制日。毛泽东认为,中国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应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②而同所有与太平洋地区和平有利害关系的国家建立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重要条件。据此,毛泽东对美国政府寄予特别希望,认为“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对中国是有远见的,形势注定美国政府要对中国和日本的

①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0—398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1页。

未来起非常积极的作用”，相信“他们将同中国人民结成统一战线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日本所代表的法西斯战线”，断言美国迟早会抛弃“孤立主义”政策，“觉悟到它在太平洋的真正责任是同直接威胁美国理想和利益的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①。毛泽东希望美国政府能积极援助中国抵抗日本的侵略和征服，这种援助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向中国抗日力量提供贷款，出售军需品；二是对日本进行封锁。如果这样，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之间“将会建立起最牢固的友谊和同情”^②。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从积极方面高度评价美国在远东所起的作用。

再次，提出战后中英经济合作的设想。毛泽东在阐释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时，不仅着眼于当前抗日，而且放眼战后的未来。他以睿智的目光和深邃的洞察力，高瞻远瞩，勾勒出战后中美经济合作的蓝图。毛泽东指出：“如果中国真正赢得了独立，外国人在中国的合法贸易利益将会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四亿五千万人民的生产和消费能力不仅仅是中国人才会对它关心的事情，而且能吸引许多国家。”届时，中国将同友好国家商订互助、互利和相互同意的条约，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合作。中国“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并把“大量外资用于大规模地发展生产事业”，外国与中国合作的机会将非常之多^③。而美国作为中国的友好国家，无疑将拥有这样的机会。

毛泽东关于对美政策的初步构想，真实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国际形势的深刻见解，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的战略目标下对外政策的灵活性和发展对美关系的积极态度。毛泽东的这些思想，经斯诺向国际社会报道后，“起了具有重要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因

①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5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1—392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3—396页。

为他推动美国以至世界舆论接受(中国)共产党作为盟友参加反对国际侵略的斗争”^①。虽然我们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审视,毛泽东对美国援华制日的决心和积极作用以及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关系发展前景的估计显得过于乐观,但从更深层意义上来理解,在当时中国共产党既不可能与美国发展直接关系,又不可能确切了解美国对华政策的特定环境下,毛泽东能从固有的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出发,站在国际关系的高度,用外交的思维来认识世界和谈论对美政策,这无疑是在认识上的飞跃,对于以后中国共产党制定对美政策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中国共产党拉美抗日政策的确立

(一)政策转变中的曲折与反复

如果说,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转变开辟了通向国际统一战线之路,那么,这条路却不是笔直和平坦的,而是充满了曲折和艰辛。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的爆发为中国共产党实施自己的国际统一战线方针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广阔的空间。因此,卢沟桥的炮声刚一打响,中共中央就根据既定的国际反日统一战线方针,迅即表明了自己的抗日外交政策,主张“立刻实现抗日的积极外交,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法西斯侵略阵线,同英美法苏等国订立有利于抗日救国的协定”^②,“立刻和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紧密地联合这个最可靠最有力量最能够帮助中国抗日的国家。争取英、美、法同情我们抗日,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条件下争取他们的援助”^③,赞成中国

① [美]杰克·贝尔登著,邱应觉等译:《中国震撼世界》,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序言第9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97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7页。

在抗日问题上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一切反侵略国家进行合作。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外交政策包括四个方面：第一，抗日是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反对法西斯侵略是中国共产党联合英美法苏等国的基础；第二，以侵略和反侵略作为划分法西斯侵略阵线和国际和平阵线的标准，中国共产党坚定地站在国际和平阵线一边；第三，争取外援的基础是自力更生，前提是不丧失领土主权；第四，苏联是中国抗日的可靠盟友，应紧密联合苏联，同时争取英、美、法等国同情和援助中国抗日。由于美苏等国同中国存在着密切的地缘政治或经济利益关系，因此，中国共产党从抗战一开始就主张对美、苏等国开展积极的外交活动，并对争取他们援华抗日寄予厚望。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国际形势发展表明，日本全面侵华虽然触动了英美等国的在华利益，也促使英美等国对中国的抗战表示同情和支持，但并没有引起远东国际关系的根本变化。正如中共中央在一份党内指示中所估计的那样：“英法对中国虽表示某些同情的论调，但他们不赞成中国今天实行全国性的抗战，希望中日妥协。他们这种态度，客观上将有利于日本。美国还保持着静观态度。苏联正在严密注意事变的发展，加强远东的防卫与警戒。”^①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初期仍把对外政策的重点放在争取与英美法苏等国结成反日同盟上，以期获得更多的国际援助。中国共产党对国际上任何有利于中国抗战的行动，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到美国的“道义禁运”，都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1938年5月3日，毛泽东在与合众社记者谈话时指出，“美国民主党的赞助国际和平，罗斯福总统的谴责法西斯蒂，霍华德系报纸的同情中国抗日，尤其是美国广大人民群众对于中国抗日斗争的声援，这些都是我们所欢迎与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92页。

感谢的”，希望美国政府“能更进一步，出面联合其它国家给暴日以实际的制裁”^①。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还接待了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总统亲信卡尔逊对根据地的访问，向他并通过他向美国政府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的内外政策和与美合作抗日、重建中国的愿望^②。但是，实际上，从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除苏联给予中国一定的援助外（以不卷入对日战争为限度），美国受国内经济问题的困扰和“孤立主义”势力的牵制，始终在中日问题上态度暧昧，奉行“不干涉”政策，这不能不使中国共产党感到失望，促使中国共产党重新审视自己的对外政策。

1938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对国际形势进行了透彻分析，第一次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外交问题上的政策原则。毛泽东指出，中国已经与世界联为一体，中日战争是世界战争的一部分，中国不可能离开与世界的联系而孤立地取得抗战的胜利，这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基本国情。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目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世界的主要重心在欧洲，东方是环绕着它的重要部分”，西方各国都将解决欧洲问题放在第一位，而将东方问题则暂时放在第二位。就国际援助而言，“现在还未至最大有利之时”，“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助我，政府则取某种程度的中立态度，其资产阶级则利用战争做生意，还在大量输送军火与军火原料给日本”，即使是苏联，“目前还不容许它作超过现时程度的援助”。因此，“我们对国际援助暂时决不应作过大希望”，“只有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同时不放松外援之争取，才是正

①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卷，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93页。

② 参见〔美〕米契尔·布赖克福特、肖东川等译：《卡尔逊与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21—223页；〔美〕迈克尔·沙勒、郭济祖译：《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4—25页。

确的道路”。在争取外援中,必须坚持区别对待的原则,这就是:“第一不可忘记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区别,第二不可忘记资本主义国家之政府与资本主义国家之人民的区别,第三,更加不可忘记现时与将来的区别,我们对前者不应寄以过高的希望。”^①毛泽东的论述,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观察和处理国际事务的基本认识,进一步拓展了国际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为中国共产党制定对外政策尤其是对美政策,构筑了理论框架,确定了基本原则。

1939年下半年,受国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关系的认识开始发生急剧变化,对美政策的重点也由致力于建立反日统一战线转向反对美国的绥靖政策方面。

促使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转变的因素之一是中国国内局势的恶化。1938年10月,武汉、广州沦陷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由于日本改变了以往“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立场,加紧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政治上的诱降。国民党内妥协投降倾向抬头,国共关系日趋紧张。德国大使陶德曼的“调停”因日本要价太高而流产;汪精卫的叛国投敌导致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分裂;蒋介石在积极谋求对日“获得光荣之和平”^②的同时,加紧了其反共磨擦活动。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正式确立了“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针,标志着国民党开始将战略重心由对外转向对内。会后,国民党连续发布了《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地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草案》等秘密文件。1940年10月18日,蒋介石对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公然宣称,国民党“至今已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67、580—581、640页。

② 张其成:《党史概要》,第3册,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79年版,第1153页。

不患日寇敌军之侵略”，“所虑者惟中国共产党猖獗”，如有美国援助，则“中国共产党亦无所施其伎矣”^①。在此期间，国民党反共活动迭起，军事磨擦接连不断，国共亲密合作、并肩作战的局面已不复存在。本来中国共产党在制定国际反日统一战线政策之初就具有双重目标：一是联美抗日，通过与英美等西方大国结盟，获得国际支持和援助；二是借美促蒋，借助西方各大国对中国政局的影响力，推动国民党联共抗日。英美在援华抗日问题上一直缺少实际行动，已经使中国共产党感到失望，怀疑英美是否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来换取与日本的暂时妥协。此时国共关系的恶化不能不引起中共中央的警觉。中国共产党有理由相信，蒋介石在“运用英美之力，解决中日问题”的同时，也在借用英美之力解决中国共产党问题，怀疑英美在国共冲突中扮演着暗中支持蒋介石的角色。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开展反对“民族投降主义”的同时，在国际上加紧了对英美对华政策的抨击。1939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就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问题发出党内指示，认为国民党执行对日妥协对内反共政策的根源，主观上在于“对抗战的不彻底性”、对革命力量壮大的恐惧和“对外依赖性”，客观上受战争形势和国际形势的影响。在这里，中共中央用暗示性的语言，很自然地将英美的绥靖政策同国共关系的恶化联系在一起。6月7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6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造成中国出现投降危险的因素有三：一是“日本的诱降政策”，二是英、美、法的压力，三是“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动摇”^②。据此，毛泽东不再把英美看做反战国家，而重新以“帝国主义”相称，甚至认为

① 《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来往电稿》，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73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6页。

英美等国际投降主义者正在成为日本“用以包围中国外部”的“战略同盟军”。中国共产党人目前的任务就是动员国内外的进步力量来反对英美帝国主义。

英美对日绥靖政策加速了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的转变。1939年前后,英美在中国抗战问题依然奉行以邻为壑、苟且偷安的绥靖主义政策,非但未采取任何实际步骤援助中国、制裁日本,反而大刮妥协之风,企图绥靖日本,制造“远东慕尼黑”。1939年年初,英美舆论开始大量散布关于召开“太平洋国际会议”以解决“中日冲突”的消息。中、美、英三国政府还曾就重新召开九国公约会议来结束中日战争问题进行过磋商,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驻华大使卡尔穿梭于东京、上海、重庆之间,扮演国际掮客的角色,游说国民党政府对日采取妥协政策。7月,克莱琪与日本有田八郎就解决天津租界问题签订《有田—克莱琪协定》,承认日本在华侵略行动的合法性,单方面在中国问题上向日本作出妥协。美国虽对英日协定持保留态度,并曾以宣布按期废止日美商约相抵制。但是,欧洲战争爆发后,美国远东战略的基点是“不遗余力地防止同日本的战争爆发”^①。因此,美国为了应付欧洲事态的发展,仍然步英国的后尘,赞成牺牲中国,绥靖日本,尽量避免两洋作战。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向中国驻美大使胡适提议采用“中日共管”东北的方式来寻求中日和平。美国与日本多次就中国问题举行秘密会谈。英美的对日妥协,使中国共产党人越来越感到,他们不仅无意制止日本的扩张,反而是在“纵容侵略战争,自己从中取利”^②。为此,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掀起了反对“远东慕尼黑”的斗争。毛泽东抨击英美的“不干涉”政策是

① [美]舍伍德著,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译:《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二次大战期间白宫实录》,上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8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80页。

“坐山观虎斗”，是“鹬蚌相持，渔人得利”，其目的在于消耗战争双方，最后出来收拾残局^①，其结果必然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②。他代表中国共产党郑重指出：“日美妥协，牺牲中国，造成反共、反苏局面的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正在日美蒋之间酝酿着。我们必须揭穿它，反对它。”^③7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全党“用最大的力量推动各方共同起来在舆论、行动上，反对任何形式的东方慕尼黑”^④。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对英美绥靖政策的谴责和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发生变化的重要表现。

苏联对外政策和共产国际策略的急剧转变，直接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的转变。对于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扩张行径，苏联奉行与英、美、法截然不同的政策，即集体安全政策。1938年5月，正当德国吞并奥地利准备肢解捷克斯洛伐克之时，苏联再三呼吁英、法等国进行干预，并多次尝试与英法建立对付德国的集体安全体系。对于苏联的呼吁，英法两国敷衍塞责，一再拖延，并且不惜以牺牲捷克斯洛伐克为代价，与德国签订了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企图将战争祸水东引苏联。面对变幻莫测的国际政治局势，苏联出于对自身利益和安全的考虑，开始大幅度调整对外政策。苏联一方面公开指责英美法的对外政策，另一方面则暗中与德国秘密接触，于1939年8月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随后又出兵波兰和芬兰，意在针锋相对，将祸水西引。《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表明，苏联公开放弃了长期坚持并积极倡导的集体安全与和平的外交政策。为了为自己的外交政策辩解，苏联和共产国际将欧洲战争定性为

①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8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4页。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页。

“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都是“资本主义的列强为了重新瓜分世界和为了争取世界的统治而斗争的直接继续”，是“帝国主义的非正义战争”，并放弃了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重新回到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立场，要求各国共产党重新调整政策，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本国的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

苏联对外政策和共产国际策略方针的转变，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9月1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致电中共中央，指出：“现在的战争是帝国主义的非正义的战争，交战国的资产阶级的罪恶都是一样的，任何一个国家内的工人阶级，尤其是共产党，都不能赞助这个战争。”“凡是共产党有违背这种方针的地方，应当很快的纠正自己的政治路线。”^①中共中央接电后，立即表示“全部的完全的拥护”共产国际的新策略^②。此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讲话和中共中央决议中都接受了共产国际对战争性质和国际形势的估计。9月14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所作的《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讲演中指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目的，和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的目的同样，是为了重分世界，就是说，是为了重分殖民地半殖民地与势力范围，为了掠夺世界人民，为了争夺世界人民的统治权。”“不论是德意日，不论是英美法，一切直接间接参加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只有这一个反革命的目的，掠夺人民的目的，帝国主义的目的。”因此“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同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一样”是属于“非正义的掠夺的战争”。基于对战争性质的这一认识，毛泽东断言，“过去关于法西斯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划分，已经失掉了意义”。“争取所谓民

① 1939年10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中共中央的电报。

② 杨云若：《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纪事（1919—194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35—136页。

主国家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同苏联,同各国人民,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一道,建立统一战线的时期,已经过去,这种可能现在已经没有了。而现在惟一可能的,就是苏联同所有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同所有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一道”,建立反战争反侵略的统一战线。因而,新的统一战线可能的组成部分就由四个变为三个,即“少了一个所谓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当前,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政策就是“号召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揭穿这种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不管是战争的甲方或乙方,把他们看做一样的强盗”^①。9月26日,毛泽东在同来访的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重申了他的观点。毛泽东说,随着欧洲战争的爆发,世界政治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德国放弃了它的反苏和反共产国际的政策,以前在法西斯国家和民主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划分的界线就失去了意义。所谓的民主国家成了反苏、反共、反民主、反人民的运动的中心,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运动的敌人。在新的形势下,可以参加世界革命统一战线的国家已经不再包括所谓民主国家里的资产阶级了,争取英法等国同苏联建立统一战线的阶段已经过去^②。直到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同盟成立,法西斯阵线与反法西斯阵线日趋明朗化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仍未改变对战争性质的认识,仍然把英美法与德意日并列,视为两大帝国主义战争集团。对战争性质的错误判断,直接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的逆转。在此后的近两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不仅自己放弃了与英美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的努力,而且反对国民党政府加入英美阵线和与英美结盟^③。

对于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的变化,有三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指出。

① 《毛泽东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211—212、217—218页。

② 莫克安:《斯诺在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33—134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页。

第一，中国共产党基于对国际形势发展的判断，及时把握可能发生的矛盾变化，并根据这些变化不断地调整对美政策，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是非常正常的。当国内妥协投降、国际上绥靖日本之风日盛之时，中国共产党为着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对英美的对日妥协保持警惕，抨击其绥靖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这种批评和斗争本身是为了推动它们尽早放弃牺牲中国、讨好日本的错误政策，更坚定地回到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来。联合英美是为了实现共同抗日的目的，争取联合并不等于放弃必要的斗争。当联合的对象不能实现抗日的目标甚至与这一目标相悖时，斗争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以斗争求团结，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的一条重要原则，它同样也适用于国际统一战线。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共产党对英美的批评和斗争实际上也是中国共产党为建立反日统一战线所作的不懈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制止中国战局向坏的方面转化起了一定作用，其效果是好的。但是我们也应当承认，中国共产党一度对是否继续联合英美产生动摇，把英美当做主要敌人加以抨击，显然是错误的，必然会使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第二，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的转变固然受到了共产国际指示的直接影响，但对此也不宜估计过高。因为，中国抗日战争所处的国内外环境毕竟不同于苏联，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已今非昔比，日渐成熟。中国共产党更多是从本国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处理对美关系的。中国共产党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在时间上是短暂的，在对内政策上未产生连锁反应，在对外政策上主要局限于理论和宣传。当从共产国际舶来的理论和策略同中国的实际情况发生矛盾时，中国共产党还是把这种理论同具体政策加以区分的。总的来看，在实际政策中，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忘记英美法与德意日的区别，也未改变利用矛盾的战略意图。1940年2月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

的决定》中指出：“英美法与日本之间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矛盾，欧战削弱了英法在远东的地位，因而很难迅速召集远东慕尼黑会议。”^①毛泽东也认为，“帝国主义相互间的矛盾，由于战争而展开了，不是缩小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尚有可供革命利用之矛盾，因此，必须利用之”^②。1941年3月，毛泽东在致周恩来的一份电报中说，我们并不放弃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宣传，但要把宣传和政策加以区别，我们必须尽量利用两派帝国主义的矛盾。即便是对于英美，中国共产党也没有把它们等同起来，而是根据其表现区别对待。中国共产党反对绥靖政策的重点是打击张伯伦的投降政策，而对美国则是争取其放弃“不干涉”政策。

第三、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发生转变的根本原因是未能正确认识和把握当时世界的主要矛盾。准确判断一个时期世界的主要矛盾，取决于对当时整个国际局势的全面把握。当时的国际关系的的确错综复杂，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在一起，但关键在于，受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影响，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思维定势中总是把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对抗和冲突看成固定不变的世界的主要矛盾，很容易只是从苏联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这一单向角度来观察世界。世界主要矛盾的迷失和混乱，必然导致对外政策的变化。因此，面对扑朔迷离、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只有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全面考察世界各种矛盾的发展变化，善于准确把握世界的主要矛盾，才能制定正确的对外政策，避免革命斗争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1940年6月，国际法西斯势力更加猖獗，德军横扫西欧，虎视英国，日本加强南进攻势。这进一步触及了美国的切身利益，美国“援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61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8页。

华制日”的立场日渐明朗，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也在酝酿新的转变。6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作关于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中，虽然仍将此视作帝国主义战争，但也注意到现实状况中英法在欧洲的失败及日美矛盾的扩大，提出“从英美法方面发动的东方慕尼黑危险，已经不存在了”^①。7月7日和9月10日，中共中央在党内指示中明确指出：“英美法已不复是引诱中国投降的重要因素，英美虽想牺牲中国保存南洋，但日本已不能听命，我们可以利用英美法与德日意两个帝国主义阵线之间的冲突，特别是日美在太平洋上增长着的矛盾。”^②而“英美为了对抗日本南进，便由劝和中日的远东慕尼黑政策转到利用中国牵制日本的政策”^③。因此，不要在英美放弃远东慕尼黑政策后，去反对利用英美的外交^④。11月6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的电报中进一步指出：“蒋加入英美集团有利无害，加入德意日集团有害无利，我们再也不不要强调反对加入英美集团了……目前不但共产党中国人民苏联这三大势力应该团结，而且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以期制止投降，打击亲日亲德派活动。”^⑤12月25日，毛泽东在《论政策》的党内指示中，明确地将英美与德意日区分开来，指出：“虽然共产党是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的，但是既须将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现时没有举行侵略的其他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同日本结成同盟承认‘满洲国’的德意帝国主义，和同日本处于对立地位的英美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过去采取远东慕尼黑政策危害

① 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的估计》，1940年6月25日。转引自陶文钊等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413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19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79—480页。

④ 《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第102页。

⑤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51页。

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和目前放弃这个政策改为赞助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加以区别。我们的策略原则,仍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①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这些指示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敏锐地意识到英美与德意日之间矛盾的加剧,开始按照侵略阵线与反侵略阵线来划分世界阵营,对美政策也由以批评为主转为力求利用美日矛盾。

但是,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的这种“微调”,仍然没有脱离“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这个总题目,仍是以英美属帝国主义战争集团为前提的,其目的是借用英美的力量来制止蒋介石的投降反共活动,而不是为了共同反对法西斯侵略。毛泽东11月6日致周恩来的电报充分反映了这一指导思想。也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皖南事变期间,周恩来积极与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美国总统特使居里进行外交联络,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在英美干预之下,蒋介石的反共活动有所收敛。1941年3月4日,毛泽东在致廖承志和周恩来的电报中讲得更为明白:“要把宣传与政策加以区别,我们并不放弃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但对英美援华与中缅联防则不应反对、可表示听任态度。因此事可使蒋介石难于投降与难于反共,我们必须尽量利用两派帝国主义间的矛盾。”^②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此时对美政策的调整,实际上是对“利用矛盾”策略的运用。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的根本转变是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后。

(二) 拉美抗日政策的确立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的爆发,为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改变对战争性质的看法和调整对美政策提供了契机。苏德战争的爆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4页。

② 毛泽东致小廖并告周电，1941年3月4日。转引自陶文劭等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420页。

发,对国际关系的变动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方面,它宣告了苏联孤立自保政策的彻底破产,迫使苏联迅速改变政策,重新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口号;另一方面,英美相继宣布全力支持苏联抗拒德国的侵略,这意味着世界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大阵线已经泾渭分明。同时,它也证明共产国际按照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来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本质,套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经验来处理第二次世界大战问题的做法是错误的,促使各国共产党开始从理论上重新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进行再认识。

苏德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迅速作出了反应。6月23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决定,指出:“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①6月26日,毛泽东在一封电报中指出:“英、美、华都站在苏联方面,现在是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大阵线的对抗,其前途对苏对华有利。”^②同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苏德战争是世界政治的新的转折点”,“今天战争的本质已经是一方革命、正义,他方反革命、非正义;一方保卫自由、保卫人类,他方绞杀自由、奴役全人类的你死我活的决斗”^③。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以“拉英美蒋反德意日”为主旨的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明确提出“拥护国际反法西斯阵线,促进中、苏、英、美及其他一切反对法西斯的国家民族一致联合”^④。7月12日,毛泽东就在反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6页。

②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09页。

③ 《世界政治的新时期》,《解放日报》1941年6月26日。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56页。

法西斯战争中判断是非的标准专门起草了党内指示,通告全党:“在目前条件下,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或是否资产阶级,凡属反对法西斯德意日援助苏联与中国者,都是好的,有益的,正义的;凡属援助德意日反对苏联与中国者,都是坏的,有害的,非正义的。在此标准下,对于英国的对德战争、美国的援苏、援华、援英行动及可能的美国反日反德战争,都不是帝国主义性质的,而是正义的,我们均应表示欢迎,均应联合一致,反对共同敌人。”^①

中共中央的“六二三”和“七一二”指示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对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性质的认识,彻底突破了按国家的阶级性质来划分世界阵线的传统观点和单纯以苏联利益为中心来制定对外政策的旧框框,完全抛弃了自欧战爆发以来所实行的对美政策,重新回到了原来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立场上来,开始把英美看做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至此,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困扰在脑中的帝国主义战争理论与反法西斯战争现实之间,国际反帝统一战线与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间的矛盾终于得到了解决。

历史的发展证明,中国共产党重提与英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政策是非常及时和完全正确的。苏德战争爆发后,英、美与苏联的立场迅速接近,先后签订了对德联合作战的“英苏协定”、反对法西斯国家的暴政和侵略的《大西洋宪章》以及英美供应苏联武器和军用物资的三国互助合作协定,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初具雏形。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为争取美国加入反法西斯阵线进行了不懈努力。7月5日、6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两封电报中指出,当前“对

①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7页。

英、美主要是拉，批评可减少”^①。中共中央甚至还发表声明，高度评价英美首脑签署的《大西洋宪章》“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从此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阶段”^②。10月30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现在我们有三条统一战线，一条是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条是东方的ABCD（美、英、中、荷四国英文第一个字母——引者注）阵线，一条是英、美、苏的联合行动，有这三条统一战线，法西斯一定会打倒的。”^③11月7日，毛泽东在关于目前时局的广播讲演中，敦促美国应毫不踌躇地对德宣战，“同时，美国绝不应听信日本的阴谋，与日本订立任何的妥协，美国应和中国及英国一道，以实力制裁日本法西斯”^④。

12月8日，日军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美国直接参加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来。周恩来认为这是“太平洋上反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伟大结合的开始”^⑤。此时，由于苏联在欧洲忙于对德作战，无暇东顾，美国遂成为中国最大的抗日盟国和友邦。如果说，此前美国对日政策在妥协与斗争之间徘徊而导致中国共产党对联合美国半信半疑，那么，现在美国正处于日本的直接进攻下，拉美抗日就成为历史的必然。因此，中共中央迅速致电周恩来，要求“对英美政府应建立广泛和真诚的反日反德的统一

①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93页。

③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36页。

④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39页。

⑤ 周恩来：《太平洋战争与世界战局》，载崔奇主编：《周恩来政论选》，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第385页。

战线”^①。

12月9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和《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②,进一步提出了建立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主张,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拉美抗日政策的确立。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充分肯定了美国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共中央承认,美国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是“为了保卫独立自由与民主的正义的解放的战争”,认为“全世界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划分为举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阵线与举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的明朗化了”,主张中国应坚定地站在反法西斯国家方面,“与英美及其他抗日诸友邦缔结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同时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坚持抗日战争至完全胜利”。

第二,提出了建立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任务和途径。中共中央指出:“我全国人民,全体海外侨胞,及南洋各民族在抗日战争中的中心任务,就是建立与开展太平洋各民族反日反法西斯的广泛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应当包括反对日本侵略的一切民族的政府、党派及一切阶层的人民……这个统一战线,应当是上层的,同时又是下层的,是政府的,同时又是民众的联盟。”

第三,强调了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合作的重要性。基于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形势的分析,中共中央认为,“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对英美的统一战线特别有重大的意义”。这是因为,“一方面,在与英美合作之下,消灭日寇是中国民族解放的必要前提;他方面,中

①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21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48—252页。

国,中国内部团结一致,改革政治军事,积极牵制打击敌人,积极准备战略反攻,又是英美战胜日寇的重要条件”。为此,“中国共产党应该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以增加英美抗战力量,并改进中国抗战状况”。这里,中共中央实际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的具体内容:一是与美国合作进行抗战,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二是利用美国的影响改良中国政治,促进国共合作。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进一步促进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1942年元旦,中、美、英、苏等26国共同签署和发表了《联合国宣言》,承诺各国之间通力合作,不与敌人缔结单独停战协定或和约。随后,美、英、苏三国又互相签订了相互支持、相互援助的协定。上述宣言和协定的签订以及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共产党联合英美、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赞同和欢迎。1942年1月4日,《新华日报》发表《反法西斯的大团结》的社论,称赞《联合国宣言》是“全世界反法西斯主义的空前大团结”,“彻底摧毁侵略轴心,争取民族独立解放,恢复世界和平秩序”是反侵略各国的共同目标^①。1942年7月,中共中央发表声明,指出:“我们拥护这些宣言,我们愿意本着这些宣言的基本原则,与中国各爱国党派协同一致,参加战后新世界与战后新中国的建设。”对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中共中央认为,它不但使“世界战争中谁胜谁败,已经明显”,而且使“战后世界的动向亦有了明确的方针”^②。在新的形势下,中共中央意识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与世界战场连成一体,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美、英、苏等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动向

① 《反法西斯的大团结》,《新华日报》,1941年1月14日。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页。

和国际形势的演变都将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产生深刻影响,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战略利益出发,英美等国将支持国共合作,反对国民党的反共磨擦活动,因此有必要加强对英美的外交工作,以充分发挥它们对中国的积极影响。

基于以上认识,在太平洋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利用有利的国际形势,积极开展对美外交工作,争取美国的同情和支持,以遏制国民党的投降反共势头,取得了明显效果。虽然中国共产党尚未同美国政府建立官方关系,但是中共中央利用各种可能的渠道,直接或间接地开展民间外交和政党交往活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多次向美国驻华官员表达了在战争期间与美军合作抗日的愿望,欢迎美国政府派代表访问抗日根据地,以建立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的直接联系。1942年5月,周恩来利用在重庆会见斯诺的机会,通过斯诺转告美国政府,希望美军正式派代表团访问延安,并委托斯诺向即将访华的美国总统特使居里转交中共对日作战的材料,建议美国政府将援华军事物资的一部分提供给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与此同时,中共驻重庆的其他代表团成员也通过各种渠道频繁地与美国驻华的军事和外交官员进行非正式接触,向他们介绍中国战局和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情况,阐明中国共产党的对美政策,表达中共加强与美国合作的愿望。中共中央希望通过与美国的非官方接触,使美国政府了解中国共产党,认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逐步地与中共建立正式的官方关系,并采取实际步骤,与中共在政治、军事上开展合作。中国共产党的这些活动,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引起了美国政府对中共的关注。但是,由于美国政府采取了全面支持国民党而轻视共产党的态度,为了对付日本,既赞成国共合作,又不愿与中国共产党发展关系;既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又不愿主动介入国共关系。因此,中国共产党的这些努力未能产生积极的效果。

通观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演变的过程可以看出,从主张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到放弃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再到重提建立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从实行抗日外交政策到反对“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再到肯定英美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正义性,从争取英美援华制日到抨击英美的绥靖政策再到强调与英美合作,这标志着开始于苏德战争前后的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的转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终于完成了。当然,如果我们仅从字面上看,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好像是重新回到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立场,但这决不是简单的重复或回归,而是“否定之否定”,其内容不仅比过去丰富得多,而且与过去有极大的不同。此前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是完全建立在“利用矛盾”的基础上的,作为统战对象的美国在本质上被看做帝国主义国家,是敌人,而现在则是以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这一共同目标为基础,将美国看做盟友或伙伴;此前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的重点是争取美国援华制日,而现在则转为争取与美国合作抗日,进而利用美国的影响推进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中国共产党拉美抗日政策的确立,不仅对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且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后期打开对美关系的新局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中国共产党对苏政策由盲从到自主

中国共产党与苏联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中国革命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共产党组织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苏联作为世界革命的领导者和共产国际指挥中心所在地,中国共产党同苏联结下了不解之缘。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同志式的思想感情,使中国共产党与苏联有着无与伦比的亲密关系。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对外关系是以苏联和共产国际为主体,以亲苏反帝为主要内容的。但是,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

关系又远非“亲密”二字所能完全概括。中国共产党肩负社会革命和民族革命双重重任,始终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行列里,通过共产国际直接接受苏联的指导和帮助,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唯命是从,中国革命的胜利与发展、失败与挫折无不与苏联和共产国际有着密切关系;另一方面,苏联通过共产国际指导和支援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友谊的深厚基础,但苏联通过共产国际企图操纵和控制中国共产党为其外交战略服务,又为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亲密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这种复杂的从属关系一直延续了十几年,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才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始于遵义会议,终于延安整风运动。

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和共产国际从属关系的存在,既有共产国际高度集中的组织体制上的原因,又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不成熟有关。其危害性自不待言,但要冲破它困难重重。事实上,早在1930年中国共产党人就意识到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但直到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才在与苏联中断电讯联络的特殊背景下,果敢地迈出了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第一步。遵义会议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和共产国际关系的转折点,中国共产党在对苏关系上的从属地位开始发生动摇。随后不久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又废除了向各国党派遣全权代表的制度,进一步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内外政策创造了条件。从此,中国共产党不再把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不再盲目服从共产国际的指导,也不再以苏联利益为中心,而是从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利益出发,采取独立思考,科学分析的态度,正确的就结合中国实际贯彻执行,错误的就巧妙地加以抵制。中国共产党先于共产国际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和瓦窑堡会议顺利实现内外政策

的转变,就足以说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具备了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能力。

抗日战争为中国共产党实现独立自主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历史舞台。抗战初期,由于苏联是唯一积极援华和支持国共合作的大国,也是唯一承认中国共产党军队和政权合法化的大国,同时又是制约英美在华势力的一支重要力量,因此,无论是从抗日还是从国共关系的角度,中国共产党都必然对苏联采取尊重和友好的政策。“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苏联严厉谴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主张积极援华抗日,并于8月21日与国民党政府正式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此后,苏联便开始秘密援助中国抗日。据统计,从1937年10月至1941年,苏联共向中国提供飞机1235架、各类大炮1.6万门、汽车与坦克等车辆1850辆以及其他枪支弹药与作战物资。此外,苏联还向中国提供贷款2.5亿美元、派遣军事顾问140余人、各类专家数千名、战斗飞行员2000余人。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的大力援助给予了高度赞扬,称赞“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①,主张中国应实行积极的联苏政策。即使是在苏联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而为舆论所指责时,中共中央仍耐心地向各方解释,维护苏联的立场。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注意在组织上尊重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保持与共产国际的密切联系,及时汇报国内情况和听取指示。这样才有了1938年和1940年共产国际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的支持和对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肯定^②。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93、657页。

② 参见《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8、141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1册,第888页;同上书,第12册,第636页。

但是,由于苏联对华政策带有明显的民族利己主义和苏联领导人对中国共产党抱有疑虑和成见,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在事关中国抗战的一些重大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对此,中国共产党从中国抗战和中国革命利益出发,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局着想,独立自主地制定对苏政策,排除干扰、化解分歧,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抗战的发展。

第一,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正确处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矛盾和斗争。

在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和苏联总的看法是一致的,但在如何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问题上,是坚持独立自主,还是“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是以斗争求团结,还是以妥协退让求联合,双方存在着根本分歧。

在帮助中国共产党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上,苏联和共产国际是有功劳的。但是,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既有广泛的民族性,又有极大的复杂性,国民党出于其反动的阶级本质,念念不忘消灭中国共产党,使统一战线内部矛盾重重,磨擦不断。对此,1937年8月的中共中央洛川会议和11月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中,都强调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认为这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①。随后中共中央又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和对国民党顽固派“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但是,苏联却认为,国民党的力量强于中国共产党,而且有英、美的援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要成为反侵略斗争的领导者,还显得太孱弱”,只有依靠国民党才能“紧紧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4页。

避免两线作战”^①。因此，苏联把争取和依靠的重点放在国民党身上，物质技术援助也主要给了国民党。就连曾任红军军事顾问的李德和苏联驻华军事武官崔可夫也亲眼目睹和承认：“苏联的物质和技术援助，主要对南京政府有利，而开始分送到延安来的主要是急需的药物和医疗设备，以及政治读物——报纸、杂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特别是列宁的，当然也有斯大林的讲话和著作。”^②“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从日本军队那里缴获来的武器装备起来的。”^③当时在延安就出现了“武器交给了资产阶级，书籍给了无产阶级”这样刻薄的讥讽。中共中央曾向苏联提出，增加对共产党的军事援助，但遭到婉言拒绝。不仅如此，苏联为了促使国民党全力抗日，甚至不惜通过共产国际干预中国共产党策略方针的执行，要求中国共产党放弃独立自主原则和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1937年8月10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中，要求中国共产党在政策和策略上“作出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执行新的政策，否则可能会使党“误入某种迷途”。

1937年11月，王明受斯大林、季米特洛夫之命回国，“帮助中共中央制定符合共产国际的政策路线”，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分歧便以党内斗争的形式展开。王明以贯彻斯大林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为名，在1937年12月和1938年3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全国抗战胜利呢？》、《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系统地提出了

① [苏]瓦·崔可夫著，万成才译：《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35、36页。

② [德]奥托·布劳恩、李逢六等译：《中国纪事（1932—1939）》，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86页。

③ [苏]瓦·崔可夫著，万成才译：《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64页。

他的新投降主义主张。他指责毛泽东违背共产国际的指示,反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要求“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王明路线实际上全盘反映了苏联外交战略的需要。尽管这场斗争最终以苏联和共产国际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和政治路线而告结束,但它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苏联和共产国际对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路线和领导能力的不信任。

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如何处理皖南事变的指导方针上,中共中央与苏联和共产国际发生了明显分歧。对于国民党破坏团结抗战的反动行径,中共中央采取了坚决斗争的立场。但是,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和武官崔可夫只是向国民政府提出一般交涉,暗示内战意味着灭亡,苏联可能停止援助,并未公开表示支持中国共产党。不久,崔可夫又再三要求中国共产党对蒋让步,采取缓和态度,以此换取蒋介石的抗日。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也先后于1月20日、2月5日两次致电中共中央,要求中国共产党严格掌握政策,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不可主动破裂统一战线,不可另起炉灶,而应将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亲日派。对此,中共中央断然拒绝了苏联的要求。毛泽东通过周恩来向崔可夫表示,我们对蒋介石让步,是危险的,“目前是迫蒋对我让步时期,非我对蒋让步时期”。毛泽东在1月20日致周恩来的电报中说:“远方(指共产国际和苏联——引者注)的政策与我们所想的相左,三个月来几经往复,尚未解决。故目前我们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目前还只能取守势。”^①1月25日,毛泽东再电周恩来,表示:“我们决不能再容忍,我们决不能怕破裂,否则我们就要犯严重错误。”^②这是

① 《皖南事变(资料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84页。

② 《皖南事变(资料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90页。

中共中央第一次公开而直接地抵制苏联的意见。事后，季米特洛夫还致信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斗争横加指责，要求以妥协退让来改善与国民党的关系^①。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在总结这场斗争的经验时指出：“极端地复杂的中国政治，要求我们的同志深刻地给以注意。英美派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既然还在抗日，其对我党既然还在一打一拉，则我党的方针便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任何的人民革命力量如果要避免为蒋介石所消灭，并迫使他承认这种力量的存在，除了对于他的反革命政策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便无他路可循。”^②通过这场斗争，中国共产党更进一步坚定了独立自主的信心和决心，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关系也由此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不再围绕着苏联的指挥棒转圈圈了。

第二，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出发，坚持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从战略上配合和支持苏联战场。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共产党肩负着带领中国人民驱逐日本出中国的重任，同时又承担着支持各国特别是苏联的反法西斯斗争的国际主义义务。但是，由于苏联与中国共产党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同，在如何抗击日本侵略者问题上，是从战略上配合苏联战场，还是从战役上配合苏联战场，存在着明显分歧，有着不同的军事战略方针。

苏联对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是，让中国在东方牵制日本，以确保苏联的东部边境的安全，同时避免两线作战。因此，苏联希望中国共

① 《苏联新发表的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档案文件》，《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8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2页。

产党放弃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战略方针,集中兵力去打大仗来牵制日军,以减轻苏联的压力。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军初战得手,日本也遥相呼应,蠢蠢欲动,苏联承受着两面夹击的巨大压力。为此,1941年7月至1942年5月,苏联多次致电中共中央,要求出动八路军主力部队集结北上,切断通往北平、张家口、包头的铁路交通线,阻止日军的反苏战争准备。共产国际也发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指示。对此,中共中央从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长远利益出发,既没有盲目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高喊“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也没有盲目出兵,而是对配合苏联作战问题采取了既积极准备,又稳妥谨慎的方针。7月2日,毛泽东在致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日苏战争有极大可能爆发,我军必须准备配合苏军作战,“但此种配合,是战略的配合,是长期的配合,不是战役的配合与一时的配合,请在此基础上考虑一切问题”^①。因此,当崔可夫询问中共中央准备以何种军事行动援助苏联时,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假若日本进攻苏联时,我们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假若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垮,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这不管在哪一方面都是不利的。因此我们采取巩固敌后根据地,实行广泛游击战争,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而不采孤注一掷的方针。”毛泽东嘱托周恩来“此条请告崔兄并请他转告远方朋友”^②。

对中共中央的上述决策,苏联领导人十分不满,指责中国共产党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偏离国际主义立场,是保存实力避免对日决战等。季米特洛夫致电中共中央,连珠炮似的接连提出15个问题,对中国共产党进行责难,对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的态度进行批评。苏联

①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9页。

②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9页。

驻延安记者、共产国际联络员弗拉基米洛夫也指责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的危险“漠不关心”，对苏联怀有“敌意”^①。但是，中共中央顶住了苏联的压力，不改初衷，仍然坚持以游击战长期配合苏军的基本方针。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和苏联之所以在“保卫苏联”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主要在于对民族利益认知的差异和军事战略方针的不同。在中共中央看来，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身的民族利益，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不可能脱离各国无产阶级自身的民族利益而存在，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是一致的。正如毛泽东在六届三中全会上所指出：“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我们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被打倒了，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因此，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②这是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中国革命与苏联革命、中国党与苏联党的利益关系，制定正确的对苏政策的理论基础。1943年6月27日，中共中央在《解放日报》的社论《再论共产国际的解散》中，阐明了自己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问题上的鲜明立场。社论指出：“无论有一种什么形式的国际团结，总一定自始至终，忠实于其本民族的真正利益，这也是很显然的。世界上决不可能真正有一种什么民族的特殊利益，要以牺牲其他民族或全人类的利益为条件，也决不可能有一种什么全人类的国际利益，要以牺牲某一民族或各个民族的利益为条件。”^③正是这种正确的对苏政策，使得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最艰苦的年代里，顶住了日军的猖狂进攻，牵制

① [苏]彼得·弗拉基米洛夫著，吴文捷等译：《延安日记》，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6、3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0—521页。

③ 《再论共产国际的解散》，《解放日报》，1943年6月14日。

了大量在华日军,使日军北攻苏联的计划始终未能实现。也正是这种正确的对苏政策,使得中国共产党避免了再蹈冒险主义错误的覆辙,保存了实力,消耗了日军,为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

第三,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局利益着眼,不为意识形态所限制,积极开展全方位多边外交。

国际统一战线最初从理论上讲是不包括苏联的,因为各国共产党都是实施这一策略的主体。在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苏政策的基本立场是始终如一的,即坚定地站在苏联一边,拥护苏联的和平外交政策。这一立场既未因对英美政策的调整而改变,也未因苏联重蒋轻共而动摇。我们从中国共产党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英美的绥靖政策、《苏日中立条约》和美日秘密谈判完全不同的态度中便可窥一斑。为了维护自己的安全利益,1939年8月23日,苏联与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1941年4月13日,苏联又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苏联通过与德国和日本的秘密交易,划分了各自在欧洲和远东的势力范围。对于这两个条约,国际国内一片哗然,对苏联抨击者甚多。但是,中国共产党都表示拥护和赞成,并给予了积极评价。对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共中央认为它是“苏联社会主义力量增长和苏联政府坚持和平政策的结果”,不仅“打破了张伯伦、达拉第等国际反动资产阶级挑动苏德战争的阴谋”,而且“打击了日本,援助了中国,增强了中国抗战派的地位,打击了中国的投降派”^①。对于《苏日中立条约》,中共中央发表“意见”,认为:“这个条约的意义,首先在于巩固了苏联东面的和平,保证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安全发展。而苏联的这种和平与发展,也即是全世界劳动人民与被压迫民族的利益”;“深信苏联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80页。

是会继续援助中国的。苏联的外交政策,是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决不为帝国主义的利益束缚自己援助被压迫民族的正义行动的手足”^①。虽然学术界对这两个条约的评价还存在争议,我们也不清楚中国共产党对这两个条约持赞成态度的深层原因(是主观认识上的失误,还是外交策略上的考虑),但毋庸置疑的是,意识形态因素在其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尽管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在意识形态上是相同的,但苏联领导人对中国共产​​党抱有根深蒂固的偏见。1940年秋,斯大林对即将赴华任苏联驻华武官和蒋介石军事顾问的崔可夫说:“中国共产党也正是依靠最贫穷、受压迫最深和没有文化的农民,中国共产党对成长中的工人阶级估计不足,而这不能不给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口号及其对革命政治任务的理解方面打下烙印。中国共产党中的民族主义倾向相当严重。在中国共产党队伍中国际主义团结感发展得不够。”^②或许正是由于这种偏见,苏联对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实行的是两面政策:一方面利用意识形态作纽带紧紧束缚住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共产党为其外交战略服务;另一方面又将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相对立,在同国民党政府发展关系的同时,限制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这正是苏联支持王明和重蒋轻共的原因所在。

在抗日战争中已经成熟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深深懂得国际关系的复杂多变,懂得发展对外关系不应受意识形态的局限。因此,中国共产党从服务于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这个中心任务出发,从一开始就主张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大胆突破意识形态的限制,不受苏联外交格局的束缚,积极发展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关

① 《国际条约集(1934—194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303—306页。

② [苏]瓦·崔可夫著,万成才译:《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34页。

系,争取更多的国际同情和支持。苏德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又进一步从理论上提出了以是否反法西斯作为划分世界政治势力的标准^①,为发展与英美的联系与合作奠定了基础。通过发展对外关系,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影响,积累了外交工作的初步经验,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意识的增强。

当然,受当时认识水平和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共产党在对苏政策上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严重失误。这主要体现在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苏日中立条约》的评价上。这两个条约的共同点在于苏联从保障自身的安全利益出发,分别与德、日划分了各自在东欧和远东的势力范围,特别是《苏日中立条约》附件规定苏日双方相互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即外蒙古)和“满洲国”的领土完整与边界的不可侵犯性,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伤害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感情,充分反映了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产生了不利影响。而中国共产党在评价时对此视而不见,不加分析地一概予以肯定和支持,其结果是模糊了是非界限,造成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使自己处于被动尴尬的局面,其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①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页。1941年7月6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的电报中提出:“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凡反法西斯者就是好的,凡助法西斯者就是坏的,以此来分界限,不会错的。”

第二章

拥苏联美：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发展

一、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的拥护和对苏关系的淡化

苏德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重新提出建立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始终是以苏联为国际统一战线的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和发展与英美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另一方面坚定地站在苏联一边，支持和拥护苏联的外交政策和反法西斯斗争。

苏德战争爆发前夕，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形势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美日是否可能达成妥协，造成牺牲中国反对苏联的东方慕尼黑阴谋；二是德国是否可能发动侵苏战争。对于第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通过对英美对日政策的变化观察和分析，逐渐认识到发生东方慕尼黑的危险性在减小。对于第二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密切注视着德国在欧洲的动向。当周恩来在重庆获悉德国将于1941年6月21日进攻苏联的情报后，立即将这一消息电告了毛泽东。中共中央随即又将这一情报电告了斯大林。但是，当时苏德两国政府正在对所传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的说法进行辟谣，认为这是英

美企图挑拨苏德关系^①。因此,中共中央的电报没有引起苏联领导人的重视和警觉。

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中心,中共中央迅即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即坚决支持苏联抗击德国法西斯的侵略。6月23日,毛泽东在《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党内指示中指出,德国进攻苏联,“此种背信弃义的侵略罪行,不仅是反对苏联的,而且也是反对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的。苏联抵抗法西斯侵略的神圣战争,不仅是保卫苏联的,而且也是保卫正在进行反对法西斯奴役的解放斗争的一切民族的”。为此,毛泽东提出了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三项主要任务:一是坚持国共合作,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此来援助苏联;二是坚决反对大资产阶级中的反动分子的任何反苏反共活动;三是联合英美及其他一切反对法西斯侵略的人们,反对共同的敌人^②。6月26日,《解放日报》发表《世界政治的新时期》的社论,阐明了苏德战争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指出苏德战争改变了欧洲战争的性质,成为世界政治新的转折点。6月29日,《解放日报》发表《苏必胜,德必败》的社论,全面阐述了苏联战胜德国的历史必然性,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苏德战争前途的正确认识。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还以自己向日作战和力促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建立的实际行动,来支持苏联的反侵略战争。

苏联是欧洲反法西斯战争的主力军,苏德战场的形势如何,不仅关系到欧洲战争的胜败,而且直接关系到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前途。因此,中国共产党非常注重从舆论上宣传苏军的战绩,从战略上配合和支持苏联。1942年是苏联卫国战争最为紧张和激烈的一

^①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4—15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6页。

年。英美等国为了自身的利益，一再拖延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对此，中国共产党尽其所能，先后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120多篇社论和短评，向英美晓以利害，呼吁尽快开辟欧洲第二战场。这在政治上对英美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舆论压力，对苏联是一个有力的支持。2月23日是苏联红军建军24周年纪念日，毛泽东和周恩来为《新华日报》撰文纪念苏军建军节。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一周年，《新华日报》发表《苏德战争一周年纪念》的社论，高度赞扬了一年来苏联红军的辉煌战绩。6月下旬斯大林格勒战役拉开序幕后，中共中央紧紧抓住这一契机，通过《新华日报》对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战况进行了追踪报道，热情讴歌了苏联红军英勇奋战、重创德寇的光辉业绩，给苏联人民的正义之战以有力的声援。10月12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高度评价斯大林格勒战役“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甚至也不但是这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①。11月7日是苏联十月革命25周年纪念日，毛泽东专门撰写纪念文章，指出：“今年的十月革命节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战胜法西斯阵线的转折点。”“十月革命的旗帜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法西斯势力则必归于消灭。”^②1943年2月21日苏军建军节前夕，毛泽东致电苏共中央和斯大林表示祝贺，称赞“红军和苏联人民是抵抗法西斯暴力的中流砥柱，是创造新的和平世界的急先锋”。“自从红军开始对德战争，世界形势就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现在由于红军的胜利，新世界的未来面目也更加明朗，更加确定了。”^③由此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对苏联一直是采取拥护和支持的政策，对苏德战争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8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0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

给予大力声援和积极配合的。

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全力以赴投入反抗德国入侵的卫国战争之中,对中国的援助日渐减少,不仅中苏关系趋向冷漠,而且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也逐渐减少。正如周恩来所说:“在这个时期,共产国际对我们党的内部事务还是有些干涉,甚至在组织上也还有些干涉。但这个时期比共产国际初期对我们党的干涉少,比中期就更少。后来战争打起来,对我们党的干涉就很少了。我们中国党这时已经成熟,和共产国际的来往不多了。”^①这些变化在客观上为中国共产党彻底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创造了条件。在此之后,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内部事务也有一些干预,如1941年10月7日,季米特洛夫致电中共中央,质询中国共产党究竟准备采取什么措施在军事上打击日军支援苏联。1942年2月2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通过决议,不指名地批评中国共产党指望苏联的胜利却不积极开展军事行动,并警告中国共产党绝对不应与苏联有外交关系、与英美有利害关系的国民党政府采取公开敌对的立场。对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干预,如前所述,中共中央本着“不可不听,又不可尽听”^②的原则,从中国抗战和中国革命实际出发进行了积极的抵制。

随着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环境的恶化,新疆盛世才的反苏反共使中国共产党与苏联联系的交通要道发生阻隔,加上在统一战线和对日作战问题上的分歧,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对苏关系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到,要真正实现中国革命的独立自主,就必须从根本调整对苏关系。在1938年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已经向全党提出了马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2页。

② 《毛泽东关于团结对敌问题给周恩来的指示》,1941年5月14日。

克思主义的民族形式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为调整对苏关系奠定了思想基础。

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1941年5月开始,中共中央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开展了整风运动。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专门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检讨党在历史上的政治路线问题,第一次公开揭露和批评了王明的路线错误。会议确认:(1)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从四中全会就开始,到“九一八”事变后则发展为路线错误;(2)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的组成,王明负有重要责任;(3)王明到苏联后,虽然在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上和五中全会以后的中央有不同看法,但在形势的分析和政治路线上是完全相同的,并且一直给予了很大的支持;(4)抗日战争期间,王明在负责长江局工作期间,也犯有严重错误。不难看出,中共中央对王明错误的揭露和批判,从理论上是为了克服教条主义思想的束缚,端正党的思想路线,从更深层次上则开始触及了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

1942年2月,毛泽东相继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演讲,从此,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内展开。整风运动的目的在于克服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主要是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破除对共产国际这个国际指挥中心的迷信,加强全党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团结统一。

整风运动的开展,特别是对党内教条主义的批判,引起了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关注。最初他们对运动的性质还不甚了解,只是担心在苏德战争的紧要关头和抗日战争的严重情况下,发动这样一场运动会妨碍中国党把全部力量和主要精力投入到保卫苏联和牵制日军的任务上来。5月11日,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派出弗拉基米洛夫(化名孙平)以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联络员兼塔斯社随军记

者双重身份飞抵延安,其任务是收集情报和敦促中国共产党“结束内战,与国民党联合行动”^①。在整风运动期间,弗拉基米洛夫向莫斯科和季米特洛夫反映了大量的不实情况。他把毛泽东反对教条主义的言行与中共中央拒不执行苏联和共产国际关于牵制日军保卫苏联的指示相联系,主观臆测整风运动包含着清除苏联和共产国际影响的目的,指责中国共产党是在搞“清党运动”、“搞无原则的派别斗争”^②。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虽然‘二十二个文件’(指整风运动的学习文件——引者注)没有公开的反苏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言论,但把这些文件这么一编,再配上必读的中国小说,其目的是要助长民族自大感和反苏情绪。教条主义者这个叫法,体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对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公开厌恶。”弗拉基米洛夫的报告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虽然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因忙于决定苏联命运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无暇对中共中央表示更多的指责,但它使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相信,中国党内目前所发生的一切“极不正常”的现象,都是党内权力斗争的结果,怀疑在中国共产党的“部分干部中存在着一些对苏联的不健康情绪”^③。对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多次向苏联和共产国际发报解释整风运动的内容和目的,并向弗拉基米洛夫全面介绍了整风运动的情况,劝他对整风运动做出正确的估计。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不但弗拉基米洛夫听不进去,共产国际领导人也半信半疑。

当延安整风运动正在紧张进行之时,共产国际也在酝酿解散。

① [苏]彼得·弗拉基米洛夫著,吴文镜等译:《延安日记》,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8页。

② 解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05页。

③ 《苏联新发表的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档案文件》,《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61页。

1943年年初，斯大林格勒战役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是，为了彻底消灭德国法西斯，苏联迫切希望得到英美等国的援助，特别是希望英美尽快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为此就需要首先在政治上消除英美对配合苏联作战的疑虑。同时，共产国际所属各国共产党已经成熟，并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共产国际继续存在的意义愈来愈小。

5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做出了解散共产国际的建议。5月21日，季米特洛夫致电中共中央，通报了共产国际主席团的决定并征求意见。6月10日，共产国际正式宣告解散。共产国际的解散对于正在开展整风运动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无疑“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①。它在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和共产国际关系史上，是一个旧的历史时期的结束，同时又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对此，中共中央给予了积极拥护和高度评价。5月26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许多帮助；但是，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的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共产国际的解散，将使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心与创造性更加加强，将使党与中国人民的联系更加巩固，将使党的战斗力更加提高。”^②同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他在高度评价共产国际历史功绩的同时，着重强调了共产国际解散的必要性。他指出：“革命的组织形式应该服从于革命斗争的需要”，远离各国实际斗争的、统一的国际组织已经无法适应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那种“非常复杂而且变化迅速的情况”，各国的革命斗争“要由各国共产党自己

①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0—41页。

来做”。共产国际的解散,将有利于“加强各国共产党,使各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更加适应于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的目的正是使“中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更加适合抗战建国的需要”^①。毛泽东的报告从本质上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关系的新变化,即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她不再需要苏联和共产国际这个指挥中心对中国革命指手画脚了,完全有能力根据中国的具体实际制定出符合中国革命利益的政策和策略。5月28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共产国际底解散将使中国共产党人以更大的责任感、更大的信心、更大的创造性,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站在革命斗争的先锋岗位上来更好地更有效地工作,来加强与千百万人民的联系,来进一步巩固党的组织和提高党的战斗力,借以服务于抗战大业”^②。

共产国际解散后,苏联对中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干预逐渐减少,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进一步加速。7月8日,王稼祥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首次明确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强调它是“引导中国民族和共产主义到胜利前途的保证”^③。10月上旬,全党整风基本结束。经过整风运动,从反对教条主义的思想高度,彻底结束了长期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盛行的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结束了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发号施令的历史,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此,中国革命走上了独立发展、不断胜利的道路。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共产国际解散后,苏联和原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中国共产党内部事务仍有干预。1943年12月22日,季米特洛

①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22页。

② 《论共产国际的解散》,《解放日报》,1943年5月28日。

③ 王稼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解放日报》,1943年7月8日。

夫就中国共产党党内状况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关于政治问题。不言而喻，共产国际解散之后，它原来的领导人当中谁也不能干预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但是从私人友好的角度，我不能不向您谈谈中国共产党党内状况在我这里所引起的不安。您知道，从1935年起，我曾有幸近距离地并常常是直接地研究中国问题。因此据我所知，我认为减少同中国外来占领者的斗争和摆脱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方针，在政治上都是错误的。在中国人民之民族解放战争时期，这种方针有可能使党处于脱离人民群众的孤立境地并可能导致内战的危险加剧，对此可能只有占领者及其在国民党中的走狗感兴趣。我认为，指控周恩来和王明执行了共产国际建议的民族战线政策，似乎因此他们将党引向分裂，从而开展反对他们的运动，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像周恩来、王明这样的人，最好不要让他们离开党，而要保留他们并尽量为党的事业利用他们。”^①历史事实表明，季米特洛夫的来信中对中国共产党在对日战争、统一战线和整风运动方面的指责是毫无根据的。它曲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歪曲了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的目的，反映了苏共仍以老子党和指挥中心自居，企图继续干涉中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目的。对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采取既坚持原则又维护中苏两党友好关系的态度，妥善地处理了这封来信。

1944年1月2日，毛泽东致电莫斯科告之已收到季米特洛夫的来信，并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中的任务、政策和为之奋斗的基本目标。1月6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邀见弗拉基米洛夫等，向他们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整风运动的目

^① 《苏联新发表的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档案文件》，《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

的、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拥护苏联与共产国际的情况。1月7日,毛泽东亲自到弗拉基米洛夫的住处,向他解释中共中央在处理党内问题和对外政策问题上所实行的路线。随之,毛泽东又亲笔书写了一封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稿,要弗拉基米洛夫立即拍发莫斯科。电报再次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中遵循的原则,对季米特洛夫的心情表示感谢,希望他冷静思考,正确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政策,强调中共中央一直都在采取有力措施来加强党的团结和统一^①。对于弗拉基米洛夫本人,中共中央并没有因为他的错误言行而让他离开延安,而是仍然与他友好相处,直到抗战胜利后他离开延安回国。

中共中央对季米特洛夫来信的妥善处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不断成熟,从中也折射出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即由过去的从属关系转为独立自主,由“苏联中心论”转为以中华民族和中国革命利益为中心。

总之,经过延安整风,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改变了对苏联言听计从的情况,实现了自己的独立自主。因此,延安整风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一场克服教条主义束缚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同时也是一场全面摆脱苏联和共产国际干预和指挥的政治运动。但是,独立自主并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改变对苏联采取的友好合作政策。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始终与苏联保持着友好关系。据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师哲回忆,中国共产党与苏联之间的秘密电讯联系从未间断,通过这种秘密渠道,中共中央不断地将中国局势和中国共产党情况通报给苏联领导人,只是苏联领导人极少再对中共中央指手画

① 参见王秀鑫:《对1943年12月22日季米特洛夫给毛泽东的信的评述》,载黄修荣主编:《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新探》,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492—493页。

脚了。此外,中国共产党驻重庆代表团也与苏联驻华外交人员保持着密切联系。就对苏政策来说,中国共产党一直将苏联看做中国革命力量的最可靠的朋友和支持者,国际反法西斯阵线的领导核心和主力军,对苏联支持和拥护的立场从未改变。

二、中国共产党对美新政策的制定与外交新局面的开辟

(一)外交工作重点的转移

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建立后,整个反法西斯战争和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以美苏英为核心的反法西斯阵线与德意日的法西斯阵线的对立,成为国际政治的基本格局。在这一政治格局中,不同民族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团结在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旗帜下,相互支援,通力合作;另一方面,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融为一体,不仅中国战场的军事形势与世界其他战场息息相关,而且任何中国国内政治问题的解决都必然受到国际因素强有力的制约。在新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加强与美苏等国的联系与合作,巩固反法西斯阵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部团结,同时利用美苏的影响,敦促国民党实行政治民主化,为战后的和平建国奠定基础。简言之,就是加强合作,以外促内。为此,中共中央及时地调整了对外政策,实现了对外工作重点的转移。

在苏德战争爆发以前,由于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没有任何官方联系,民间交往也微乎其微,美国对华政策摇摆不定,因此,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的重点在苏联,通过推动苏联积极援华来增强中国的抗日力量,通过利用苏联的影响来遏制国民党的投降分裂企图。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集中全力投入同德国法西斯的殊死斗争之中。严酷的战争形势,使苏联既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关注和干预远东国际事

务。为了避免两线作战,苏联从自身利益出发,对日本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扩张采取了严守中立、暂不介入的姿态,并陆续撤走了在中国作战的飞行员和大部分军事顾问、技术专家,停止了对华军事援助,中苏关系趋于冷淡。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意识的增强和共产国际的解散,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也呈日渐减少的趋势。这表明,苏联在中国抗日和内政问题上的影响力正在明显地迅速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显然已不可能再把苏联作为自己外交工作的重点了。

与苏联对华援助减少和影响力下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力迅速上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正式结盟,美国成为当时唯一能够在军事和经济上大规模援助中国抗日的国家,中美关系进入“蜜月”时期。从1941年至1943年美国从其全球战略和在华利益出发,逐渐形成了战时对华政策。它包括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采取共同行动,有效地进行战争。第二个目标是在战争之中或战争之后,承认中国是大国,她享有与强大西方盟国——俄国、英国和美国平等的地位并得到复兴。”^①为了实现这两个目标,美国政府采取了支蒋容共的方针。一方面,美国为了击败日本,需要中国军队的合作和中国战场对日军的牵制。为此,美国在经济和军事上向国民党政府提供了5亿美元财政贷款和8.7亿美元军事租借物资;在政治上宣布废除在华不平等条约,推行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另一方面,美国不赞成国民党的反共内战政策,希望国共两党团结,要求国民党政府进行民主改革,并积极谋求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美国对华政策中的这些积极因素,是符合中华民族和中国革命利益

^① [美]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页。

的，与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所追求的目标也是相吻合的。

中国共产党敏锐地意识到了远东国际力量对比和美国对华政策的细微变化，认为利用美国对国民党的影响，促进中国国内政局的好转，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中国共产党深知，在当时的条件下，仅凭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力量还不足以抑制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欲望，迫使国民党接受民主改革的主张。因此，必须借助国际上各种不愿看到中国陷入内战，希望中国实行民主改革的力量。中国共产党认为，美国是牵制国民党降日反共的一支重要力量，如果能够成功地开展对美外交，将有助于实现自己的主张，从长远看，也将有助于战后中国的和平统一。而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在军事上反日的共同目标、在政治上要求国民党改革的共同愿望，使双方的联系和合作成为可能。基于这种认识，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更为积极和主动的态度，重点开展对美外交工作。1942年5月，周恩来在重庆通过斯诺转告美国政府，希望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和美国记者访问延安，并委托斯诺捎信给美国总统私人代表居里，建议美国政府将援华物资的一部分提供给中国共产党军队^①。6、7月间，周恩来三次会见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政治顾问约翰·戴维斯，建议美国派遣一个军官小组在山西、陕西建立观察站。8月6日，周恩来致函居里，希望美国采取措施，使美国援华租借物资能确实用于抗日，否则，国民党可能囤积这些物资用于战后对付反对派，并希望美国能派正式代表前往延安访问^②。11月20日，周恩来在会见美国驻华使馆参赞范宣德时表示，“外国（显然是指美国——作者注）对国民党的影响，可能是使局势能够得到改善的唯一的”，建议美国

①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532页。

② 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1942年中国卷，华盛顿1956年版，第227页。

在与中国政府打交道时,强调“美国希望看到真正民主在中国得到发展”,并“对作为反法西斯战争参加者的中国共产党军队要给予某种承认”,“在美国的对华援助中,共产党军队能得到恰当的份额”^①。1943年1月,美、英分别与中国签订平等新约,废除了英、美在华特权,中共中央专门作出决定,对英美废除不平等条约表示支持和赞成,并举行了隆重的军民庆祝大会。3月16日,周恩来会见戴维斯,再次邀请美国向抗日根据地派驻代表,以搜集日军情报。

中国共产党主动加强对美外交联络工作,其目的在于:(1)通过接触使美国政府了解中国共产党,争取美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是中国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认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2)推动美国采取更加现实和灵活的对华政策,逐步与中国共产党建立正式的官方关系,并切实开展政治和军事上的合作,以便在战时更有效地对日作战,在战后帮助中国实现和平民主。(3)希望美国能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解决国共关系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推动国民党改变其反共反人民的错误政策。尽管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并没有完全达到自己的目的,但也收到一定成效。美国驻华外交和军事人员开始以比较客观、公正的态度认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纷纷向美国政府建议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官方联系,促使美国政府更加关注中国共产党的动态和国共关系的变化。

中国共产党的对美外交攻势在制止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第三次反共磨擦活动中收到了明显成效。1943年3月,蒋介石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大肆鼓吹“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主

① [美]约瑟夫·埃谢里克著,罗清等译:《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76页。

义论调，诬蔑和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是“新式军阀”、“新式割据”，为发动反共磨擦制造舆论。6、7月间，蒋介石频频调动军队，加强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包围，并伺机以重兵闪击延安，国共关系变得异常紧张。为了制止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三次反共磨擦，中共中央一方面从舆论上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在军事上做好自卫反击的准备；另一方面加紧对英美的外交活动，利用英美的影响协助制止国民党的反共阴谋。7月4日，毛泽东急电董必武，指出：蒋介石调集20余师兵力包围陕甘宁边区，战事有在数日内爆发的可能，形势极度紧张。须立即将上述情况向外传播，发动制止内战运动，特别通知英、美有关人员。7月9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进一步强调在做军事准备的同时，必须大力进行政治动员，开展宣传工作，并将此种宣传散播到西安、重庆各地及英、美、苏各国^①。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立即将国共关系恶化的材料直接送给英、美驻华大使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反共磨擦不仅遭到中国共产党的有力反击，也遭到了国际舆论的激烈抨击。美国的《纽约时报》、《先驱论坛报》等有影响的报刊纷纷撰文批评国民党的内战政策，美国政府也对此作出了强烈反应。7月10日，当美军参谋长马歇尔收到驻华美军司令史迪威关于中国面临内战危机的报告后，立即向当时正在美国访问、寻求美援的宋子文明确表示，如果中国内部爆发一场武装冲突，将给盟国的地位与努力带来不良的后果^②。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霍恩贝克也向宋子文表示，希望中国避免内部冲突。受到压力的宋子文不得不电告蒋介石，美国严重关注国共冲突，希望冲突能够避免。美国驻华使馆官员在与国民党方面接触

①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49、453—454页。

② 《美国外交文件》，1943年中国卷，第98页。

时也一再表示,中国爆发任何内战性质的冲突,都将是重大的不幸。英、美、苏等国大使还召开会议,警告蒋介石不得发动内战,否则将停止援助。美国政府在反复研究了美国使馆的报告后,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三点建议:1. 中国内战应当避免。国内斗争应通过和平的政治手段加以解决。2. 可以暂时通过中国所有党派都参加的某种政治联合来解决国内斗争,然后在中国建立民主立宪政府,更持久地解决问题,所有党派都将根据法律在该政府中平等发挥作用。3. 国民党必须通过自我改进和实行社会经济改革,使自己有资格保持权力和拥有民众的支持^①。面对强大的国际压力,特别是美国的直接干预,加上军事上也无机可乘,国民党第三次反共磨擦在还没有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武装进攻的情况下便被制止了。9月13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上不得不宣布,中共问题是“一个纯粹的政治问题”,“应该以政治方式来解决”。

国民党第三次反共磨擦之所以能够被迅速制止,除了中国共产党针锋相对的坚决斗争外,还得力于中共成功地开展了对美外交活动,这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利用美国的影响制止国民党反共活动最为成功的一例。这一事件也反映出美国已经成为影响中国政局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任何政治问题的解决都不能不考虑美国的对华政策。因此,利用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可利用之处,适时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妥善处理对美关系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最为紧迫的议题。

(二) 美国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之动因

太平洋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为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进

① [美]赫伯特·菲斯著,林海等译:《中国的纠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3页。

行了艰苦的努力,以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充分表达了愿与美国在共同抗日基础上进行合作的诚意,然而却未能为美国所理解和接受。究其原因,不外乎两个:其一,由于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进行长期的封锁和包围,美国并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状况及其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重大作用。正如谢伟思在1943年1月致美国国务院备忘录中所说:“由于国民党的封锁,现在得不到有关共产党地区情况的消息。我们得到的情况都是已经过时的几年前的东西,而且无论从范围和可靠性来说都是有限度的。”^①因此,在许多美国人看来,与中国合作就是与蒋介石合作,与中国结盟就是与国民党政府结盟,根本没有考虑到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其二,出于意识形态和外交战略的考虑,美国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由于国民党处于执政地位,又是美国承认的中国合法政府,双方在本质上存在着共同利益。因此,美国虽然清楚地认识到在中国战场上存在着两支抗日力量,却仍然选择国民党作为支持的对象,在军事上全力援助,在政治上大力扶持。在美国政府看来,只要全面支持国民党政府,就可以实现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美国的重蒋轻共政策,既反映了美国与国民党在反共问题上的一致性,同时也反映了美国对国民党的本质缺乏了解,蕴藏着双方在抗日问题上的矛盾和冲突。随着战局的演变,美国对中国问题的了解愈来愈深入,对战后世界事务的考虑愈来愈多,事实证明,美国的这一政策是不切实际和行不通的。

从1943年起,美国开始寻求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与合作,这不仅是为了加速战胜日本,更主要的是考虑到战后世界政治格局。

首先,国民党的作战不力和政治腐败引起美国政府的不满和失

① [美]约瑟夫·埃谢里克著,罗清等译:《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77页。

望。在太平洋战争初期,美国遭受日军重创。为扭转被动局面,贯彻其“先欧后亚”的军事战略方针,美国对华政策主要侧重于军事方面,也就是维持和加强中国抗战,利用中国战场拖住日本,同时考虑夺取中国沿海地区,作为对日反攻的基地。为此,美国曾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寄予厚望。但是,事与愿违。在蒋介石看来,现在由美国人接过同日本人作战的重担,他就可以集中力量准备战后与共产党进行不可避免的殊死斗争了。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国民党军事上兵无斗志、将无战勇,一触即溃,战斗力急剧衰减;经济上通货膨胀,工厂倒闭,民不聊生,人民贫困到了极点;政治上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特务统治,拒绝任何改革,人民的民主权利被剥夺殆尽。史迪威在日记和报告中这样写道:“(国民党)腐败,失职,混乱,经济,税收,盲和行,囤积,黑市和敌人买卖。”^①“中国政府是以恩威并施为基础,由一个无知、专制、顽固不化的家伙掌握的机构……只有外部影响能帮中国的忙——或者是敌人的行动将要毁灭它,或者必须形成某种革新思想并立刻付诸实施。”^②中国军队“处于令人绝望的状况,营养不良,领不到薪饷,未经过训练,没有妥善管理,由于贪污而腐败不堪”^③。不仅史迪威有这样的看法,其他美国在华官员也都有同感。中缅印战区司令部政治顾问戴维斯在一份备忘录中认为,国民党是一个“普遍缺少社会觉悟,公众信任 and 责任感”,“裙带关系和任人唯亲盛行,贪污受贿司空见惯”,顽固坚持独裁专制统治,完全没有群众基础的政治集团^④。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在访华期间曾说:“美国尽

① 夏同祖编译:《史迪威资料》,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20页。

② [美]赫伯特·菲斯著,林海等译:《中国的纠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3页。

③ [美]赫伯特·菲斯著,林海等译:《中国的纠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9页。

④ 《美国外交文件》,1943年中国卷,第258—260页。

力武装蒋介石的军队,但他的军队一战即溃;而华北及华中等地的抗日军队又被封锁,不能得到美国的援助……以前对蒋介石的传闻虽然很坏,但不能十分肯定;这次来华访问后,乃知所见比所闻更坏。”^①

1943年春夏蒋介石企图掀起新的反共高潮和1944年春夏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的大溃败,更是震惊了美国朝野,引起美国的不满和担心。以戴维斯、谢伟思、范宣德、艾切森为首的一批美国驻华外交官(他们会说汉语、熟悉中国情况,被人们称为“中国通”),由于对国民党的失望,开始怀疑国民党能否继续统治下去,并在世界政治事务中特别是在与美国利益攸关的太平洋地区充当美国的可靠伙伴。范宣德预言,国民党统治集团将难以在战后继续统治下去,因为“他们的唯一共同特征和共同目标是希望维持国民党在政府中的支配地位”,而丝毫不考虑民众的利益和社会变革的需要^②。谢伟思认为,“国民党和委员长的地位与过去10年的情况相比,更加虚弱。中国面临经济崩溃。这一点正在招致军队和政府机关的人心涣散。这是日益增长的政治不稳的主要原因之一……内部的弱点越来越严重,团结的进程正在朝相反的方向发展”。因此,“国民党已丧失了它的领导资格,因为它丧失了这样一个国家的一致,而且也不再是这样一个国家的代表,这个国家通过战争的实践经验,政治上正变得更加觉醒,并且越来越认识到国民党的自私的缺点”^③。很显然,面对国民党的日益衰落,尤其是不能在对日作战中发挥重要作用,如果美

①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7页。

② 〔美〕迈克尔·沙勒著,郭济祖译:《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16—117页。

③ 〔美〕约瑟夫·埃谢里克著,罗清等译:《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39、145页。

国仍然采取无条件支持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听任国民党继续专制、腐败下去,听任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那么,不仅会影响到美国的在华利益,而且会殃及美国的全球战略计划。因此,美国国务院远东司1943年2月在一份备忘录中指出:“有必要对这种局势加以认真研究,并考虑采取任何适当的行动以促进中国的统一,一种可能的路线是派遣美国官员访问共产党控制区。这样可以获得双重的利益,既可以向中国人表明我们对整个问题的关切,同时又可能使我们得到有关这个问题各个方面的更多的情况。”^①

其次,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壮大和作用的增强引起美国的关注和重视。与国民党战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节节胜利,军民士气高昂,根据地巩固。据统计,到1942年年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已经由抗战初期的9.2万人发展到45万人,抗击了63%的日军、80%以上的伪军^②。在根据地的民主政治与经济建设上也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已经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身在中国战区的美国军事、外交人员都逐渐认识到了这一点。从1941年起,他们先后向美国政府发回了一批有关中国问题的报告。这些报告通过对国共双方政治、军事状况的分析对比,揭示了一个无法否认和回避的结论,即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不仅在战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将成为战后中国的决定力量。他们认为,共产党是“真诚的民族主义者,渴望同美国合作以打败日本和重建中国,美国援助共产党人将有助于打败日本,并获得中国最生气勃勃和最进步的政

^① 《美国外交文件》,1943年中国卷,第205—208页。

^② 参见刘高华:《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系年要录·统计荟萃1931—1945》,海潮出版社1995年版,第312—313页。

治组织的友谊”^①。1943年1月，谢伟思通过对国共问题一年多的考察和研究，建议美国政府重视中国共产党在对日作战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共产党军队在我们共同作战的努力中可能有积极的军事价值，这是不容忽视的。通过这些部队控制着的土地，可以得到进入内蒙古、满洲和日军的华北基地的通道。俄国参加对日作战，会使他们的阵地的战略重要性提高。”^②但是，美国外交官的报告并没有为美国政府所重视，反而被斥责为“荒谬可笑”、“散布诽谤”。

真正引起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力量的重视是由于1943年的国共危机。1943年3月，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公然宣称：“中国从前的命运在外交”，“今后的命运则全在内政”，“准备于两年内决定命运”，消灭共产党，建立国民党一党统治的中国。这一反共宣传随着共产国际的解散更加甚嚣尘上。与此同时，蒋介石频繁调集重兵，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一时间，国共双方在西北地区呈现出剑拔弩张的紧张局面。这次国共危机与前两次国共危机的最大区别在于，它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国共斗争的焦点已经集中到战后如何建国的问题这一背景下发生的。因此，它不仅严重影响了盟军的对日作战计划，而且使远东的政治局势为之动荡，引起美苏两国对中国内部问题的强烈反应。7月14日，苏联驻华武官会见美国使馆代办艾切森，表示“从中国与国际间关系看，国民党应意识到，在目前对共产党发动军事进攻是不能令人满意的”^③。8月5日，苏联驻兰州代表在与谢伟思谈话中指出，国民党

① [美]迈克尔·沙勒著，韩济祖译：《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4页。

② [美]约瑟夫·埃谢里克著，罗清等译：《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73页。

③ 《美国外交文件》，1943年中国卷，第283—284页。

“企图以武力消灭共产党,是一个严重的错误”^①。8月11日,苏联武官再次到美驻华使馆表示对国共关系的担心,并一再探询,如果国共交火,美国将持何种态度,特别是在提供对华援助上所持的态度^②。同日,苏联报刊公开发表苏联著名记者、塔斯社重庆分社社长罗果夫的文章,批评国民党的抗战不力和对共产党的进攻,赞扬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抗战中的作用。文章特别指出,中国抗战能否胜利,取决于国民党领导人对民族团结这个基本条件的重要性的认识^③。这是苏联报刊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第一次公开发表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文章。

国共关系危机和苏联的强烈反应引起美国的极大忧虑。美国担心国共关系危机会直接影响对日共同作战,而苏联在战时或战后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会危及美国在中国乃至远东的利益。美国感到中国共产党已今非昔比,不容轻视,中国的统一和稳定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配合。因此,从1943年下半年起,美国开始调整对华政策,一方面对国民党施加压力,督促国民党迅速改善因新疆问题而日益恶化的中苏关系和妥善解决国共纠纷;另一方面开始寻求与中国共产党进行接触,了解中国共产党内外政策,为直接插手中国内部事务做准备。

此外,美国对中国共产党力量的重视还表现在美国在军事上有求于中国共产党。当时,美军为轰炸敌后日军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军队提供情报和营救降落在敌后的飞行员。更为重要的是,为了缩短战争进程,美国正考虑在中国华北、华中沿海地区登陆,建立若干

① 《美国外交文件》,1943年中国卷,第308页。

② [美]赫伯特·菲斯著,林海等译:《中国的纠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9—100页。

③ 罗果夫:《对于中国政府的批评》,《解放日报》1943年9月14日。

军事基地,就近攻击日本,而这些地区又多临近八路军、新四军所控制的地区,美军在这些地区又没有派驻一个情报人员。因此,美军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军队的配合和提供军事情报,以利于作出正确的军事决策。这是美国寻求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军事动因。

最后,全面了解中国共产党情况,为制定战后对华政策做准备。以1943年3月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苏联胜利为标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了根本性转折,胜利已成定局。美国开始考虑战后世界的政治格局,其对华政策的重心也由短期的军事目标向长远的政治目标转移。在罗斯福构想的世界蓝图中,战后世界格局将是大国体制,即战后世界事务将在大国控制的体制下解决。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苏联的胜利使美国意识到,德意日必将在战争中失败,苏联必将在战争中崛起,中国也必将在战后取代日本成为东方大国。在战后能与美国抗衡的只有苏联,而在将来的美苏争夺中,中国将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样,一个对美国友好的中国将大大有利于美国在战后同苏联争夺世界的斗争。1943年3月,罗斯福在与英国外交大臣艾登的谈话中表露了他的意图。罗斯福说:“中国既不会侵略,也不会成为帝国主义,而将成为抵消苏联力量有用的平衡力量……在我们与苏联发生任何严重政策冲突时,中国无疑会站在我们一边。”^①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上,美国不顾苏、英的揶揄和反对,坚持使中国跻入“四强”行列,享有对国际事务的发言权。然而,国民党政府能否担负起一个大国的责任,发挥一个大国的作用,却颇令人怀疑。罗斯福认为,影响中国大国地位的重要因素是中国内部的分裂和斗争,而妨碍中国统一的最大因素可能来自苏联的干预或共

^① [英]安东尼·艾登著,武雄等译:《艾登回忆录》,中册,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657页。

共产党的胜利。罗斯福担心日本战败之后,中国会燃起内战,那样将会出现美苏各站在一边进行干预的局面。美国不但会卷入中国的内战,而且会陷入与苏联的冲突之中^①。罗斯福更不愿看到国民党政府在国共斗争中垮台,从而产生一个亲苏的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为防止出现这种局面,罗斯福力求拉拢这两方面的力量。他企图以承认苏联在满洲享有特权为条件,来换取苏联不卷入中国内政的笼统保证;以对共产党的友好表示,来防止中国共产党倒向苏联一边而对美国产生不利的影响。罗斯福的如意算盘是,中国共产党将因得不到苏联的支持和看到美国的友好表示,而不得不与国民党妥协,参加国民党领导的“联合政府”。届时,一个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作为美国的政治伙伴,不仅可以在国际事务中提供支持美国的重要一票,而且还可以成为遏制苏联可能在亚洲进行扩张的缓冲地带。这是美国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政治动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对于美国的政治意图,中国共产党洞若观火。1944年6月28日,林伯渠和董必武在致毛泽东的电报中明确指出:“美国之积极要求派人常驻延安与华北,不仅是为了今天轰炸日本的需要,必然还另有目的”,这就是“详细了解我们与苏联的关系,现在是否受苏联支持”,“详细了解我们的建设方向,战后是否与美国合作,这是许多美国人心里的問題”^②。

美国最早提出与中国共产党进行直接接触和合作的是部分美国驻华使馆官员。1943年1月23日,谢伟思在致美国国务院的备忘

① [美]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2页。

②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7页。

录中,第一次正式提出“派遣美国代表访问共产党地区”^①的建议。3月10日和6月14日,戴维斯也在报告中向美国政府建议,“在中国共产党控制区设立总领事馆,并派遣军事代表团到那里去”^②。1944年1月15日,戴维斯再次向美国政府提出,“我们需要趁着还受欢迎的时候,立即派一个军政观察员代表团到共产党中国去搜集敌人的情报,协助并准备从那个地区开展一些有限的行动”。这样,“就会打破这种孤立状况,削弱(共产党——作者注)依附俄国的趋势,同时又可能遏止蒋介石试图以内战消灭共产党的愿望”。如果蒋介石不同意,就应当由总统直接向他提出要求,“运用我们足够的讨价还价力量制服他”^③。戴维斯的报告引起罗斯福的注意并被采纳。2月至4月,罗斯福曾三次致电蒋介石,要求派遣美军观察组前往陕北工作,均被蒋介石婉言拒绝或不予理睬。直到6月23日华莱士访华时,代表罗斯福向蒋介石重提此案,并说明国共和解问题与美军获取情报是两回事,应分别处理,蒋介石才勉强同意。这样才有了美军观察组的延安之行。

(三) 美军观察组与中国共产党对美合作政策的制定

1944年7月22日和8月7日,由中缅印战区情报官员包瑞德上校率领的由16名军人和2名外交官组成的观察组分两批飞抵延安。美军观察组又称“迪克西使团”^④。美军观察组赴延安的主要使命是

① [美]约瑟夫·埃德里克著,罗清等译:《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76页。

② 《美国外交文件》,1943年中国卷,第263页。

③ [美]伊·卡恩著,陈亮等译:《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29—130页。

④ “迪克西”(Dixie)原指19世纪中叶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南部反叛各州,源于南北战争后一首歌颂南部各州的流行曲。这里借用来指延安是中国的“反叛”地区。使“反叛者”归顺国民党政府,可以说是“迪克西使团”赴延安的真正目的。

了解华北日军、汪伪军队和中国共产党的具体情况,做出“共产党对战争所能做出的贡献的估价”和“共产党战争能力的潜在贡献的估价”,并探索“援助共产党军队,以增强他们战斗力的价值最有效的方法”^①。从它的组成人员和接受的指令上可以看出,它是一个具有军事和政治双重性质的代表团。在此之前,有美国 and 英国记者冈瑟·斯坦、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哈里森·福尔曼等参加的中外记者团也于6月9日抵达延安采访,从此拉开了美国与中国共产党联系的序幕。

美国政府冒着得罪蒋介石的风险派军事观察组到没有官方外交关系的共产党地区,其目的是十分明显的,首先是为了收集华北和西北地区的军事情报,以便将来对日反攻时得到共产党军队的配合和支持,同时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表达了对国民党政府抗战不力的不满,并企图通过拉拢中国共产党,避免中国共产党倒向苏联一边。但是,美军观察组赴延安参观考察,这是美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正式进行接触和开展合作的开端,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第一,它有利于打破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政治、经济、新闻各方面的严密封锁,有利于减少国民党顽固派突然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危险性,扩大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外的影响,改善中国共产党的外交处境。第二,它实际上意味着美国在某种意义上对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治、军事实体的承认,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关系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即:由原来的以新闻记者为主的民间接触发展到以美国军方和外交人员为主的准官方关系;由外交政策的宣传工作发展到有具体对象的实践活动;外交工作重心由争取美国援华抗日转为建

^① [美]包瑞德著,万高潮等译:《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31—32页。

立和开展与美国的合作。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国际地位提高的显著标志之一。第三,它有利于双方开展军事合作,从而加速战胜日本的历史进程。第四,中国共产党希望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发展与美国的关系。虽然美军观察组到延安的公开目的是收集情报和营救飞行员,但中国共产党希望这将导致与美国的进一步合作并取得美国的援助。周恩来认为,“不管怎样,现在门开了一条缝,只要遵循渐进的、谨慎的方针走下去,向着有限的合作前进还是有可能的。因此,美军观察组获得允许是一座里程碑”^①。他在给王炳南的信中更明确指出:“这一关打通了,以后当不难来往,你们的努力,有了代价,前途更将无限量发展。”^②

中国共产党对美军观察组给予了热烈欢迎和高度重视,认为这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中国共产党外交工作正式开始的标志。为此,毛泽东还亲自修改了《解放日报》社论,在原标题“欢迎美军观察组”之后加上了“战友们”三个字,称赞美军观察组的到来,“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对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实有重大的意义”^③。

美军观察组的到来,使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有了极大改善,争取国际力量的支持,开展国际合作的前景愈加明朗。形势的发展,要求中共中央制定更加积极的对美政策。8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了《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④。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外交文件。它就外交工作的内容、政策和应注意的事项作

① [美]约瑟夫·埃谢里克著,罗清等译:《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14页。

② 《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40页。

③ 《解放日报》,1944年8月15日。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14—318页。

了具体规定。其主要内容有：

第一，突出强调了国际统一战线工作即外交工作的重要性。它科学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国内所处的地位，指出美军观察组来延安不是一般的普通行为，而“是对我新民主中国有初步认识后的实际接触的开始”，“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虽然我们的外交目前还是“半独立的外交”（因为国民党政府还是中央政府，许多外交来往还须经过它的承认；另一方面，国民党不愿意中国共产党进行单独外交活动，只有冲破种种禁令和约束才能开展对外交往，因而又具有半独立性），但是，“如果国际统战政策能够做到成功，则中国革命的胜利，将必增加许多便利”。因此，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应注意学习做外交工作。

第二，提出要建立和发展与美国的全面合作关系。它指出：“就国家言，美苏英与中国关系最大，而在目前美英与中国共同抗日，尤以美为最密。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根据地的理由，为有对敌侦察及救护行动之需要，准此可争取其逐渐扩张到对敌作战方面的合作和援助，有了军事合作的基础，随后文化合作、随后政治与经济合作就有可能实现。”因此，“我们外交工作中心，应放在扩大我们影响，争取国际合作上面”。

第三，具体规定了外交工作的内容、政策和原则。它指出：“国际统一战线的中心内容，是共同抗日与民主合作”，“《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二十一条是我们党外交政策的总纲”^①。具体来讲，在军事上，允许同盟国的军事人员及其武装力量进入边区，并欢迎提供军事物资和技术援助；在政治上，欢迎同盟国在边区及主要抗日根据地

①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二十一条规定：“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文化与宗教的活动。”——《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7页。

派遣外交使节或外交机关；在文化宣传上，欢迎同盟国通讯社或政府新闻处在延安设立分社，或派记者来延安采访；在宗教方面，实行政教分离；在救济上，欢迎盟国提供医药器材和金钱的救济；在经济上，欢迎国际投资与技术合作。关于外交原则，它强调指出：“为使我们的外交政策和活动不犯错误，首先必须站稳我们的民族立场”，要反对在民族立场上的排外和媚外两种错误观念，“我们应一方面加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而不是排外，另一方面要学习人家长处，并善于与人合作，但决不是惧外媚外。这就是正确的民族立场”。

从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的主要内容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又有了新的发展。这就是：（1）正式确认发展与美国的关系是中国共产党当前外交工作的重点。因为在苏美英三个主要同盟国中，美国是与中国抗战事业关系最为密切的国家。（2）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对美外交工作的中心内容是抗日与民主合作，争取在军事合作基础上进而开展文化、经济和政治的全面合作。（3）指明了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的主要目标不仅在于合作抗日，还包含有对战后中国前途的考虑，即通过与美国合作，争取美国对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承认和援助，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创造条件。由此可见，这一指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美合作政策的正式确立，是指导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合作的纲领性文献。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制定了接待美军人员的基本方针：第一，积极主动地帮助美军观察组成员做好各项工作，对他们提出的问题，凡是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不要回避，要坦率、正面地予以解答，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但要讲原则，站稳立场，决不能作无原则的让步；第二，在生活上，要热情、周到，给予优待和照顾，但不搞铺张浪费；第三，在同他们广交朋友，建立友谊的同时，要掌握好交往的分寸，要注意维护国格、人格，表现共产党人的胸怀和气魄。中国共产党接待美

军人员的基本方针,与国民党政府对外交往中的奴颜婢膝形成鲜明对比,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对外交往中广交朋友与捍卫国家和民族利益相结合的基本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争取美国政府采取现实主义的对华政策,为了使美国政府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方针和政策,在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在延安期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多次与英美记者和观察组成员谈话,详细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内外政策,特别是对美合作政策。这些谈话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从战略高度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合作的必要性。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冈瑟·斯坦的谈话中指出:“中国不能使自己局限于只同一个或一个强国集团建立友好关系”,而应在相互尊重独立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与各国的关系。中国只依赖苏联而冷淡英美,或者只依赖美国而对苏联表示仇视、怀疑和不友好,都同样是错误的。因此,“中国的发展有赖于真正的世界和平,我国在国际上的作用,只有真诚地同一切国家合作,并帮助一切国家克服它们的困难才能提高”^①。毛泽东在同谢伟思的谈话中明确表述了中国共产党愿与美国合作的真诚愿望。他说:“中国 and 美国的利益,是互相关联和相似的。他们在经济和政策上交织在一起。我们能够而且必须一起解决问题。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易于合作。我们不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愿意欢迎它。”“美国无需害怕我们不愿意合作,我们必须合作,我们需要得到美国援助。”“我们不能冒险和美国发生冲突。”毛泽东甚至还主动提出希望美国在延安建立一个领事

^① [美]冈瑟·斯坦著,马飞海等译:《红色中国的挑战》,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420页。

馆^①。朱德则从军事的角度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与美国进行军事合作,共同抗日的重要性。他说:“中国抗日战争需要盟国帮助,同时盟国也需要中国抗战,这是相互帮助。”^②他和毛泽东、周恩来在同冈瑟·斯坦和谢伟思的谈话中还探讨了建立指挥中国军队,包括中国共产党军队在内的盟军最高统帅部的问题,认为它“对中国与盟国,对胜利与战后和平都是绝对必要的”^③。他们还建议,应当制订美军与中国共产党军队长期合作的计划,观察组或类似性质的组织应是常驻性的,在延安以外各根据地也应派驻小分队^④。

其次,希望美国运用其影响,在制止内战,促进民主改革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毛泽东在同谢伟思的谈话中着重批评了国民党的贪污腐败、不民主倾向和内战政策,认为“假如让这个国家在目前领导下听任自流下去,看来不可避免就会发生一场国民党挑起的内战”。那么,如何防止国民党发动内战呢?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国的影响,在“这些外国中,尤其最重要的是美国。美国在中国和远东日益增长的力量已经大到能够起决定性作用了。国民党在今天的处境下必须看美国的脸色行事”^⑤。既然美国对中国的影响如此重要,毛泽东进而又谈到中国共产党最为关注和最为忧虑的问题之一,即美国是否认识到国民党政府的不民主,美国是否愿意设法帮助中国实现民主。毛泽东认为,实现民主是中国能否真正获得统一的关键。

① [美]约瑟夫·埃谢里克著,罗清等译:《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60、254、243页。

② 《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65—266页。

③ [美]约瑟夫·埃谢里克著,罗清等译:《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08、214—215页。

④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308页。

⑤ [美]约瑟夫·埃谢里克著,罗清等译:《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50、251页。

他希望美国政府能对国民党政府施加足够的压力,促使其实行民主改革。毛泽东提出可以采用两种办法来施加美国的影响,一是“美国可以告诉蒋,为了战争他应当做什么。美国人给蒋的援助可以使他满足美国的愿望为条件”。二是“谈美国的理想。每位美国官员会见中国官员时,无论在中国或在美国,可以多谈民主”。“在华的每个士兵应当是民主的一个活广告。”当谢伟思询问毛泽东为什么只强调美国的重要性而不考虑俄国,毛泽东回答:“苏联不论参加远东战争或者中国的战后建设,都完全决定于苏联的情况。俄国人在战争期间损失惨重,战后会全力忙于自己的重建工作。我们不能指望得到俄国人的帮助。不仅如此,国民党由于其反共顽症,是反对俄国人的。因此,国民党—苏联合作是不可能的。而且对我们说来,寻求俄国援助只会使中国局势更糟。中国已经够混乱了!不管怎样,即使国民党要求,苏联的援助也是不大可能的。而且俄国不会反对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只要这些影响是建设性的和民主性的。”^①

再次,关于战后中国与美国进行经济合作的前景。毛泽东在同谢伟思的谈话中指出:“中国战后最急需的是发展经济。她缺乏独自发展经济所必需的资本主义的基础。她自己的生活水平是如此之低,不能再进一步压低来提供所需的资本。”但是,“中国必须工业化。在中国,这只有通过自由企业和外资援助才能做到”。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中国最缺乏的是资金、技术和人才。而“美国不仅是援助中国发展经济的最适当的国家,它也是能够充分参加中国发展经济的仅有的国家”。“美国和中国经济上彼此互为补充;他们不会竞争。”为了打消美国商人的疑虑,毛泽东还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经

① (美)约瑟夫·埃谢里克著,罗楠等译:《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56,259—260页。

济政策。他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只是自由主义的政策”，这一点也不激进，“即使最保守的美国商人，也不会在我们纲领中发现可持异议的东西”^①。

总之，从毛泽东等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中共中央确实对美国政府寄予了很大希望：一是希望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有正确的认识，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内外政策，真正同中国共产党进行真诚、友好的合作；二是希望美国政府在中国内政事务上发挥积极作用，尤其是在制止国民党发动内战和促进国民党实行民主改革方面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姑且不论这种希望是否过高，但它的确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内外事务问题上的高瞻远瞩和大无畏的气魄、胆略。这两点希望既是对中国共产党对美合作政策的进一步诠释，也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对美外交的主要目的。当然，中国共产党在制定对美合作政策时，绝不是把希望完全寄托在美国身上，而是建立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这与国民党的联美政策有着本质区别。

毛泽东等的谈话和中国共产党的积极配合对美军观察组成员产生了深刻影响。他们根据自己的耳闻目睹向美国政府发回了大量政治性报告。仅谢伟思一人在延安的头三个月中，就向华盛顿发回40多份报告。谢伟思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一支新兴的政治力量，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中国的未来是属于共产党人的。他在报告中写道：“那里不存在铺张粉饰和礼节俗套，言辞和行动上都是如此，官员和人民与我们的关系，以及中国人相互之间的关系，都是坦诚、直率和友好的”，“这里没有失败主义，而是信心十足，没有厌战情绪”。“如果事情像现在这样发展下去，时间将会使国民党走向崩

^① [美] 约瑟夫·埃谢里克著，罗清等译：《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327、260页。

溃,而共产党人成为中国最强大的力量”,“现在看来,最强大的力量肯定是共产党,而且在不要很长的时间之后,它就会统一全中国”。他建议美国政府不要采取片面支持国民党的政策,应同时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提供军事援助,并设法促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他在报告中说,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将不会违反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共产党应尽可能受到我们的同情和友好对待”,“给共军以任何美国军援,无论是直接的或是上面听到的某种间接方式,都定会对中国政局产生重大影响”^①。他认为,“为了战争,也是为了我们未来的在华利益,现在是我们采取更为现实的路线的时候了”。他建议美国在制定对华政策时不能希望与蒋打交道而不强硬,也不能希望解决中国问题而不考虑共产党人的力量。他还支持中国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认为“必须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必须建立一个包括各党派的真正的国民政府”^②。这些报告站在比较客观的立场上,以一个美国人的独特视角,较为真实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其中关于国共两党的分析与比较、对中国未来发展前途的预见、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建议更是不乏真知灼见。谢伟思的报告曾一度引起美国官方的重视。1944年9月,美国总统助理霍普金斯在关于谢伟思报告的批示中写道:“——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是以真正愿意在中国实现民主为基本点的。——那么,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就不会同美国的利益相抵触,这个党也就值得我们方面尽可能以同情和友好的态

① [美]约瑟夫·埃谢里克著,罗清等译:《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80—184、225、272—273页。

② 《美国外交文件》,1944年中国卷,第718页。

度相待。”^①谢伟思的报告也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留下了深刻印象，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愿意与美国合作使他很受鼓舞^②。受谢伟思等的报告的影响，在美国国务院内部逐渐形成了一条主张与中共合作的现实主义对华政策路线。遗憾的是，这些建议并未为美国政府所采纳。历史注定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关系的发展将经历一番波折。

三、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合作的基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积极寻求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和合作，而中国共产党也适应形势发展的变化确立了联美抗日政策，两个意识形态不相同的政治集团走到了一起，并不是偶然的。众所周知，任何政治力量之间的联合或合作，无论是阶级与阶级之间、党派与党派之间，还是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都必然存在一定的基础。这种基础就是共同的利益关系，没有共同利益作为基础，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联合或合作，即使有也是不牢固和暂时的。因此，认识两派政治力量之间的联合或合作是否存在可能性，关键看两个问题：一是客观上双方是否存在共同利益，这种共同利益既可以是眼前的，也可以是长远的；既可以是整体的，也可以是局部的；既可以是政治的、经济的，也可以是军事的、文化的。二是主观上双方是否明智地认识和寻求到共同利益。因为，共同利益有的是显而易见的，有的则是潜在的；有的合作主体对共同利益视而不见，有的则去积极寻找。在抗日战争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于抗日，在于国内政治的民主化。因此，是否有利于中国抗战，是否有利于实现国内政

① [美]伊·卡恩著，陈亮等译：《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49页。

② [美]迈克尔·沙勒著，郭济祖译：《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88页。

治民主化,是中国共产党判断是非、决定取舍的标准,也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对美政策的出发点。在抗日和民主这两个方面,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是有共同利益的,双方追求的近期目标大体上也是一致的。尽管这种共同利益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有时增强,有时减弱,有时明显,有时隐蔽,但这是一个客观存在。有了这一客观基础的存在,双方才能够走到一起。正如毛泽东所强调指出的:“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现在是将来仍然是,寻求友好的美国支持在中国实现民主和在对日作战中进行合作”,在战后“共产党将继续寻求美国的友谊和了解”^①。罗斯福也曾对斯诺说:“我们准备卷入中国的任何内战局势,我们希望中国一致抗日。”“我一直在那里同两个政府打交道,我打算继续这样做,直到把它们两方拉到一起为止。”^②然而,由于双方阶级利益的对立,决定了双方所追求的远期政治目标是根本不同的。中国共产党对美合作政策的远期目标是,促使美国政府逐步放弃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扶持,利用美国的影响,促使国民党放弃反共内战政策,实行民主改革,在战后建立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或有中国共产党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进而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统一、独立的新中国。美国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政策的远期目标是在战时和战后继续支持和援助国民党政府,促使其进行一定的民主改革,同时迫使中国共产党交出武装,逐步建立一个国民党居于主导地位、受美国控制的“联合政府”,使中国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可依恃的战略重心,从而实现美国控制中国、称霸全球的战略目标。

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不同,说明了双方合作的基础是脆弱的。这一合作的基础,其实是一个既有共同利益,又有根

① [美]约瑟夫·埃谢里克著,罗清等译:《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337页。

② 爱克安:《斯诺在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73页。

本利益冲突的矛盾统一体。合作基础的脆弱性,决定了双方的合作必然存在很大的缺陷,它只能是暂时的、有限的和不彻底的。下面就双方合作的基础逐一进行一些比较分析。

从军事基础来看,双方合作的目的都是共同抗日,这也是双方合作中最大的共同点。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美国是与中国抗战事业关系最为密切的国家。因此,要打败日本,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就需要美国的支援和合作。美国政府认为,国民党军队抗战不力,不堪一击,要使中国拖住日本,用尽可能少的牺牲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打败日本,这需要中国共产党军队的配合和支持。但是,在如何认识中国共产党军队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上,双方的看法又不完全一致。

如前所述,从1943年下半年以来,特别是从1944年春以来,美国逐步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这是推动美国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军事动因。但是,在1944年夏美军观察组到延安时,美国对中国共产党军事力量及其潜在作用的估计仍然是不充分、不深刻的。谢伟思在一份备忘录中这样写道:“甚至在美国观察组到达延安与共产党军队司令部建立了直接联系之后,对于共产党声称他们有效地控制着名义上由日本占领的华北、华中的农村地区的说法,观察组还一直迟迟不敢相信。”^①直到经过一番考察后,他们才确信:“目前它(共产党——作者注)控制着华北的大部和华中的一部,并且是那些土地上坚持抗日战争的唯一积极的力量。”^②他们还看到,中国共产党军队扼守着长江以北所有的日军交通线沿线

① [美]谢伟思著,王益等译:《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86页。

② [美]约瑟夫·埃塞里克著,罗清等译:《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71页。

及紧靠交通线地区的战略据点,中国共产党军队“是一支年轻力壮、营养不良、服装整齐、饱经战斗锻炼的志愿部队,它有良好的体质、很高的智力水平和非常高昂的士气”^①。因而主张“把美国的军事援助扩大给予中国共产党军队”^②。但是,美军观察组的这些看法和建议并没有为美国政府所理解和接受。在罗斯福看来,中国的价值就在于牵制几百万日军,要做到这一点只要保持住中国抗战的局面,国共之间不要发生内战就足矣。所以他对中国共产党在对日作战中能起多大作用并不怎么重视。他重视中国共产党是由于害怕中国共产党倒向苏联一边。美国对华政策的决策者甚至怀疑“共产党由于准备训练不足,是否能够或愿意对准备好得多的日本人发动并持续进行大规模的进攻”^③。特别是随着苏联答应在击败德国后加入对日战争和美军在太平洋上对日本的越岛进攻中取得节节胜利,美国政府逐渐放弃了在中国沿海登陆作战的计划,这样,美国对中国抗战的依赖性就大大减弱了,美国对与中国共产党军队合作的兴趣随之也就不大了,并认为与中国共产党军队合作对美国的意义并不大。美国的这种态度势必影响双方合作的坚定性和彻底性。

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是对日作战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它地处抗日战略要地,战斗力强,在战略和战术上都能配合盟军作战,因而美国与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合作具有特别重要的军事意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同英美记者和美军观察组成员的谈话中,详细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军队在配合

① [美]谢伟思著,王益等译:《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0页。

② [美]约瑟夫·埃谢里克著,罗清等译:《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79页。

③ [美]谢伟思著,王益等译:《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0页。

盟军作战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毛泽东在同谢伟思的谈话中强调指出：“我们拥有人民支援”，所以特别“能够战斗”；而且“我们的部队目前包围着汉口、上海、南京和其他大城市。我们是内线；国民党在更远的后方”^①。美军如果在中国登陆作战，与中国共产党军队合作的价值和前景将是十分可观的。朱德在与冈瑟·斯坦的谈话中进一步指出：“我们47.5万正规军（原译文误为475万——引者注），还有大约213万民兵和那些建立在敌后每个地方的稳固的战争根据地，可以起重大的作用。这些根据地的战略价值是不能低估的。”他认为，无论是在陆地、海洋和天空，还是在战略、战术上，“我们能够帮助盟国远征军进军时在任何地方穿过中国领土。我们能够有效地保护盟军的侧翼。并且对所有这些工作准备得特别好”。他强调，“我们还可以做更多的事。如果我们自己为作战所作的努力终于能和你们配合起来，我们打仗时就能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了”^②。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对于与美国的军事合作，态度是坚定的，愿望是真诚的，准备也是充分的。

从政治基础来看，双方都承认在共同反对法西斯侵略的基础上，不同社会政治制度之间可以也能够进行合作。中国共产党主张发展民主，实行新民主主义政治，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而美国也不赞成国民党的反共内战政策和蒋介石的独裁专制，希望国民党实行民主改革，这是双方合作的政治基础。但双方合作的政治目的却有着本质的区别。

1944年美国在寻求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时，在政治上是从三点基

① [美]约瑟夫·埃谢里克著，罗清等译：《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57—258页。

② [美]冈瑟·斯坦著，马飞海等译：《红色中国的挑战》，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293—294页。

本认识出发的:一是中国共产党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实际上是民主主义者或社会改革者,他们并不热衷于献身共产主义事业,执行的只是土地改革和自由贸易等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史迪威认为中国共产党只不过是摆脱压迫希望获得土地的“平均主义者”。戴维斯在一份报告中说:“中国共产党并非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们行政忠实,公开选举,经济自由,得广大民众拥护,与其说是共产党,勿宁说是农业民主党。”^①非常害怕共产主义的罗斯福显然也接受了这种观点。美国人对中国共产党性质的错误认识,表明他们并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企图通过接触促使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实现“和平演变”。二是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接触可以给国民党以压力,促使国民党进行改革,更好地维持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谢伟思认为,“给共军以任何美国军援”,“都定会对中国政局产生重大影响”。“对共产党的这种帮助可能使中国政治力量的对比产生如此深远的变化,以至足以使国民党会不得不革新它的政策,甚至更重要的是改革他们执行政策的方式,改变它目前的反动领导,从而走向与共产党人合作,这就会导致团结、民主和国家力量的统一。这些正是我们希望会产生的结果。”^②谢伟思这里所希望的结果,显然是继续维持国民党的统治,出现一个亲美的中国政府。这与罗斯福对战后中国前途的设想不谋而合。正如斯诺所说:“罗斯福可能想把中国共产党当做对蒋介石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以促使他走向革新他的政府,成为统一、进步的中国的核心。”^③三是只要美国对中国共产党表示友好,中国共产党就会使他们的行动与西方的政策相一致,

① [美]梁敬醇:《史迪威事件》,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221页。

② [美]约瑟夫·埃谢里克著,罗清等译:《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72、273页。

③ 王熙主编:《中美关系史论丛》,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63页。

否则,他们就会转向莫斯科,寻求苏联的援助。在美国看来,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是依附于苏联,并受苏联控制的,尽管共产国际解散后,这种控制有所减弱,但并没有消失。如果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赢得胜利,并倒向苏联,这是有违美国对日作战的初衷的。因此,只有在苏联介入中国事务之前,就促使中国共产党接受美国的影响和国民党的控制,这才符合美国的政治利益。谢伟思认为,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援助,将“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政策和目标,而这对美国来说是有长期的重大关系的”^①。戴维斯在1944年11月15日的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是俄国人将参加太平洋战争,我们必须坚决努力在政治上抓住中国共产党,而不让他们因(我们)未努力而完全倾向俄国人。”“若是俄国人进入华北和满洲,我们显然不能希望把共产党完全控制到我们这一边,但我们通过供应品的管制和战后的援助,可望在中国民族主义和独立于苏联操纵之外等方面,行使出相当大的影响。”^②

从这三个方面可以看出,美国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目的决不是要使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中占据中心地位,而是希望通过这种合作,诱使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和政权,实现美国和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的控制,从根本上避免中国共产党占据中国政治中心的可能。对此,中共中央南方局在1944年8月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电报中作了深刻剖析。电报指出:“目前美英人士已逐渐认识并承认有两个不同的抗战中国,今天美英对华政策,对太平洋战略,乃至对战后的世界和平计划,已不能不在蒋政权外同时估计我党的动向,了解我党的意见。但是,在对华政策问题上,美国政府的态度十分谨慎。对

① [美]迈克尔·沙勒著,郭济祖译:《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86页。

②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597、598页。

于国民党,罗斯福一面不满意蒋介石的法西斯倾向及抗战不力,一面仍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支持他,希望他用实行宪政的方法争取多数人拥护来和我们对抗。对于我党,美国今天为着打日本,必须联共,并强迫国民党联共,但同时又怀着很深的戒惧。美国决不会放弃对中国的控制和影响,不会赞成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不会赞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在全国得到胜利。因此,我们要实际成为中国政治的中心必须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与旧民主主义斗争的过程,只有在现实已经造成我党的中心地位,而美国不能否认时,它才可能被迫承认。”^①

既然美国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政治动机就是为了控制中国共产党,那么这种合作就不可能是牢固的和持久的。

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现阶段所需要的是民主,而不是社会主义。中国人民理解民主和要求民主,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实行的是主张民主和社会改革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美国是具有资本主义民主传统的国家,又是对国民党政府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国家。因此,中国共产党与美国能够而且必须合作。针对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偏见和对国民党的幻想,毛泽东在同谢伟思、斯坦的谈话中,着重从国共美苏“三国四方”的关系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合作的政治意义。从美苏关系看,美苏之间的冲突不是无法避免的,相反,它们之间不仅在战时,而且在和平时期也会密切合作。从中苏关系看,国民党由于其固有的反苏偏见,中苏合作是不可能的。因此,如果美国与国民党合作,必然会引起麻烦,既不利于美国自身利益,也不利于美苏合作和世界和平。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对美苏态度都是友好的,而且只要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改革,中国共

^①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7—338页。

产党就会支持它。因此，“美国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合作，将会使一切有关方面都有利和满意”^①。针对美国担心中国共产党受苏联的控制，毛泽东严正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完全独立自主的党，不受任何外国势力的支配，包括苏联和美国在内^②。

与美国企图控制国共两党以实现控制中国的目标截然相反的是，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合作是为了在战后为中国争取一个光明的前途。正如南方局致中共中央的电报所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争取民族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建立独立、民主、统一、和平、繁荣的新中国，无论今天和将来，我党都不是走南北分治的对立，而是坚持自己的阵地与坚持新民主主义的方向，促进全国进步，为承担起这一责任，我们必须使自己力量更加强大，成为决定中国问题的主要因素，只有如此，才能主动地利用外援，而不是被动地受人支配。”^③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合作的策略是灵活的，原则是坚定的。

从思想基础看，双方都承认意识形态的分歧不应成为双方合作的障碍，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可以也能够进行合作。中国共产党自苏德战争爆发后就不再以意识形态的异同作为划分和联合世界政治力量的标准。美国与苏联的结盟也表明美国把国家利益置于意识形态之上。因此，在反对法西斯的共同目标下，淡化意识形态的分歧是双方合作的思想基础。但是，在如何对待共产主义信仰问题上，双方是根本对立的。

反共、仇共、惧共在美国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自太平洋战争爆

① [美]阿瑟·斯坦著，马飞海等译：《红色中国的挑战》，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420页。[美]约瑟夫·埃谢里克著，罗清等译：《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59—260页。

② 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195页。

③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8页。

发以来,美国对华政策受现实主义所制约,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放弃反共主义。美国统治集团始终对中国共产党怀有偏见和疑惧,认为中国共产党是苏俄的附庸和在中国的代理人,只有支持蒋介石才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因此,美国寻求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带有很强的试探性。一方面,美国自认为中国共产党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而是民主主义者或社会改革家;另一方面,美国希望中国共产党放弃共产主义信仰,改变共产党的名称。当时在延安的英美记者和美军观察成员根据中国共产党实行的土地改革、自由贸易等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政策而得出结论,认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实际上是民主主义者。他们甚至天真地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提出,为了清除疑虑、便于合作,建议将共产党的名称改为“新民主主义党”或“民主主义党”。在重庆的一些英美人士也向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提出了希望共产党改变名称的问题。美国人的这种认识说明他们根本不理解毛泽东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不了解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区别,从而曲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同时,这也反映了他们惧怕共产主义的心态和要中国共产党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的愿望。美国正是抱着担心与希望相互交织的矛盾心理来寻求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

美国在中国共产党信仰问题上的认识误区和不切实际的幻想,其根源在于美国固有的以反共为主导的意识形态。他们不仅害怕中国共产党当前实行共产主义,而且担心将来实行共产主义,因而执意要中国共产党放弃信仰,改变性质。这就是美国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思想基础。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其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中国共产党同时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认识问题的态度和方法;共产主义是理

想,信仰共产主义并不意味着立即消灭私人资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农庄集体化。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就连最保守的美国人也不会在中国共产党纲领中找到可以反对的东西。因此,实行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完全可以与信奉民主主义的美国进行合作。针对美国希望中国共产党放弃共产主义信仰,改变共产党名称的问题,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同英美记者和美军观察组成员的谈话中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既不会放弃共产主义,也不会改变共产党的名称。因为,重要的是实质和内容,而不是标签,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相信共产主义一定能够实现。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要了解中国共产党所信仰的主义和实行的政策,必须弄清“三个区别”:一是要把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同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区别开来。坚持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并不是要在中国立即实行共产主义制度。二是要把中国革命的当前目标和最终目标区别开来,实现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新民主主义才是当前建设中国的当务之急。三是要把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政策与苏联的理论、政策区别开来,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政治、经济政策决不是苏联意义上的共产主义,而是以减租减息,鼓励竞争,保护私人资本和外国投资,实行“三三制”的民主政治为主要内容的^①。毛泽东还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渊源上批判地吸收了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东西,特别是西方的民主主义思想,也不拒绝民主政治^②,所以中国共产党能够与美国很好地合作。从毛

① 参见〔美〕阿瑟·斯特朗著,马飞鹰等译:《红色中国的挑战》,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页。〔美〕哈里森·福尔曼著,梅岱译:《北行漫记》,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198—200页。《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2—183页。

② 〔美〕约瑟夫·埃德温克著,罗清等译:《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09页。

泽东的论述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合作的思想基础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是切合实际的。

以上我们从军事、政治、思想三个方面分别考察了美国和中国共产党双方合作的基础。由此可见:(1)双方对合作基础的认识既有共同点,但更多的是相异点,因而这种合作的基础是脆弱的,一旦遇到国内外局势的变化就会随之发生动摇。(2)双方在合作基础上的认识分歧,集中表现在双方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对长远合作目标的不同选择,因而这种合作基础本身就是一个担心与希望的混合体。中国共产党担心美国会无条件支持国民党,希望美国帮助中国实行民主改革;美国担心中国共产党会夺取全国政权和倒向苏联,希望中国共产党接受国民党和美国的控制。(3)双方对合作基础的认识不一致,不仅决定了双方对待合作的态度不一样,中国共产党是积极的、真诚的,而美国则是试探性的,而且决定了双方在合作过程中必然存在矛盾和斗争。历史的发展过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四、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合作与冲突

(一)中共与美国的军事合作

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军事合作正式开始。美军观察组的主要使命是收集日军情报和考察中国共产党的作战能力。中国共产党对美军观察组的工作给予了积极配合和大力协助。

8月7日,美军观察组与中国共产党军事人员详细讨论了合作计划:中国共产党对收集战略情报的美军人员提供帮助,美国则帮助中国共产党训练军队。为了帮助观察组成员了解敌后抗日根据地情况,中共中央安排八路军、新四军的主要将领彭德怀、叶剑英、林彪、聂荣臻、陈毅等分别向他们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各个部队以及敌后根

据地的作战和经济建设各方面的情况。美军观察组也根据训练大纲向上千名八路军官兵讲解了通讯、爆破、谍报等技术和军事知识。双方对初步合作都感到相当满意。

为了更有效地实现与美国的军事合作，中共中央提出了“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①的方针，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尽量满足美方提出的军事合作方面的要求，积极协助美方收集情报。中共中央先后批准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在新四军五师所辖范围内设立无线电通讯网、允许美军观察组在晋绥、太行等地设立电台、同意美国第十四航空队与东江纵队合作建立电台，并向他们提供日军情报和气象资料；中央军委决定在敌后各战略区增设联络处，专门担负向盟军提供战略情报的工作，并下令在晋东南、山东、苏中建造三个简易机场，以加强延安与各根据地的联络，改善情报工作；中国共产党部队掩护和协助美军观察组成员分批前往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等根据地进行实地考察和收集情报；各敌后根据地积极开展营救美军飞行员的工作。据八路军总部的不完全统计，到战争结束时，中国共产党提供给美军经过整理的情报、书面报告 120 多份；营救盟军人员主要是美军人员共 102 人，为此付出了牺牲军民 110 余人的代价^②。中国共产党的坦诚合作，为美军收集情报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仅在头两个月，美军观察组就成功地发送了 112 份报告，其中大部分是重要的军事情报，包括日军在华北的机场和防空力量，八路军的力量分布、作战部署、训练状况以及华北和西北地区的经济、气候状况等。中国共产党的积极配合也赢得了美军观察组的高度评价。包瑞德在报告中说，“中国共产党当局给予观察组最热心的合

① 毛泽东、刘少奇致张云逸、饶漱石、曾山等的电报，1944 年 9 月 10 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44 页。

② 《铜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61 页。

作”，他们“毫不犹豫地向我们提供任何方便，在他们控制的任何地区与我们合作，对美国人的旅行未加任何限制”^①。观察组成员谢伟思也说：“从来没有一个共产党社会像中国共产党在1944年8月到1945年3月这8个月期间那样对美国如此开放。大批美国人在他们的每一块领土上都进行了旅行，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合作，探索各方面的情况，在延安和前线每天同共产党领导人和一般工作人员亲密友好地接触并生活在一起。”^②

其次，为配合美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中共中央进行了周密布置。当中共中央获悉美军可能在东南沿海登陆作战后，明确表示积极支持和配合。8月下旬，中共中央电示新四军总部，强调向南发展的战略方针，要求认真布置吴淞、宁波、杭州、南京间，特别是吴淞至宁波沿海及沪杭甬铁路沿线地区的工作，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及准备大城市的武装起义。11月初，中共中央再次致电新四军，美军可能在杭州湾登陆，要他们采取步骤以配合美军登陆及准备夺取杭州、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同时，中共中央对美军从黄海沿岸登陆也做了准备，要求山东八路军迅速提供有关青岛、烟台、连云港等地日本海軍的各种情报。在中国共产党的协助下，美军驻华司令部拟定了华北登陆作战计划，并派人专程送往五角大楼审批。尽管由于形势的变化，美国最后取消了在中国沿海的登陆计划，但中国共产党重视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却是有目共睹的。

再次，根据平等互利的合作原则，要求美国按抗日战绩和抗战能力公平分配盟国援华物资。在中国共产党单方面向美军提供帮助的同时，中共中央慎重地向美方提出了给予军事援助的要求。9月9

① 转引自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309页。

② [美]谢伟思著，王益等译：《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17页。

日,中共中央致电董必武,请他向史迪威、赫尔利和纳尔逊提出:“根据我军历年抗战的战绩,今日抗击敌伪的战略地位(敌后沿海及大城市附近交通要道两侧),我军的实力(五十万正规军,二百万以上民兵),和我军配合盟军作战的各种可能,以及国民党军队的连战皆败和衰弱无能……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应占全中国军队所接收之全部援助数量的二分之一的比例,至少应得三分之一的比例。”^①随后几天,中共中央又两次致电董必武、林伯渠和王若飞,说明中国共产党在原则上主张按照抗战成绩公平分配盟国援华物资,美国援华军火至少应分二分之一给八路军、新四军,即国共平分^②。毛泽东、周恩来在同谢伟思的谈话中也表示,希望美国把武器给予包括中国共产党军队在内的所有中国抗日部队,只把武器给予国民党实际上是干涉中国内政,确保中国抗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和避免内战的唯一办法,是同时援助国共双方^③。从当时情况看,争取美援并非不可能,因为美国确实需要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合作,美军观察组成员也主张援助中国共产党军队,史迪威还曾打算向中国共产党军队提供军事援助。同时,中国共产党向美国提出军事援助还具有其他方面的意义:一是可以打破国民党在接受外援方面的垄断地位,二是可以测试美国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合作的诚意。

1944年年底至1945年年初,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军事合作达到一个高潮。在此期间,美国在华军事和外交官员先后制定了一系列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军事合作的计划。如由美国将武器弹药空投于

① 中央致董必武电,1944年9月9日。

② 毛泽东致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电,1944年9月12日、9月15日。《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44—545页。

③ 〔美〕约瑟夫·埃谢里克著,罗清等译:《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55页。

连云港附近的中国共产党部队的“连云港计划”，由美国供给十万支步枪及通讯器材、运输工具并训练共产党游击队2.5万人的“伯德计划”，在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山东沿海地区建立美国伞兵登陆场的“麦克卢尔计划”。中国共产党对于美军合作计划给予了积极响应和配合。1944年12月15日至17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同美国战略情报官员伯德上校就美军在山东半岛登陆时的军事合作问题进行了磋商。12月26日，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又同美国驻中国战区司令长官麦克卢尔少将的代表包瑞德举行会谈，就美方所提在欧战结束后美军空降师在山东沿海登陆时要求由中国共产党暂时提供后勤供应问题进行了协商。毛泽东向包瑞德担保，中国共产党完全可以向美军空降师提供后勤保障，直至美军能够自己承担这一任务时为止。在此之前，毛泽东在同包瑞德的谈话中明确表述了中国共产党同美国进行军事合作的态度。毛泽东指出：“我们希望在対日战争中同美国合作，在当前的危机形势下，我们也希望有所帮助”，“我们相信，有美国的帮助，我们能够挽救目前的局势作出一定的贡献。我们愿意在对日作战中流尽我们的最后一滴血”。“如果美国不给我们一支枪、一发子弹，我们仍将继续和日本人战斗。而且我们还是美国的朋友。”^①

然而，就在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军事合作紧锣密鼓地加紧进行的关键时刻，以调处国共关系为使命赴华的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不但断然中止了美国与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合作计划，并且将主张合作的“中国通”们加以调离、撤职甚至迫害，将美国的对华政策逐步纳入扶蒋反共的轨道。这样，一度敞开的军事合作大门被无情地关上

① [美]包瑞德著，万高潮等译：《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94—96页。

了,双方良好的合作气氛被赫尔利所断送。

(二) 中共与美国的政治合作与冲突

在开展与美国进行军事合作的同时,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与美国的政治合作,其主要内容就是民主合作,也就是利用美国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不满,以美制蒋,促进中国的民主改革,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一贯主张。事实上,早在1937年5月,毛泽东就提出了建立联合政府的基本构想。他指出:“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确立的联美抗日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利用美国的影响,改良中国政治。鉴于美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主张国共合作,建立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积极谋求与美国建立某种政治联系,寄希望美国在中国内政问题上能有所作为。1944年6月华莱士访华期间,毛泽东曾多次指示中国共产党代表林伯渠将国共谈判中中国共产党方面的提案密告美国使馆和史迪威司令部,经美国友人密交华莱士,并寻求和华莱士单独会谈和邀请华莱士访问延安^②。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后,探讨组织联合政府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与观察组成员谈话的热门话题。随着“放手与美军合作”方针的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正式提出了召开国事会议,组织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并把它作为今后中国人民的政治斗争目标和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合作的主要内容之一。

1944年9月6日,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赫尔利来华。赫尔利使华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6—257页。

② 《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第234—235页。

的起因是美国驻中缅印战区司令史迪威与蒋介石之间在租借物资分配权和中国军队指挥权问题上的矛盾。1944年4月至8月,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再次出现大溃败的局面,国内外为之震惊。史迪威认为国民党军队抗战不力,管理不善,要扭转中国战局恶化的局面,有必要由他来全权指挥中国的所有军队,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联合抗击日本。美军参谋长马歇尔同意了史迪威的建议。随后美国总统罗斯福于7月6日给蒋介石发来一份措词十分强硬的电报,要求蒋介石任命史迪威指挥一切在华盟国军事力量(包括中共军队)的全部责任和权力。但是史迪威的主张和罗斯福的建议未能被蒋介石所接受,反而导致了史蒋矛盾的进一步激化。最后罗斯福从美国对华政策的长远利益考虑,不得不作出让步,接受了蒋介石要他派一名“有政治头脑与经验”、“私人完全信任之有力的全权的代表”来华调整他与史迪威之间关系的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罗斯福选中了赫尔利作为他的私人代表赴中国处理各种具体问题。本来罗斯福给赫尔利的使命是:“促使蒋介石同史迪威之间确立有效的与和谐的关系,以便史迪威行使对于归他调遣的中国军队的指挥权”^①;“帮助蒋介石解决中国政治问题,例如中央政府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问题”^②。但他到中国后把自己的使命理解为:“1. 防止国民党政府崩溃;2. 支持蒋介石作为共和国总统和军队统帅;3. 协调委员长与美国指挥官的关系;4. 为击败日本而统一中国所有军事力量。”^③并得到罗斯福的默认。这里只有对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的支持,而没有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内容。当蒋介石深信美国对华政策

① [美]伊·卡恩著,陈亮等译:《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59页。

② 转引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329页。

③ 《美国外交文件》,1944年第6卷,第745页。

的实质是扶蒋而不是联共时，便强烈要求美国政府召回主张与中共合作的史迪威。当蒋介石承诺为了同中国共产党达成一项政治解决办法可以作某些让步时，赫尔利就迫不及待地建议罗斯福解除史迪威的职务。他告诉罗斯福：“在这场辩论中，如果您保留史迪威，你就会失去蒋介石，中国就可能和他一道失去。”^①赫尔利调解史蒋矛盾的结果是调离了前者，支持了后者。由于史蒋矛盾的根源在于国共矛盾，所以赫尔利很快又直接介入国共政治斗争之中。

在赫尔利来华之初，中国共产党对他抱有一定的希望，把赫尔利使华看做同美军观察组来延安一样，都是美国对中国友好，包括对中国共产党友好的表现。因此，在赫尔利抵达重庆的第三天，中共中央就电示董必武代表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表示欢迎赫尔利来延安^②。9月11日，朱德又以中共中央、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名义，邀请赫尔利赴延安，对中国共产党地区作私人调查，并顺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③。中国共产党驻重庆代表林伯渠、董必武多次提出同赫尔利进行会谈。10月中下旬，林伯渠、董必武与赫尔利连续举行了三次会谈。在会谈中，赫尔利一方面强调要维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也承认中国共产党“力量强大，为决定中国命运的一种因素”，认为“中国共产党应取得合法的地位；有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军事领导机关中，应有中国共产党党员参加；分配东西，决不应偏于哪一党”^④。根据赫尔利与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谈话内容，毛泽东乐观地估计，在中国共产党允许蒋介石存在下去的条件下，经过一定的努力和

① [美]邹英：《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0页。

② 《周恩来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82页。

③ 《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下卷，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416页。

④ 林伯渠、董必武致毛泽东电，1944年10月17日、18日、24日。

采取适当的策略,美国有可能作出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交易来^①。因此,中国共产党欢迎赫尔利转旋国共谈判,欢迎他访问延安。

11月7日,赫尔利带着与蒋介石反复磋商形成的作为“协议的基础”的五点草案到达延安。该草案的内容是:

“1. 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为迅速击败日本和重建中国,将为统一全中国的武装力量而共同工作。

2. 中国共产党军队将遵守与执行中央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的命令。

3. 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事的政府,双方采取各种政策,以促进政府民主程序的进步和发展。

4. 中国只有一个国民政府和一支军队,中共军队经中央政府改组后一切官兵在薪金和津贴方面均与政府军同级官兵同等待遇,各部队在军需供给方面亦享受同等待遇。

5. 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并将使其成为一合法政党。中国所有各政党将获得合法地位。”^②

此草案的核心内容是实行“军令”、“政令”统一,中共交出军队,国民党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对此,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同赫尔利进行了认真而又坦诚的谈判,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第一次与美国官方高级代表进行接触和政治对话。在谈判过程中,毛泽东针对赫尔利带来的提案,严厉谴责了国民党的错误政策,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军队和政权问题的一贯立场和主张。赫尔利虽然也为国民党进行了辩护,但在事实和情理面前,不得不作出

① 毛泽东在董必武、林伯渠 1944 年 10 月 17 日电报上的批语。

② 《美国外交文件》,1944 年第 6 卷,第 666 页。

让步。经过两天的会谈，双方于11月10日达成一项以组织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为中心内容的五点协议。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赫尔利作为见证人代表美国总统罗斯福分别在协议上签了字。赫尔利实际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五点协议的内容是：

“1. 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

2. 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括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

3. 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事民治之政府的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狱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实行用以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

4. 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此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的物资应被公平分配。

5. 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①

五点协议基本上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原则和立场，有利于中国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93—394页。

人民争取民主的斗争。五点协议也是中国共产党与美国进行政治合作的初步结果。因为从形式看,五点协议是关于国共关系的协定草案,但它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和美国对国共关系的态度和主张,因而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协定草案。双方对会谈的结果都感到满意。毛泽东在致罗斯福的信中指出:“这一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八年来抗日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他感谢罗斯福“为着团结中国以便击败日本并使统一的民主的中国成为可能”所作的努力,表示“我深愿经过你的努力与成功,得使中美两大民族在击败日寇,在重建世界永久和平,以及建立民主中国的事业中永远携手前进”^①。赫尔利也致函毛泽东,称赞和感谢他的“光辉的合作与领导”^②。

尽管赫尔利认为五点协议是“公平合理的”^③,天真地相信蒋介石会赞成五点协议,但中国共产党还是做好了两手准备。一方面,为了表示诚意专门派周恩来随赫尔利一同赴重庆同国民党进一步谈判;另一方面也估计到赫尔利把中国共产党参加政府和成立联合政府相混淆,蒋介石必定会对协议提出修改。果然不出中国共产党所料,当赫尔利志得意满地回到重庆将五点协议交给宋子文和蒋介石后,当即即为蒋介石所拒绝。宋子文指责赫尔利被“共产党的旧货单子欺骗了”,“国民政府永远不会答应共产党的要求”。蒋介石则表示,在他没有承认自己的党被共产党击败时,不会同意组成联合政府。不过,在赫尔利看来,要让共产党交出军队,必须以让共产党参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97—398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94页。

③ [美]包瑞德著,万高潮等译:《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64页。

加政府为条件,只要共产党交出了军队,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值得。他说:“抗日战争之后,中国万不可再打内战,最好和最要紧的方法,是设法让共产党把军队交出来。”“共产党交出军队,必须让共产党参加政府,作为交换条件”,“最重要的是引诱共产党交出军队,无论付出什么代价,如能做到这一点,就算成功了”^①。问题在于,赫尔利并不了解国共两党和国共两党斗争的实质,不了解“中共参加政府”和“成立联合政府”的根本区别。他是以美国的眼光、美国的方式来看待和处理国共两党关系的,也就是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办法来解决国共矛盾。他错误地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实际上不是共产党人,他们在为争取民主原则而斗争……国民党一党专政、一人专政的政府实际上不是法西斯,它也在为争取民主原则而斗争”^②。特别是他赴华时途经莫斯科,得到苏共领导人支持国民党政府的承诺后,更加相信共产党会对国民党妥协,国民党也会对共产党让步。因此,赫尔利最初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态度颇不理解。但是,蒋介石最了解自己的实力和地位,最清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将彻底改变其政府的独裁性质,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将最终控制政权。国民党随后便提出了以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服从国民党政府为主要内容的三点反建议。三点反建议的内容是:

“1. 国民政府为达成中国境内军事力量之集中与统一以期迅速击溃日本,及战后建国之目的,允将中国共产党军队加以整编,列为正规国军,其军费餉项军械及其他补给与其他部队受同等待遇。国民政府并承认中国共产党为合法政党。

2. 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政府之抗战及战后之建国,应尽全力拥

① 冯鸣:《蒋家王朝》,(台北)中原出版社1986年版,第233页。

② 《美国外交文件》,1945年第7卷,第211页。

护之,并将其一切军队移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管辖。国民政府并指派中共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事委员会。

3. 国民政府之目标本为中国共产党所赞同,即为实现孙总理之三民主义,建立民有民事民治之国家,并促进民主化政治之进步及其发展之政策。除为有效对日作战之安全所必要者外,将依照《抗战建国纲领》之规定,对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及其他人民自由,加以保障。”^①

从反建议的内容可以看出,它完全否定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的主张,继续玩弄“军令”、“政令”统一,以“封官”诱骗中共交出军队的旧把戏。11月21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来电上批示:“党治不动,请几个客,限制我军。”可以说,毛泽东一语揭破了国民党反建议的实质。对于这样的建议,中国共产党自然不会接受。周恩来在给赫尔利的信中严正指出:“在这些新建议里面,不可能找到基本的共同基础。”^②虽然赫尔利一开始表示反对,甚至认为蒋介石的条件“过于苛刻”,但不久就改变了态度,反过来企图劝说和压迫中国共产党接受国民党的反建议。包瑞德后来回忆,从赫尔利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那一天之后,“他同共产党人谈判时就日益倾向于袒护国民政府了”^③。赫尔利的天平之所以这么快地向蒋介石一方倾斜,是因为他当时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迫使蒋介石作出让步;要么向蒋介石作出让步,同意蒋介石的方案。但是赫尔利相信,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就是扶蒋,他的使命就是防止国民党政府的崩溃,支持蒋介石并帮助他统一中国军

① 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706页。

②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143页。

③ [美]包瑞德著,万高潮等译:《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88页。

队。因此,他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后者。赫尔利本人后来也承认:“我深信我们的政府,在决定支持中国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领袖地位方面是对的。我没有同意或支持过我认为我将削弱国民政府或蒋介石的领袖地位的任何原则或任何办法。”^①由于赫尔利倒向蒋介石一边,国共谈判陷入僵局,中国共产党不得不暂时中断了与国民党的谈判。

赫尔利的出尔反尔和背信弃义,引起中国共产党的严重不满和高度警惕。12月8日,毛泽东、周恩来在会见包瑞德时气愤地说,蒋介石提出的三点反建议,等于要我们完全投降,交换的条件是他给我们一个全国军事委员会的席位,而这个席位是没有任何实际作用的。赫尔利说我们接受了这个席位,就是“一只脚踏进了大门”,我们说如果双手被反绑着,即使一只脚踏进了大门也没有任何意义。毛泽东态度坚定地表示,我们欢迎美国的军事援助,但不能指望我们付出接受这种援助要由蒋介石批准这样的代价。在五点建议中,我们已经作了我们将要作的全部让步,我们不再作任何进一步的让步^②。中国共产党不但拒绝了国民党的无理要求,而且对赫尔利“调处”的公正立场也开始失去信任,并打算公布赫尔利签字同意的五点协议,让国内外了解国共谈判和赫尔利调解的真相。

但是,为了共同抗日的大局和保持与美国合作的积极成果,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态度还是相当克制的,对赫尔利的批评也未公开化。中共中央采取了既不同美蒋妥协,又不与美国搞僵的策略。12月12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王若飞,要他向美国人士说明“我们毫无与美方决裂之意”,并声明:“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

①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149页。

② [美]包瑞德著,万高潮等译:《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96页。

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这种原则立场我党历来如此,希望美国朋友不要硬拉我们如此做,我们所拒绝者仅仅这一点,其他一切都是好商量的。”^①关于公布五点协议一事,鉴于赫尔利的反对,为了给他保全面子,留有余地,也暂时作罢。12月16日,周恩来致函赫尔利,表示中国共产党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目前谈判中的一个基本的困难,是国民党不愿意放弃一党统治而接受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②。为了进一步表明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合作的诚意,1945年1月9日,毛泽东和周恩来交给美军观察组代组长克罗斯利少校一封信,请他通过军事渠道转交华盛顿,表示希望派一个“非官方小组向美国平民和官员陈述和解释”中国的错综复杂的问题,如果罗斯福把他们看做“中国一个主要政党的领袖”而愿意接待他们的话,他们就决定访问华盛顿^③。但在赫尔利的干扰下,罗斯福并未认真地加以考虑,失去了一次美国与中国共产党加深了解的绝好机会。

1945年1月7日、20日,赫尔利先后两次致电毛泽东,建议国共两党恢复谈判。在赫尔利的再三请求下,中国共产党答应派周恩来来到重庆与国民党重开谈判。1月24日,周恩来抵达重庆与国民党开始谈判。在这次谈判中,国共两党争论的焦点仍然是先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还是共产党先交出军队。双方坚持各自的立场,互不相让。此时的赫尔利继续充当国民党的说客,同国民党一道企图诱逼中国共产党就范。赫尔利曾私下向蒋介石进言:“委员长此时最重要的

①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592页。

② 《美国外交文件》,1944年第6卷,第740页。

③ [美]迈克尔·沙勒著,郭济祖译:《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04页。

目标,是把共产党的军队统一于国民党军队。这将是实现中国的主要计划的第一步……”并要国民党“作出政治让步和缩短训政时间”^①。对此,中国共产党当然不会上当。当国民党和赫尔利提出由国、共、美各派一人组成一个军队整编委员会,由美国派将官任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总司令时,当即为周恩来所拒绝。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提出:“这是将中国军队尤其将我党军队隶属于外国,变为殖民地军队的恶毒政策,我们绝对不能同意。”^②谈判至2月中旬,蒋介石却宣称:“不接受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党派会议等于分赃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无异于推翻政府。”^③对于蒋介石反对成立联合政府的顽固立场,赫尔利从内心也表示赞同,他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报中写道:“我不同意,或不支持任何在我看来会削弱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地位的原则和方法。”^④2月15日,周恩来在重庆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国共谈判毫无结果。至此,赫尔利参与斡旋的国共关于联合政府的谈判彻底破裂。

即使在国共谈判破裂之际,中国共产党仍致力于与美国的政治合作。2月12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认为只要我方努力,就有可能攻掉美国的扶蒋政策,从而迫使蒋介石让步。因此,他要求周恩来“不怕他们生气,不怕他们大骂”^⑤。3月13日和4月1日,毛泽东两次与谢伟思谈话,再次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原则立场和中国共产党的对美合作政策,认为“中国人民和美国之间不应该也不可能存在

① 驻华大使赫尔利致国务卿电,1945年2月18日。载《党史通讯》,1984年第8期。

②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74页。

③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602页。

④ 赫尔利致国务卿的电报,1945年2月18日。《党史通讯》,1984年第8期。

⑤ 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45年2月12日。

任何冲突、疏远和误解”。他相信美国是愿意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毛泽东请谢伟思转告美国政府：一旦中国发生内战，希望美国对国共双方采取不插手政策^①。应当说，中国共产党的友好态度和要求合作的强烈呼吁，为美国选择战后对华政策提供了最好的机会和充分的余地。遗憾的是，美国只是把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当做权宜之计，意在全力扶持蒋介石。随着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形成，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政治合作只能是无果而终，中国共产党也不得不开始重新考虑和调整自己的对美政策。这样，美国就失去了与中国共产党保持友好合作关系的时机，而将自己与国民党战车紧紧捆绑在一起了。

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局出发，将联美抗日政策付诸实践，不仅致力于与美国的军事合作，而且积极推进与美国的政治合作，以改变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局面。这是中国共产党试图利用外交来解决中国内政问题的一次有益尝试，扩大了国际影响，积累了外交经验。但是，美国对华政策逐步由扶蒋容共、扶蒋压共走上扶蒋反共的轨道，这致使中国共产党与美国之间不再存在任何继续合作的基础了。

① [美]约瑟夫·埃谢里克著，罗清等译：《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327、339页。

第三章

联苏防美：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调整

一、中国共产党联苏防美政策的形成

(一) 对美政策由合作到防范

1945年春,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都处于最后胜利的前夜。4月至6月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相继召开了本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和第六次代表大会,制定了各自在即将到来的新的历史阶段的政治方针。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壮大人民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奋斗纲领和有关政策。国民党确立了坚持一党专政,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准备反共内战的基本路线。国共双方围绕战后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斗争趋于明朗化和尖锐化。与此同时,美国对华政策逐步由扶蒋容共抗日转向扶蒋反共抗日。在这一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密切关注着国内外政治局势的演变,谨慎地审视着自己的内外政策,特别是对外政策。当中国共产党采取主动友好的姿态积极谋求与美国建立军事、政治合作关系一再遭到挫折之后,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警惕取代了希望。受国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正是在中国共产党七大期间,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发生了策略性转变,即由争取友好合作为主、批评斗争为辅转为斗争防范为主、友好合作为辅。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临近结束之际调整对美政策,主要是基于对以下因素的考虑:

一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反动性日益暴露。随着赫尔利使华和出任驻华大使,美国对华政策中的现实主义对华路线为传统路线所取代,美国政府在扶蒋反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945年2月,国共谈判破裂后,赫尔利把国共谈判破裂和他调处国共关系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到中国共产党身上,对中共更加不满和敌视。2月18日,赫尔利在致美国国务卿的电报中说:“全部争论和给您的报告向您表明,中共是不民主的。共产党的目的是在制定宪法或在民主的基础上还政于民以前,摧毁国民党统治的政府。”“共产党的全部策略表明,他们的目的是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使中共获得对中国的一党专政。”^①赫尔利回国述职期间,当他看到《雅尔塔协定》,得知苏联将支持国民党政府时,便错误地认为中国共产党一旦失去苏联的支持,就会向国民党妥协,参加国民党政府。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向美国新闻界发表公开讲话,攻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是中国实现统一和民主的障碍,故意将中国共产党与军阀相提并论,声称“只要仍有强有力的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武装政党和军阀,中国就不可能有政治上的统一”,宣称“美国政府全力支持蒋介石政府”而“不支持任何武装政党和军阀”。这是抗战以来美国第一次带有官方性质的扶蒋反共声明,也是美国对华政策发生转变的标志。4月12日,罗斯福总统病逝,他的继任者杜鲁门在对华政策的选择上更趋向过去的传统,并听任赫尔利之流为所欲为。4月28日,赫尔利在回到重庆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再次对中国共产党加以诬蔑,阻止中共提出的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大会的正当要求,竭力否认中共的合法地位。赫尔利为

^① 驻华大使赫尔利致国务卿电,1945年2月18日。

了推行其扶蒋反共政策,还开始排挤、清洗、打击主张现实主义对华路线的“中国通”。在赫尔利的坚持下,包瑞德被免职,谢伟思等 11 人先后被调离中国。6 月 6 日,在华盛顿又发生了轰动一时的“美亚事件案”,主张与中国共产党保持友好关系的谢伟思及其他 5 人被美国联邦调查局以通共间谍罪逮捕。这些事件的发生,对美国来说,是对华政策两条路线之争的表面化,但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却是美国对华政策发生逆转的信号。

二是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日趋强硬。美国是国民党蒋介石统治中国的支柱,这决定了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与美国对华政策密不可分。赫尔利奉行“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及其一党专政的政府”的政策,“使蒋介石在处理国内统一问题上变得越来越不妥协”^①,国民党在国共谈判中的态度日益强硬,国共谈判陷入僵局。5 月 5 日至 21 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六大。蒋介石依仗美国的全力支持,公然宣称:“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国共产党,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②国民党六大决议案诬蔑中国共产党“提出联合政府口号,企图颠覆政府,危害国家”,要求“整军肃政,加强力量”^③。会后,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部长陈诚又声称,将以美国援助的武器来对付中国共产党部队。随后,国民党积极调集军队,准备进攻解放区,国民党挑起内战的危险已初现端倪。国民党的有恃无恐,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认识到,美国决定“全力扶蒋”后,国民党虽表面

① 《美国外交文件》,1945 年第 7 卷,第 348 页。

② 荣孟源:《蒋家王朝》,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24 页。

③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922 页。

“故作缓和”，但“准备内战益急”^①，美国对华政策越来越明显地造成了中国内战的危机。

三是斯科比事件有在中国重演的危险性。斯科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英国派驻希腊的盟军司令。1944年10月，德国侵略军在希腊败退后，斯科比率领英军，带着曾在伦敦的希腊流亡政府进入希腊。12月1日，斯科比下令解散希腊共产党领导的长期英勇抵抗德军的人民解放军。当这一命令遭到抵制后，斯科比便伙同希腊流亡政府悍然向人民解放军发动进攻。深受当时国际妥协思潮影响的希腊共产党寄希望于政治解决，没有组织坚决而有效的抵抗，因而在英军和政府军的进攻下，被迫交出了武装，解散了人民解放军。随后，英军和政府军对希共党员和人民解放军官兵进行了大屠杀，希腊很快恢复了资产阶级专政。斯科比事件的发生不是孤立和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它表明，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展，在“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阵营中存在着反民主的和压迫其他民族的势力，他们仍然要压迫各国人民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克服了法西斯残余势力、反民主势力和一切帝国主义势力，才能有最广泛的人民的胜利”^②。斯科比事件为中国共产党敲响了警钟。因为，国民党不仅企图借美国的压力迫使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和政权，而且希望美国能在中国执行斯科比在希腊的使命，帮助国民党消灭中国共产党军队。而美国在中国推行扶蒋反共政策，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很自然地将美国对华政策与斯科比事件联系在一起，担心斯科比事件有在中国重演的危险性，并考虑采取相应的对策来预防其发生。

①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60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1032页。

鉴于上述情况，中共中央在对美关系问题上增强了警惕性，担心美国政府会采纳赫尔利的错误政策，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或武装干涉中国内政，深感受有调整对美政策之必要。但中共中央同时认为，中美两国仍然面临着共同的敌人日本法西斯，估计“到达最后地完全地消灭日本侵略者，还有一段艰难的路程”，大约尚需要一年半时间^①，无论是美国还是国民党都暂时还不敢同中国共产党彻底决裂，美国对华政策也不可能“是固定而不可改变的”^②，通过斗争有可能使美国改弦更张。因此，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的调整又是根据国内外局势的变化逐步实现的。

在赫尔利4月2日讲话发表之初，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既尖锐批评又留有余地的方针。4月5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时评，指出：赫尔利“完全忽视了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并不是保护一党私利的武力，而是在沦陷区广大人民中生长出来的抗日武力，谁想消灭与削弱这个抗日力量，谁就在客观上帮助敌人”，赫尔利的讲话有“助长中国分裂与内战的危险，有拖延抗战胜利的危险”^③。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认为，赫尔利的讲话只是代表了赫尔利本人或一部分美国人的意见，期望美国政府能面对中国现实，切实纠正赫尔利的错误政策。因此，中国共产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公开批评美国政府，仍然强调盟国之间的团结以及美国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重要性。毛泽东

① 《毛泽东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265页。《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01页。

② 〔美〕约瑟夫·埃谢里克著，罗清等译：《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326页。

③ 《我们坚定而明确的态度——评赫尔利将军谈话》，《新华日报》1945年4月5日。

对《新华日报》时评的批语是“重庆此件很好。延安暂取不理态度”^①。在5月以前,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也没有转载或发表任何批评赫尔利的文字。毛泽东只是在4月24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七大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对美国政府可能采取错误的政策进行了婉转和警示性的批评。毛泽东指出:“我们要求各同盟国政府,首先是英美两国政府,对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呼声,加以严重的注意,不要使他们自己的外交政策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因而损害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我们认为任何外国政府,如果援助中国反动分子而反对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那就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②但毛泽东的政治报告仍然赞扬中美英苏等几大盟国的团结,强调中国与美国合作的重要意义。毛泽东认为,英美苏三国的团结“是主要的,统治一切的”,这一部分内容在报告中“写得很多,很充分”^③。他还在政治报告中先后五次提出中国人民要努力配合同盟国作战,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

总的来说,在这一期间,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态度是比较谨慎的,在对美政策上联合与防范相结合,联合其抗日的方面,防范其采取赫尔利的错误政策,但防范尚未成为对美政策的主导方面。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由于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认识还不深刻,对美国对华政策演变的趋势还需要进一步观察;另一方面是由于要从抗日的全局利益出发,为美国改变其错误政策留有一定的余地。

然而,事态的发展表明,赫尔利敢于明目张胆地顽固坚持扶蒋反共立场,显然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就在赫尔利使华、调处国共关

①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8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5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0页。

系之初，罗斯福就指示赫尔利：“除非他们（中共——引者注）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和接受蒋委员长领导，则租借物资不能用以武装中共。”^①当赫尔利接替高斯任美国驻华大使时，罗斯福又指示赫尔利的首要任务是“防止国民政府的崩溃”。当史迪威与蒋介石的关系不可调和时，罗斯福毫不犹豫地支持了蒋介石。当赫尔利对“中国通”进行清洗时，罗斯福并未表示反对，对赫尔利的反共言行，也未加任何批评和制止。继任总统杜鲁门更是明确地告诉赫尔利：“我们的政策就是支持蒋介石，但我们却不能卷入中国的内战中为蒋介石作战。”^②后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于12月7日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发言中也承认：“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一直就是同情和支持蒋介石政府”，赫尔利在“努力执行这一政策的时候，曾不断地从两位总统和三位国务卿那里获得支持”。“在我们的对华政策中，赫尔利大使最为重视的是支持蒋介石国民政府。在我们对远东政策的各个方面，这一点似乎最为清楚和明白。”^③很显然，出于对美国利益的考虑，美国统治集团从一开始就没有准备抛弃蒋介石而单独支持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一点，埃德加·斯诺后来写道：“他（罗斯福——引者注）显然无意抛弃蒋介石政权；他可能把与中共合作只看做一个军事上的权宜之计，我还得到这样的印象，罗斯福可能想把中共当做对蒋介石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以促使他走向革新他的政府，成为统一的和进步的中国中心。”^④美国学者迈克尔·沙勒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总统（罗斯福——引者注）希望中国免受苏联的政治影响，

① 郭荣超：《从珍珠港到雅尔塔——中美战时合作之悲剧》，台北中国研究中心出版社1979年版，第491页。

② 《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75页。

③ 《解放日报》，1945年12月10日。

④ 袁克安：《斯诺在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72—173页。

并在这个受控制的环境里迫使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占绝对优势的联合政府。罗斯福将从外面来抑制革命,而赫尔利将从里面来进行工作。”^①美国长期推行以支蒋为核心的对华政策,其最终结果只能是:要么中共向蒋妥协,美国采取容共政策;要么中共拒绝妥协,美国必然反共。当中国共产党拒绝向国民党作出妥协时,美国采取反共政策也就不足为奇,而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由此可见,赫尔利提出的反共政策并不是赫尔利本人一时的心血来潮和信口胡言,而是美国政府长期以来一贯坚持的支持蒋介石政府政策的延伸和发展的必然结果,美国政府的扶蒋政策与赫尔利的反共政策实质上是一致的。这一切,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有足够的理由相信,美国的对华政策正急剧地向扶蒋反共方向转化。

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美国对华政策认识的不断深刻,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批评也日趋尖锐化。5月3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大上发表总结讲话,开始把赫尔利4月2日的讲话同美国政府联系起来,并提醒全党警惕美国变中国为其殖民地。毛泽东指出:“有人提出中国可能变成美国的半殖民地,我看这个提法很对。在抗战以前近一百年中间,中国是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统治的半殖民地。九一八事变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以后,国民党削弱了,就不得不依赖美国,这样中国就可能变成以美国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主统治的半殖民地。……这一变化将是一个长期的麻烦,我们共产党要好好准备,以应付这个变化。”^②在讲到面临的困难时,毛泽东一连列举了17条,其中4条是国际方面的,有3条来自美国:一是“外国大骂”,即美国大骂我们,威胁我们;二是“出了斯科比,中国变成希腊”,即美

① [美]迈克尔·沙勒著,郭济祖译:《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08—209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87页。

国可能干涉中国内政；三是“不承认波兰”，即美国不承认我们，不给我们援助^①。他多次以斯科比事件为例，告诫全党要警惕外来干涉的危险，要用各种方法避免斯科比事件的出现。6月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上进一步提出：美国现在定下的方针是联蒋抗日、拒苏反共，全面称霸东方，决不会退让。为此，毛泽东提出，要估计最坏的一着。同一天，中共中央在给广东区委负责人林平的指示中又明确指出：“自赫尔利回美报告后，美国政府已决以全力扶蒋，不给我们援助，但因怕苏联参战助我，故尚不愿放弃对我关系，并企图借此侦察我之对外关系。”指示提醒林平要警惕“美蒋特务合作”，对我们进行破坏^②。

中国共产党对美国对华政策认识的转变，集中体现在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大闭幕会上所作的闭幕词《愚公移山》中。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将美国对华政策概括为“扶蒋反共”，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毛泽东尖锐地指出：“我们反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政策”，“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但是一切中外反动派的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并宣布禁止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到解放区去^③。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美国对华政策认识的转变对中国共产党调整对美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共产党七大闭幕不久，中共中央先后两次发出指示，说明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要求做好应变准备。6月16日，中共中央向广东区委发出指示，指出：“美国政府目前的政策是扶蒋抗日反共”，国民党是“依求外援，等待胜利，积极伪装民主，准备内战”，要求做好

①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87—392页。

② 《中央关于警惕美蒋特务合作对我们进行破坏给林平的指示》，1945年6月2日。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2—1103页。

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以迎接新的情况出现^①。次日,中共中央又向在重庆的王若飞发出指示,明确指出:“美国政府目前政策,确是扶蒋抗日反共”,“要使美国改变现行错误政策,必须中国人民及民主党派一致起来批评美国错误政策的必然结果,反对美国专门援蒋助长内战的危险,促使美国觉悟,而不是预言美国不会助蒋内战与必会联合中国共产党”^②。7月底8月初,中共中央已经确信,战后内战已不可避免,应及早做好准备,并指示中原解放区:“准备精神的与实力的条件对付将来内战危险,应是你们今后工作的出发点。”^③

由此可见,与中国共产党七大召开初期相比,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美国对华政策认识的不断深化,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的侧重点也发生了转移,即由争取友好合作为主,转为批评、斗争、防范为主。

但是,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1)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的转变是逐步实现的,而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因为,在中国共产党七大召开的整整50天时间里,国内外形势瞬息万变,美国对华政策反动性的暴露有一个过程,中国共产党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本质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因此,不能笼统地以中国共产党七大作为对美政策的转折点。确切地说,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的转变开始于赫尔利4月2日的讲话,完成于中国共产党七大结束前后。(2)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的转变是策略性调整,而不是根本性或战略性转变。因为,抗日战争尚未结束,中国人民与美蒋的矛盾尚未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45—147页。

②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卷,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807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01页。

矛盾，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战略构想并未改变，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批评和斗争并不是为了决裂，而是为了巩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因此，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的转变只能是策略性的。

七大以后，中国共产党针对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迅即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和对策，调整了对美政策。

首先，在舆论上公开抨击和谴责美国的对华政策。中共中央认为，“美国现行政策，是确定了的，不到山穷水尽，不会改变”^①。为了迫使美国政府改变对华政策，中共中央发动了强大的舆论攻势，公开指责美国对华政策。从6月下旬开始，《解放日报》先后发表了《从六人被捕案看美国对华政策的两条路线》、《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等措词严厉、态度强硬的评论文章。6月25日，《解放日报》在一个时评中对美国的对华政策进行了无情揭露和严厉驳斥，指出：“中国人民争取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伟大运动，是世界上任何力量所阻遏不住的。”“这些帝国主义者如不早日缩手，敢于向中国人民头上动一个指头，那他们就将中国人民获得其应有的教训。”紧接着，毛泽东在给《解放日报》亲自撰写的两个评论中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在于它“进一步破坏中国人民的团结，安放下中国大规模内战的地雷，从而也破坏美国人民及其他同盟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和战后和平共处的共同利益”。“假如赫尔利政策继续下去，美国政府便将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把它自己放在已经觉醒和正在继续觉醒的几万万中国人民的敌对方面，在目前，妨碍

^①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卷，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807页。

抗日战争,在将来,妨碍世界和平。”^①

其次,在实践中暂停了一直单方面向美国提供的情报等。7月7日,中央军委在关于对美政策的指示中指出:“从美大使赫尔利公开发表全力扶蒋不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以后,我党对美国态度是反对美国现在对华的错误政策(扶蒋、反共、防苏),反对美国政府中的帝国主义分子(如赫尔利等),支持其中进步的对中国共产党同情的分子(如被捕六人等),批评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而要求其加以改变,特别要抓紧美军对日作战如无我军配合则不能缩短战争减少牺牲这一点,逼迫美国政府重新考虑其政策。”为此,指示要求各解放区,在美国未与中国共产党确定军事合作以前,不允许美军派人到前方去,不允许美军去敌后根据地建立通讯机关,停止供给机密情报,对擅自在解放区降落的美军人员,要“先解除其武器,禁止其通讯,并监视其行动”。同时,中国共产党还拒绝了驻华美军提出的在灵邱、阜平、沂水等地建立机场,在各军分区建立通讯网,派人到山东降落,在敌后增加地上救护及气象工作人员,在晋绥增加气象台,在南泥湾建立对日侦察电台等各项要求^②。

中国共产党采取的这两项措施表明,斗争和防范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的主导方面。但是,中国共产党在揭露和批评美国对华政策时,仍然采取了十分克制和婉转的态度,恪守“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目的是促使美国改变政策,继续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关于这一点,7月7日,中国共产党明确表示:“最近半年的美国对华政策我们是坚决反对的,但是假如有一天它改变了这个政策,我们并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115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79—180页。

不反对到底。”^①7月30日，毛泽东在一封电报中又指出：“我们的批评是将美国政府与美国人民分开，又将美国政府中决定对华政策的人物与其他人员分开，又将美国政府一部分错误政策与其他正确政策分开。只要美国政府的现行扶蒋反共政策有一天能改变，我们就将停止批评这个政策，否则是不可能停止的。”^②然而，直到抗日战争胜利，美国政府毫无改变其错误政策的任何迹象。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的关系带着战争期间形成的种种困扰，踉跄地步入了战后岁月。

（二）外交战略重点由联美到联苏

七大前后，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发生策略性转变之际，正是国际政治局势发生急剧变化之时。美、苏、英三国在雅尔塔会议上就远东问题达成妥协，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已成定局，德国法西斯战败投降，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在望。针对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在调整对美政策的同时，其外交战略的重点也逐步发生了转移，即由以联美为重点的外交战略转向以联苏为重点的外交战略。

自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基于对远东国际力量对比的现实估计，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重点一度转向联美，奉行积极的对美合作政策。相对而言，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联系则比较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改变了国际政治力量分野的基本看法，更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改变了同苏联的友好关系。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和对苏政策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共同的革命利益和意识形态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联苏政策是根本的，而联美则是暂时的。因此，中共中央始终认为，苏联是中国志同道合的朋友和支持者。联合苏联，取得苏联的同情和支持，以促进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中国共

① 《纪念抗战八周年》，《解放日报》，1945年7月7日。

②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50页。

产党的一贯政策。只是由于苏联身陷苏德战争而无暇东顾,中国共产党才未能将对苏政策作为自己外交战略的重点。从1945年年初开始,随着苏联远东政策的变化,中共中央在积极开展对美外交的同时,也在着手调整和加强与苏联的关系。

根据对国际形势的观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预测,苏联在打败德国后,将参加远东战争。1945年2月,中共中央在一份党内指示中指出,苏联有可能参加对日作战,苏联参战将对中国政局产生重要影响^①。毛泽东认为,欧洲战争结束后,“苏俄必然会参加对日作战行动,应该毋庸置疑”^②。3月,中共中央在另一份党内指示中又指出:“三大国在解放欧洲之后,将立即增强解放亚洲的可能性,而太平洋问题,没有苏联参加,也绝不会得到彻底解决。”^③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推进,中共中央显然已经逐步认识到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必然性,而且也注意到苏联在远东问题上的影响力正在逐步上升。因此,中共中央在制定对外政策时开始将目光转向苏联,突出苏联的地位和作用,而对联美则愈来愈持谨慎的态度。

4月5日,苏联政府正式宣布废除《苏日中立条约》。这一事件表明苏联参加对日战争已经明朗化,且为期不远。中国共产党对这一事件立即作出了反应。4月8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对苏联废除《苏日中立条约》给予了高度评价。4月18日,毛泽东批转了《晋察冀分局关于积极进行配合苏联作战的准备工作》的指示。该指示指出:“苏联废除苏日中立条约,表示苏联将要参加远东战争,估计苏日战争爆发为期不远,远东问题将发生大的变化。今后我们的任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8页。

② [苏]彼得·弗拉基米洛夫著,吴文德等译:《延安日记》,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70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1页。

务,在配合苏、英、美三大盟国(过去一年只提配合英、美)作战中,主要配合苏联。”为实现这一战略性转变,指示要求对干部进行教育,使干部认清美国对华政策的本质,了解只有苏联才是最先支援中国抗日的国家,在宣传工作中应着重宣传苏联力量的强大和苏联参加远东战争的重要性^①。毛泽东批转的这份指示是中国共产党外交战略重点由联美转向联苏的重要标志。

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重点的转移在中国共产党七大的政治决议中得到了直接反映。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认为,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内部仍然存在着民主与反民主、民族解放和民族压迫的斗争,而且这种斗争将对战后的世界政治产生重大影响。据此,他一方面对英美政府奉行的对华政策提出警告和批评;另一方面又对苏联给予了高度赞扬,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对苏联的仇视态度,迅速改善中苏邦交。毛泽东指出:“苏联是第一个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和中国订立平等新约的国家。”北伐战争时期,“苏联是当时唯一援助中国解放战争的国家”。抗日战争开始后,“苏联又是第一个援助中国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国家”^②。因此,“苏联,毫无问题是朋友,是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③。他断言:“太平洋问题的最后的彻底的解决,没有苏联参加是不可能的。”^④毛泽东在七大的总结讲话和闭幕词中,对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和战后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谴责了美国的反苏反共行为,并初步提出了配合苏军作战,夺取东北的计划。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为中国共产党调整外交战略

① 《晋察冀分局关于积极进行配合苏联作战的准备工作指示》,1945年4月12日。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5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0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5页。

的重点奠定了思想基础。

七大以后,中国共产党根据新的国际形势,及时地将外交战略的重点转向联合苏联。中共中央调整外交战略是以苏联将参加对日战争并支持中国革命运动为前提的,其目标有两个:一是通过配合苏军作战,取得苏联的直接援助。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相信,苏联作为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加上苏共与中国共产党的特殊友谊,苏联有可能支持中国的革命运动。二是利用苏联参战创造解决国内问题的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共中央认为,苏联从维护远东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考虑,不会允许战后美国独霸中国,也不会赞成国民党发动内战。

但是,中国共产党调整外交战略的时候,正是美苏在中国问题上进行秘密交易、中苏谈判紧张进行之时。中国共产党外交战略重点的转移意外地遇到了来自苏联方面的障碍。

首先,苏联领导人不信任中国共产党。尽管中国共产党与苏共有着深远的历史联系,但双方也存在着一些隔阂和矛盾。苏联领导人始终对中国共产党摆脱其控制,独立自主地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政策,充满疑虑。苏联领导人多次在私下和公开谈话中直言不讳地表示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1944年6月10日,斯大林、莫洛托夫在会见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时说:“中国共产党并非真正的共产党,他们是‘冒牌’共产党。”8月31日,莫洛托夫在会见赫尔利和纳尔逊时说,不应把苏联与中国共产党联系起来,“他们虽自称共产党,但与真正的共产党完全不相称。他们以共产主义的名义来表示不满,但经济状况一旦好转,他们便会忘记自己是共产党,如果美国政府帮助他们,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就会少得多;问题的关键是为他们提供工作,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如果蒋介石能这样做,他们就不会再闹事”。1945年6月,斯大林对来访的美国总统外交首席顾问霍普金斯表示,蒋介石是中国领导人中最好的一个,而且将是唯一能负起统

一中国重任的人,他不相信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有蒋介石那样好,也不相信他们有能力实现中国的统一。斯大林还在其他场合把中国共产党说成是“来路不正”的共产党,是“红萝卜”式的共产党,意思是外面红,里面白^①。7月,中苏谈判时,斯大林又对宋子文说,中国共产党人是“爱国者”,至于是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则“颇有疑问”^②。苏联领导人如此看待中国共产党,是出于其政治和外交战略的需要,是为了让国民党在战时拖住日本,在战后保障其在远东和中国的权益。但这对中苏两党关系造成了一些不利的消极影响。

其次,苏联政府实行不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对华政策。苏联对华政策的出发点是维持其在远东地区的利益和确保其东部地区的安全。为实现这一目标,苏联一方面积极与美国协调对华政策,承认国民党的统治地位,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另一方面又利用外交手段和实力地位,对国民党施压、对中共表示友好,促使中国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而美国为了尽快战胜日本,减少伤亡(美军估计要占领日本本土,美军至少要伤亡100万人),在军事上有求于苏联,需要苏联出兵对日作战;为了限制苏联势力在中国的扩张,确保战后的中国成为一个统一的亲美国家,美国又需要苏联政治上的支持。为此,从1943年10月的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11月的德黑兰三国首脑会议到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苏联与美国就中国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秘密交易,奠定了双方在战后合作的基础。苏联以承诺战胜德国三个月后参加对日作战、承认美国在中国的主导地位为条件,谋求在中国东北地区享有特殊权益;而美国则奉行“一种利用苏联在华谋求

① [美]赫伯特·菲斯著,林海等译:《中国的纠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9、203、344、163页。

②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588页。

利益的欲望去削弱共产党的政策”^①,以满足苏联要求为条件,促使苏联支持国民党政府。《雅尔塔协定》便是双方秘密交易的具体化。《雅尔塔协定》规定,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是:(1)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2)由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权益须予恢复,即:(甲)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乙)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丙)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3)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②。苏联方面表示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协定。《雅尔塔协定》是美、苏两国背着中国政府秘密签订的,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也充分反映了苏联对华政策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为了实现《雅尔塔协定》,从1945年7月开始,中苏在莫斯科开始了长达一个半月的谈判。本来在《雅尔塔协定》中并未涉及的中国共产党的问题竟然成为双方讨价还价的筹码。在谈判中,当宋子文秉承蒋介石的旨意,要求苏联保证不支持中国共产党时,斯大林明确表态,中国政府要求军令政令统一,“此实为合法之要求,中国必须只有一个政府与一个军队”。对于中国共产党,“吾人并不予支持,亦并无支持彼等之意向,吾人认为中国只有一个政府,如在中国国内有另一政府,自称为政府,此当应由中国自身解决问题”。今后苏联援助中国的一切武器和其他

① [美]迈克尔·沙勒著,郭济祖译:《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89页。

② 《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31—231页。

物资“自当给予蒋委员长之政府”^①，不供给武器与中国共产党。当宋子文提出，国民党反对在中国建立联合政府时，斯大林表示，苏联对此充分理解。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第一条明确规定：“苏联政府同意予以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那么，根据这一条约，苏联政府将支持和援助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而不支持中国共产党，并答应将东北主权交给国民党政府接收。8月16日，蒋介石在给赫尔利的电报中认为，这个条约的内容表明，苏联方面有意帮助促成中国军队的统一，有意支持中国创造一个统一、民主政府的努力，有意支持中国国民政府。8月27日，斯大林向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表示，苏联准备按协议从东北撤军，并希望国民党政府派兵到东北接管治安^②。在此之前的1944年6月斯大林同哈里曼的谈话、9月莫洛托夫同赫尔利的谈话、1945年5月斯大林同霍普金斯的谈话，都明确表示苏联不支持中国共产党，称赞蒋介石是中国领导人的最佳人选。事实表明，“无论在雅尔塔协定中，还是在与蒋的谈判中，俄国都没有采取公开行动来维护中国共产党的特殊利益”^③。就连美国驻苏使馆也认为：“由于俄国的保证，中共讨价还价的地位和企图获得军事支持的基础无疑地大受削弱。”^④

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和政策，势必要影响它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这对中国共产党实施联苏战略将是极为不利的。对此，中共中央也有一定的思想准备。在中国共产党七大的总结讲话中，毛泽

①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620、613页。

② 薛衡天：《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45—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③ 《斯堪文集》（一），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415页。

④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179页。

东清醒地估计到,外国无产阶级和苏联有可能长期不援助我们。他要求全党团结起来,学会自力更生。同时,毛泽东又坚信,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会来,苏联的援助一定会来^①。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一方面高度评价了苏联参战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又反复强调全党要坚持自力更生。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已经预料到可能得不到苏联的直接援助。毛泽东的讲话实际上确立了战后中国共产党处理对苏关系的基本方针,即立足于自力更生,冲破苏联外交政策的限制,争取与苏联合作。因此,无论是否获得苏联的援助,中国共产党都坚定地将外交战略的重点转向联合苏联,只是联合的范围将受到一定的限制。

二、中国共产党善处对苏关系与争夺东北的斗争

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七大曾经预见,在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中国将面临着是走上独立、民主、统一、富强的道路,还是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这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严重斗争。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斗争构成了战后中国政治斗争的基本内容。国民党的根本目标是使中国重新回到战前状态,恢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为此,它时刻准备用战争手段来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纲领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中国。但问题在于,国民党得到了美国的大力支持,而苏联又奉行与美国协调一致的对华政策,即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中国共产党获得国际援助的希望却十分渺茫。这样,在战后中国政治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日本刚一投降,中国共产党就受到来自国内外三方面的压力:一

^①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1—393页。

是美蒋勾结，垄断对日受降权，将中国共产党排斥在外。8月11日，蒋介石命令八路军“就原地驻防待命”，“勿擅自行动”。8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布第一号命令，规定在中国境内（除东北外）的日伪军只能向蒋介石的政府军投降，公然剥夺了中国共产党接受日伪军投降的权利。为此，中国共产党被迫开展了反对美蒋垄断受降权的斗争。中共中央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向美、英、苏三国政府发出说帖，说明中国解放区和沦陷区的抗日武装有权接受日伪军的投降，有权派遣代表参与处理日本投降的善后工作，并要求美国立即停止对国民党政府的租借援助^①。但是美英政府拒绝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当要求，而苏联又未予理会，实际上是不支持中国共产党争取受降权。结果，中共中央只得放弃了原定的夺取大城市的计划。二是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一方面玩弄和谈阴谋，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另一方面又加紧部署内战，准备用武力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面对蒋介石的政治攻势，中国共产党一开始采取了强硬的立场，认为蒋介石提出和谈“全系欺骗”^②，是为发动内战做舆论准备。但为了争取政治上的主动，中共中央不久就改变了态度，不仅决定派毛泽东赴重庆谈判，而且准备作出必要的让步。毛泽东在8月23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甚至提出了准备走迂回曲折道路的政治策略，即与蒋介石“搭伙”，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经过相当长的时期之后，再“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③。三是苏联为确保雅尔塔体制的充分实现，一方面承认国民党在全中国的统治地位，以换取蒋介石承认苏联在东北享有特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38—240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3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殊权益;另一方面又要求中国共产党放弃武装斗争,参加国民党政府,以避免中国发生内战,引起美苏冲突。8月22日,斯大林致电中共中央,要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寻求维持国内和平的办法,认为中国若发生内战,中华民族就有灭亡的危险^①。在如何实现国内和平问题上,斯大林准备参照法共和意共的模式,劝说中国共产党解散军队,参加政府^②。斯大林的电报表明,苏联不仅不会援助中国共产党,而且还要求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作出妥协。

战后初期,中国共产党所承受的压力是十分巨大的。然而,经过八年浴血抗战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一个思想上和政治上完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她不再听任某个大国或国际指挥中心的随意摆布,能够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内外事务,抵制各种外来干涉和错误干扰,能够敏锐地洞察国际国内形势并相应地确定自己的战略和策略。中国共产党对战后国内外形势的认识是十分清醒的。中共中央认为,“美、苏都不愿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苏因中苏条约的限制不能公开支持共产党,美也不便公开支持蒋介石。蒋因兵力分散,不能马上发动内战”^③。这对中国人民争取和平是有利的。同时,苏联出兵东北客观上将造成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态势,无论苏联是否援助和支持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都可以积极利用这一有利形势。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分析,中共中央决心力争主动,一边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一边开始实施酝酿已久的争取东北的战略计划。为配合国内斗争需要,中共中央决定继续实施以联合苏联为重点的外交战略。

①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08页。《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615页。

② [南]弗拉吉米尔·杰吉耶尔著,叶周等译:《铁托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118页。

③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615页。

事实上,无论是和平谈判,还是争取东北,都与中共中央确立的联苏外交战略有着密切关系。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包含着协调对苏关系,以换取苏联的支持;而争夺东北则是实施联苏战略的重要步骤。

联合苏联,夺取东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是抗战后期中共中央的重要战略设想之一。东北地区东临朝鲜,西连蒙古,北靠苏联,是中国平津地区的屏障,兼以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工业发达,交通便利,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是西方列强觊觎与争夺的主要目标。不仅如此,东北还在中国局势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果中国共产党控制了东北,就可以背靠苏、朝、蒙边界,南与冀热辽解放区和华北解放区连成一片,彻底改变长期被分隔包围的局面,使自己有一个巩固的战略后方。反之,如果国民党占据了东北,就可以切断华北解放区与苏、朝、蒙的联系,使中国共产党处于南北夹击和重重包围之中。因此,东北的归属问题成为国共关注的焦点。蒋介石在战后多次强调接收东北的重要性,把东北喻为“国家的生命线”。毛泽东则提出,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有了坚实的基础^①。

战后东北的格局是美苏和国民党政府经过长时间的外交斗争与妥协而确定的,其中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应有地位。苏联出兵东北,为中国共产党进军东北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根据中苏条约的规定,苏联将按期撤军,并将东北交给国民党政府接收,中苏条约又成为中国共产党夺取东北的障碍。因此,中国共产党进军东北不单是一场军事斗争,更是一场外交斗争。如何妥善处理与苏联的关系,是中国共产党能否夺取东北的关键。还在抗战后期,中共中央就将控制东北与配合苏军作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加以考虑。8月9日,毛泽东

^①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11页。

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号召抗日军民密切而有效地配合苏军作战。8月11日，朱德发布第二号令，要求八路军吕正操、张学思、万毅、李运昌等部向东北进发。这是中国军队向东北进发的第一道命令。8月13日，冀热辽军区决定调动部队兵分三路挺进东北，配合苏军解放热河、吉林、辽宁三省。8月20日，中央军委致电山东、平原、冀鲁豫和晋察冀分局，要他们抽调九个团，即行开赴东北，“乘红军占领东北期间和国民党争夺东北”^①。此时，由于中苏条约尚未公布，苏联对华政策及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不甚明朗，中共中央最初在进军东北问题上采取了积极而又谨慎的方针。8月22日，中共中央电示晋察冀分局，苏军已占领热、察两省，其政策尚不明朗，在争取热、察两省时，必须以友好的态度与苏军协商，在其允许的范围内开展工作，凡是“为红军所坚决反对之事我必须照顾，不要使红军在外交纪律上为难”^②。中共中央的指示和中国共产党军队配合苏军作战的实际行动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将外交战略的重点转向了联合苏联。

8月26日，中苏条约正式公布，苏联对华政策明朗化。中共中央迅速对苏联政策作出了正确判断，并确定了处理与苏联关系的基本原则。8月29日，中共中央在给晋察冀分局的指示中指出：（1）“苏联为了维护远东和平与受中苏条约之限制，必须将东三省交还国民党政府，国民党军队亦将进入东三省。我党我军进入东三省后，红军必不肯和我作正式接洽或给我们以帮助。”但是，中苏条约也有可利用之处，苏军报刊亦表示在中国支持民主与进步。因此，我党我军在东北的行动只要不直接影响苏联在条约中承担的义务，苏军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5页。

② 《中共中央给晋察冀分局的指示》，1945年8月22日。

“将会采取放任态度并寄予伟大之同情”。(2)各地区派驻东北的干部和部队应立即出发,只要苏军不坚决反对,即可非正式进入东北。(3)进入东北的部队不要用八路军的名义,不要在报上发表文章,不进大城市,不勉强与苏军建立联系,不请求苏军给予援助。一切只要苏军不坚决反对者,即可放手进行。但是,苏军坚决反对者,必须予以照顾,不使苏军在法律上为难^①。事实证明,中共中央对外交形势的分析和确立的基本原则是完全正确的。

根据上述指示,中共中央不断调整战略部署,采取灵活的外交策略,从而使自己在争夺东北的斗争中抢占先机,立于不败之地。

首先,尊重中苏条约,“顾及苏联国际信用”。中苏条约是中苏两国政府为战胜日本和防止日本再事侵略而签订的政治和军事联盟条约。为了抢占东北,国民党政府不惜以损害国家主权为代价,来换取苏联承认其接收东北主权的合法地位。虽然从国家关系的角度看,中苏条约是代表中国的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的,苏联履行条约中规定的义务,是理所应当,无可指责的。但从国共关系的角度看,中苏条约将中国共产党排斥在外,剥夺了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受降和收复失地的权利,又显然是不公平的。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还是从国际斗争的大局出发,对中苏条约从积极方面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对苏联履行条约义务给予了充分谅解。8月29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称赞中苏条约“对于中苏两国人民深厚友谊的巩固和发展,对于日本法西斯的最后被击败与肃清,对于远东持久和平的建立,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②。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在回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的提问时指出:“我们完全同意中苏条约,并希望它的彻底实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57—258页。

② 《远东持久和平的基石》,《解放日报》,1945年8月29日。

现,因为它有利于两国人民与世界和平,尤其是远东和平。”^①对于苏联受中苏条约的限制,不能援助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并没有抱怨,更未提出责难,而是主动调整了战略方针,改独占东北为着重夺取东北小城市及广大乡村。中共中央还致电东北局,要求在争取东北工作中要注意“顾及苏联国际信用”^②。当苏联为履行中苏条约,要求中国共产党军队退出大城市时,中共中央表示同意。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书记的陈云曾致电中共中央:“为了执行中苏协定,苏联采取这样的措施是必须的,是应该被我们谅解的。”^③中国共产党的顾全大局赢得了苏军的同情和支持。

其次,利用条约可利用之处,确立“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中苏条约对于中国共产党争取东北无疑是一种限制,使中国共产党无法获得苏联的直接援助,无法进占东北大城市和交通要道,无法在东北公开活动。但中国共产党没有因此而萎缩不前。中共中央通过对条约进行认真分析后认为,条约确有可利用之处。中苏条约明确规定,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因此,只要中国共产党不以党派的身份去抢占东北,就不会受到东北苏军的限制。为此,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去东北之部队与干部立即出发,可用东北义勇军名义非正式进入,不声张不登报,走小路。控制苏军未驻之城市、乡村,不能去的城市亦须派干部去与红军作非正式接洽”^④。由于采取了正确的活动方式,9月5日,冀热辽军区曾克林部率先进入沈阳。9月15日,东北苏军指挥部派代表在曾克林陪同下抵达延安,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就如何协调中国共产党与苏军在东北的关系问题进行会

① 《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29页。

③ 《陈云文选(1926—1949)》,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1页。

④ 《中央关于去东北工作应注意事项的指示》,1945年8月29日。

谈。苏军代表提出,根据苏军统帅部指示,在苏军撤出之前,国共军队均不得进入东北,请进入东北的八路军个别部队退出苏军占领区。苏军撤出后,中国军队如何进入东北,应由中国方面自行解决。朱德答复,中国共产党军队可以不进入东北和热河的大城市,但苏军应将热河、辽宁原属于抗日根据地的地区移交给中国共产党部队接管。苏军代表表示同意。经过谈判,双方达成如下默契:苏军允许中国共产党军队进入东北,但不能以八路军的名义活动;中国共产党可以在东北乡村开展工作,但不得在大城市和苏占区公开活动;同意中共中央控制由冀热辽进入东北的通道^①。这样,中国共产党军队便顺利控制了从陆路进入东北的通道,而且控制了热河和辽西走廊。由于采取正确的外交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中苏条约对中国共产党的限制,造成了对中国共产党进军东北的有利形势,并直接导致了中共中央作出夺取东北的决定。9月17日,在延安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致电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毛泽东立即回电表示同意。9月19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指示,指出:“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②此后,中国共产党10万大军、2万干部相继开进东北。

再次,力争苏军的理解和支持,提出“竭尽全力,独霸全东北”的方针。中国共产党军队进入东北后,苏联为了维持其在东北的实力地位和特殊权益,采取了两面性的对华政策,一方面为了保持外交上的主动权,准备履行条约,将东北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交给国民党政府

① 参见牛军:《从赫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8—129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72页。

接收;另一方面,为了与国民党政府抗衡,抵制美国势力渗入东北,又对中国共产党采取有限度的支持。苏联的东北政策直接影响着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方针,正如陈云所说:“苏联力量的存在,对我在满洲的工作方针,显然起着决定的作用。”^①虽然中共中央在9月中旬提出了争取东北的战略方针,但当时的设想只是军队抢先进入东北或部署在靠近东北的东部、西部和北部,控制苏军未驻扎的乡村和一些中小城市,大发展的时机是在苏军撤出以后^②。中共中央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军事部署,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力量不足,另一方面是与苏联的东北政策有关。为了取得苏军的理解和支持,使苏军不干涉或少限制自己的行动,中共中央根据与苏军代表达成的协议,指示已进入东北的各部队,“在东北决不能采用八路军的番号,也不能用共产党的名义公开和红军接洽并取得其帮助,而只能用东北地方正规部队非正规部队(如东北人民自治军、某省防军、保安旅团、县区分队、工人自卫队等)及非共产党的面目,才能与红军指挥机关作正式的接洽,并取得红军的各种帮助及委任”^③。9月30日,中共中央正式命令进入东北的部队改用“东北人民自治军”的番号。中国共产党的积极配合和友好合作,赢得了苏军的信任。苏军也开始冲破中苏条约的限制,向中国共产党提供有限的但极为重要的帮助。苏联远东军司令部通知东北驻军,凡佩带“东北人民自治军”标志的部队可以自由行动,各地苏军不加限制。苏军不仅采用“移交”和“遗弃”的方式向中国共产党军队提供了大批军事装备,还采取各种方式阻止国民党政府接收东北和海上进军东北,并将营口、

① 《陈云文选(1926—1949)》,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1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99—301页。

③ 《中央给各区中央局指示电》,1945年9月15日。

葫芦岛等战略要地交给中国共产党军队接收。由于得到苏军的友好合作与帮助,中国共产党在东北获得迅速发展。根据这一有利形势,中共中央于10月19日指示东北局,要求东北部队改变过去分散的方针,将战略重心南移,“守住东北的大门,争取时间,以便开展全东北的工作”^①。10月23日,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竭尽全力,霸占全东北”^②的方针。

最后,适应苏联政策变化,提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中国共产党力量在东北的迅速发展,引起美蒋的极大恐慌。至1945年11月初,国民党在“外交接收”东北遭到失败后,便开始采取两手策略,外交上与美国勾结,向苏联施加压力,迫使其履行条约的规定;军事上在美国帮助下,准备以武力接收东北。11月15日,国民党政府宣布将东北行营撤回关内。次日,国民党军攻占山海关。面对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和外交双重压力,苏联虽然希望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发展以牵制美国,但它并不愿冒因支持中国共产党而与美蒋发生武装冲突的风险。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随即发生了变化,由支持转为限制。苏联先是答应了国民党政府要求苏军暂缓从东北撤军一个月的请求,接着要求中国共产党限期撤出已控制的大中城市及交通要道,交出已接收的政权。苏联态度的突变给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发展造成了一定困难,促使中共中央再次调整自己的战略方针,由“独占全东北”转向建立东北根据地。11月20日,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退出长春路沿线及大城市,“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并加强热河、冀东的工作。应在洮南、赤峰建立后方,作长久打算”^③。11月22日,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64页。

② 《中共中央给东北局的电报》,1945年10月23日。

③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73—374页。

的方针。11月28日,中共中央再次指示东北局:“苏联由于条约限制,长春铁路沿线各大城市将交给蒋介石接收。我企图独占东北已无此可能,但应力争我在东北之一定地位。长春铁路沿线及东北各大城市我应力求插足之外,东满、南满、北满、西满之广大乡村及中小城市与次要铁路,我应力求控制。目前你们应以控制长春路以外之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及广大乡村为工作重心。”“有重心的建立根据地,作长期打算。”^①至12月28日,毛泽东正式提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方针。中共中央对战略方针的调整,从表面上看是在苏联改变政策的情况下被迫作出的,但它也包含着中共中央对苏政策的调整。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东北局一再告诫东北各部队,中国共产党军队撤出大城市“并不是因为苏军之无理的限制或右倾,乃是为了顾全大局,为了顺利地对美、蒋进行世界性的外交斗争”^②。反复强调,要“防止干部中以为不经过严重斗争而可以取得全满洲的想法,竭力避免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苏联的援助上,以苏联对我们援助一时增减而发生盲目的乐观或悲观失望的情绪”^③。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对苏关系时又确立了新的原则,即在形式上与苏联隔离,强调自力更生。

1945年年底至1946年春,由于苏联采取对国民党缓和、对中国共产党限制的政策,国民党在苏军的协助下,相继接收了东北的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但是,苏联采取这一政策的根本目的是把东北完全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拒绝美国染指。因此,当苏联看到蒋介石与美国沆瀣一气,大量运兵东北、热河时,为避免国民党独占东北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47—448页。

② 《彭真文选(1941—1990)》,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页。

③ 《陈云文选(1926—1949)》,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3页。

和美国势力渗入东北，遂又改变态度，转而把援助之手伸向中国共产党，采取以共制蒋的政策。中国共产党立即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争取苏军在撤离时将部分地区交由自己接收。对此，苏军也给予了积极配合，一边对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军事行动网开一面，大开方便之门；一边设置种种障碍，阻止或延缓国民党政府在东北的军事行动。到5月3日苏军全部撤离东北时止，中国共产党军队不仅控制了苏军撤出的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大城市，而且占领了黑龙江至松花江的广大地区，从而实现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预期设想，为解放全东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综观中国共产党争取东北的斗争，不难看出，这是一场激烈而复杂的军事与外交的较量。在这场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坚定地实行联合苏联的外交战略，充分利用苏联对华政策中有利于自己的一面，妥善处理对苏关系，始终采取配合和适应的政策，不断调整战略部署，凭借实力和智慧，不但抢先进入东北，而且迅速打开局面，获得了稳固的地位，从而改变了国共双方的战略态势。也正是在此期间，在东北地区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局部战略合作关系，从此奠定了此后双方关系发展的基础。

三、中国共产党中立美国策略的提出及其实施

如前所述，早在抗日战争结束前，美国政府即已确立了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这一政策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支持和扶助一个亲美政权。在美国政府看来，要控制中国，实现其在华利益，全力支持蒋介石是美国在中国唯一可能的选择。其二是遏止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美国政府决策者认为，国民党军队意志消沉，政府失去人民支持，是经不起战争考验的，要支持蒋介石必须同时遏止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同时美国还担心如果中国共

产党夺取政权,“一个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将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与苏联结成紧密的联盟”^①,从而成为美国实现其战后全球战略的重要障碍。对此,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后来在一份报告中作了明确表述:“美国在中国基本的长期目标是,促进在一个独立、统一、对美国友好的、并且能够有效地阻止苏联在远东可能的侵略的中国建立一个稳定的、代议制政府。不过,由于中国的混乱状况,短期内能够实现的最重要的目标是阻止共产党完全控制中国。”^②由此可见,美国在抗战末期确立扶蒋反共政策本来就是着眼于战后控制中国、遏止苏联、称霸全球这一战略目标的。因此,即使抗战胜利了,美国也决不会轻易放弃这一为之追求的目标,而会进一步采取措施,变换策略手法,以求彻底实现这一目标。

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对华政策面临三种可能的选择:“(一)完全摆脱一切牵连;(二)大规模地在军事方面加以干涉,援助国民党击败共产党;(三)一方面援助国民党尽可能广大地在中国确立其权力,一方面鼓励双方从事协商,尽力避免内战的发生。”^③第一种政策是美国政府不愿采取的,因为它不符合美国对华政策的长期目标。支持蒋介石政权,进而控制中国是美国自抗日战争爆发以来的既定方针,而没有美国的支持,国民党政府将会被击败,美国将会失去中国。正如美军中国战区司令魏德迈将军所分析的那样:“中国是东西方之间的一座桥梁。今天,由于出现了强大的苏俄,中国也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强国,即苏俄和美国的政治、经济角逐的舞台。如果中国成为苏俄的一个傀儡国,——那末,苏俄就会在实际上控制欧亚大

① 《美国外交文件》,1947年第7卷,第287页。

② 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49)》,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453页。

③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35页。

陆。”即使中国以后不会变成苏联的傀儡，只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取得政权，“考虑到中共的性质、意识形态和以前的态度，很难想象美国的任何一种权益能在如此的共产主义国家内得到发展”^①。因此，无论是从政治、军事利益还是从经济利益上考虑，美国都不可能完全放弃中国这一战略基地和商品市场，不可能摆脱一切牵连而不过问中国局势。美国政府曾考虑采取第二种政策，但又认为它虽然“令人神往”，却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实行大规模的武装干涉必将遭到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的强烈反对，也为美国国力、民心所不容，并会影响美国以欧洲为重点的全球战略的推行。特别是美国担心对中国进行军事干涉会引起苏联的强烈反应，要冒与苏联发生全面对抗的危险。就连美国总统杜鲁门也认为，中国“不是任何近代的西方军队所能征服的”，“要想以武力把我们的生活方式强加于”中国，“在过去是愚蠢的，在现在也是愚蠢的”^②。第三种政策是美国政府最为欣赏的“最佳方案”。因为，一方面，国共两党正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在许多问题上已经达成协议，存在调处国共争端避免内战发生的可能；另一方面，苏联同中国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表明，“（一）苏联方面有意帮助促成中国军队的统一；（二）有意支持中国创造一个统一、民主政府的努力；（三）有意支持中国国民政府”^③。苏联政府也公开表示支持国共争端的政治解决。采取这一政策，美国既可以避免招致中国人民的反对和冒与苏联军事对抗的风险，又可以在不投入军队和增加财政支出的情况下，置中国于美国影响之下。因此，经过激烈的讨论和反复斟酌，美国政府最终选

① 转引自傅德林：《美国特使在中国》，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8—29页。

② [美]哈里·杜鲁门著，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104页。

③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182页。

择了第三种政策,这就是在军事上大力援助国民党,帮助国民党政府运送军队到华北地区,尽快恢复对全中国的有效统治;在政治上寻求国际和中国国内的妥协,在全力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前提下,通过政治谈判解决国共争端,避免卷入中国内战。这一政策反映了美国战后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立场,它表明美国对华政策已由赤裸裸的扶蒋反共调整为在援蒋的前提下,表示不卷入中国内战,并愿意在国共之间进行“调停”的两面政策。美国企图通过扶助蒋介石,软化中国共产党,调处国共冲突,不战而控制中国。

为执行这一政策,抗战末期和战后初期,美国在政治、外交、军事上采取了一系列实际行动和具体措施来扶蒋压共。美国希望通过这些行动和措施,使中共感到孤立无援而作出让步,使国民党感到压力而进行某种改革,最终促成国共和谈,建立一个在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的、亲美的中国。

首先,在外交上借助苏联的力量,取得苏联支持蒋介石而不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承诺。美国在远东既要遏制苏联势力的扩张,在解决中国问题时又离不开苏联的支持,害怕苏联支持中国共产党。从罗斯福到杜鲁门,美国政府的决策者一直认为,中国革命是苏联领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是“克里姆林宫的工具”,只要苏联不支持中国共产党,中共将无能为力,就会屈服。因此,解决中国问题绕不开莫斯科,唯一的办法是美苏就中国问题达成直接谅解。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和认识,1944年间,罗斯福派往中国的两名特使华莱士和赫尔利都曾经奉命取道苏联,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进行会谈,设法取得苏联不支持中共而只承认和支持蒋介石政府的保证。1945年5月,杜鲁门上台后又派霍普金斯访问苏联,再次取得斯大林的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的承诺。即使这样,美国政府仍不放心,在随后的中苏条约谈判中,美国政府指示驻苏大使哈里曼,

要他争取苏联以明确的语言“毫不含糊地承诺”支持中国国民党政府，“不支持中国内部的持不同政见分子”^①。哈里曼在给国民党政府起草的中苏条约的换文中专门写上了苏联给中国的援助“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的条文。美国一再取得苏联不支持中共而只支持蒋介石政府的承诺，其意图在于通过改善中苏关系孤立中国共产党，以此压迫中共接受蒋介石的条件，交出军队和政权，从而实现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

其次，在军事上帮助蒋介石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一是助蒋垄断受降权，阻止中共军队接受投降。为了全力扶植蒋介石，美国政府以种种借口和理由阻止中共受降。8月12日，赫尔利急电美国政府，说：“如果美国政府和联合国允许中国的一个拥有武装的敌对政党接受日本投降，并缴收日本人的武器，那么中国的内战便会因而不可避免。”并建议“不准把日本人的武器交给中国共产党武装部队”^②。日本刚一投降，美国总统杜鲁门就发出第一号命令，要日本天皇命令中国战区的日本军队向蒋介石的军队投降。美国远东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也命令日军只能向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投降，不得向中共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投降。美国还与国民党勾结，命令日本军队坚守岗位和维持秩序，阻止共产党军队受降，等待国民党军队来受降。二是帮助国民党军队运送军队抢占战略要地。抗战胜利时，国民党军队还龟缩在西南、西北一隅，长江以北连国民党政府的影子都没有，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遍及大江南北。美国总统罗斯福认为，假如“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向海边开去，那么整

① 《美国外交文件》，1945年第7卷，第969页。

② [美]哈里·杜鲁门著，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第3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374页。

个中国就将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①。因此,美国政府与国民党政府共同拟定了在150天内由美国海军、空军将成千上万的国民党军队运往战略地区接受日军投降的计划,并进行了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空中军队调动,先后将国民党13个军47.37万人从西北、西南大后方运到北平、天津、上海等地,并出动9万海军陆战队在天津、青岛、秦皇岛等地登陆,替国民党军队强占战略要地。对此,魏德迈在给艾森豪威尔的一份电报中这样描绘:“领先收复失地的整军整师的军队由美国飞机空运到上海、南京和北平。从太平洋调来美国第七舰队的一部分军舰,后来运送中国部队至华北,另有五万三千名海军陆战队占领平津地区。负有军事占领任务的中国部队的空运工作由第十和第十四航空队负责,这无疑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空中军队调动。”^②三是向国民党政府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派出军事顾问团帮助国民党训练军队和进行军事策划。据统计,在战后初期美国以租借名义给国民党政府提供的援助总值达8.39亿美元,并帮助蒋介石训练了15万军事人员,装备54个师。美国这些所作所为表明,虽然它一再声称不卷入中国内战,但其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的实质并没有根本改变。

再次,在政治上建议重开国共谈判,诱使中共交出军队和政权。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强烈要求和平,反对内战,而国民党准备内战又需要时间,美国政府便建议国民党重开国共谈判,用“和谈”笼络、欺骗中国共产党。就连美国总统杜鲁门也坦率地承认,日本投降时,“蒋介石甚至连占领华南都有极大的困难。要拿到华北,他就必须

① [美]哈里·杜鲁门著,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374页。

② 转引自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43—44页。

同共产党人达成协议，如果他不同共产党人及俄国人达成协议，他就休想进入东北”^①。正是在美国的一手策划下，蒋介石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还专程从重庆到延安迎接毛泽东。

但是，美国的这种两面政策显然是自相矛盾的，企图既武力援助蒋介石又避免卷入中国内战只是美国政府的良好愿望而已，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它失败的命运。关于这一点连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他在回忆录中说：“用武力支持蒋介石反对共产党，同时又倡议试图在它们之间设计出一项政治协议。这种政策本身明显地存在两重性，虽然我们当时对这一点还不那么清楚认识到。我们将看到，在与马歇尔将军谈话讲到给他的任务时，他不时表示担心，或许需要有魔术师的技巧才能完成这些任务。但只是到了后来，我们才真正理解实际上我们是在不可妥协的党派之间寻求妥协。——现在看来采取这种政策是注定要失败的。”^②

面对战后的复杂局势和美国的对华政策，中共中央始终保持沉着冷静的态度，进行总揽全局的考虑和部署。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同国民党进行国内斗争，争取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统一的新中国。毛泽东指出，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国共联合抗日的独立战争向国共争夺政权的统一战争转化，从长远看，内战不可避免。但是，由于美苏不愿中国发生内战，人民渴望和平，因此，经过努力，内战有可能被推迟，并将产生一个“两党合作

① [美]哈里·杜鲁门著，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303页。

② [美]艾奇逊著，伍协力译：《艾奇逊回忆录》，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16—17页。

(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①。根据这一判断,中共中央决定战后对蒋斗争的基本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但是,中共中央也认识到,国共斗争不是孤立的,必然会受到国际因素的制约。美国虽然表示不介入国共斗争,却是蒋介石幕后最有力的支持者,要开展对蒋斗争,就不能不顾及美国的反应。为了尽可能缩小同美国的矛盾,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集中力量开展对蒋斗争,中共中央在坚持防美政策的前提下,提出了中立美国的策略方针。

1945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对美蒋斗争策略的指示》中指出:“目前世界的中心问题是美苏之争,反映在中国便是蒋共之争。美国对华政策是尽力扶蒋、打共、反苏,而蒋之政策则在打共时企图中立苏,在反苏时又必望联上共。”“因此,我们目前在以对蒋斗争为中心时,一方面固应表示与苏联无关,另方面有时(甚至只是形式上的)也可中立美国,以减少我们一时或某种程度的困难。”^②所谓“中立美国”,就是使美国在国共斗争中保持某种程度的中立,以减少美国干涉带来的消极影响。这一策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美国援助蒋介石,企图变中国为美国独占殖民地的政策保持高度警惕,对美国直接干涉中国内政的活动进行严正抗议和坚决抵抗。正如中共中央在指示中所指出:“这种中立美国,只是在对蒋斗争中的一种策略”,“并非不反对美国殖民地化中国的政策,也并非不抗议美国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和参加中国内战的政策,更非在美军进攻我们时不采取抵抗政策。相反的,对于美国政府的这种帝国主义政策,应持坚定的立场,严正的批评和坚强的抵抗以反对之,方能给以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3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55页。

打击和教育人民”^①。二是对美国采取不挑衅的政策,以减少其寻衅的借口,尽可能避免美国直接卷入中国内争。可见,中立美国实质上是一种反干涉的策略。

中共中央提出中立美国的策略是建立在对战后国际局势、美苏对华政策和国民党内外部政策进行正确分析和判断的基础之上的。第一,战后中国有可能走上和平建设的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认为,战后美、苏都不愿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苏联因中苏条约的限制不能公开支持共产党,美国也不便公开支持蒋介石。蒋介石因兵力分散,不能马上发动内战^②。因此,全面内战的危险是可以克服的,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也应进行适当的调整,力争采取和平方式来实现党的战略目标。第二,美国对华政策中存在可资利用的内在矛盾。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认为,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扶蒋反共的基本点是不会改变的,但在国际上还存在着牵制美国的种种因素。美国为独霸中国,尚不愿中国发生内战,希望中国能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因此,美国扶蒋反共存在着“某种限度”^③。12月19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动和我党对策的指示》中指出:“虽然美国政策在基本上仍然是扶助蒋介石的(这是美国一贯政策,罗斯福亦如此,我们不可存幻想)”,但是,“美国已决定不直接参加中国内战,不援助蒋介石武力统一中国,而援助中国的和平统一。所有美国政策的这些变动,对中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当前斗争是有利的”^④。所以,对美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55—456页。

②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615页。

③ 参见章文晋:《周恩来与马歇尔使华》,载《周恩来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60页。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94页。

国对华政策中有利的方面,中国共产党完全可以加以利用。

中共中央提出中立美国策略的时候,正值国共在东北进行激烈争夺和赫尔利辞职、马歇尔使华的关键时刻。采取这一策略,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中美关系,减少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可能性,便于集中力量开展对蒋斗争。

中立美国策略的具体运用主要表现在:

缓和中美关系。虽然早在抗战末期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就已经转向以防范为主,但中国共产党始终没有准备与美国完全决裂。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虽然对美国助蒋抢夺抗战胜利果实表示不满,但仍然采取了十分克制的态度,并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改善中美关系,避免给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提供口实。9月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对美外交政策的指示》中指出:“尼米兹宣布美国海军仍将在中国登陆。目前我们对美外交极宜谨慎,方针仍是避免与美军冲突。”^①9月29日,当美军准备在天津等地登陆时,中共中央再次发出指示,强调:“美军日内在天津及中国沿海登陆,如与我军及我之行政人员接触,我应采取欢迎友好态度,避免与美军冲突,但照常执行职务。”^②不仅如此,中共中央还暂停了对赫尔利的公开批评。9月2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关于宣传方针的通知中说:“赫尔利、魏特迈耶(魏德迈——作者注)是很反动的,他们的方针是纵容日本,坚决扶持蒋介石反苏、反共,但美国政界及舆论界同情我们的甚多。我们对于赫、魏等暂时不采取公开揭露的政策。”^③这些方针和政策的实行,对于缓和与美国的矛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遏制美国对华政策的反动性。正如中共中央在《关于对美蒋斗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62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02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04页。

争策略的指示》中所说,采取中立美国的策略并非不反对美国殖民地化中国的政策,更非在美军进攻时采取不抵抗政策。对于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严厉斥责和坚决抵制。9—11月间,为了阻止美国帮助蒋介石向东北海运军队,中国共产党部队与美军先后在天津、烟台、泰山等地发生了冲突。中国共产党部队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与美军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对于美军侵犯中国共产党方面权益的行为,或严加拒绝,或坚决反击。10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指出,要求采取强硬态度,坚决拒绝美军在烟台、威海、龙口等地登陆,“修筑工事,实行抵抗”,“只有我军采取强硬态度,并在世界上引起舆论大风波之后,才能压制美军的无理干涉”^①。10月29日,中共中央就对待在华美军方针问题专门发出指示,指出:“目前我们对美军的方针是:在其尊重我方权益的条件下,欢迎其与我合作,但当美军行动有损于我之权益时,则必须在反对干涉中国内政的理由下,加以拒绝,或经交涉,加以制止。”^②11月8日,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宣布,他已决定派5.3万名美国海军陆战队代替国民党军队在华北执行任务。对此,朱德和中国共产党驻重庆代表团立即向美军和美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谴责美军蓄意干涉中国内政和帮助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12月9日,陆定一在延安发表题为《反对内战,反对武装干涉》的讲演,公开揭露美国武装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号召人们奋起加以制止。中国共产党的严正立场和坚决斗争,使美国片面扶蒋的行为不得不有所收敛,一再表示不干涉中国内政。

中立美国策略在马歇尔使华期间得到了充分运用。随着中国局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19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90页。

势的日益恶化,内战危机不断加深,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被迫于11月27日辞职。美国总统杜鲁门于12月15日发表对华政策声明,主张中国应停止内战,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会议,以促进中国之统一,表示“美国的支持将不扩展至以美国军事干涉去影响中国任何内争的过程”^①。并决定派“具有独一无二的资格和极高超的才干”^②的马歇尔将军到中国进行调停。中共中央在认真分析了杜鲁门的对华政策声明后认为,美国已决定不直接参加中国内战,不援助蒋介石武力统一中国,而援助中国的和平统一。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对当前中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是有利的。因此,对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和马歇尔的调停,中国共产党采取了积极欢迎的态度。12月3日,中共代表王炳南向美国驻华大使馆参赞史密斯表示,中国今后的发展与美国对华政策有很大关系,“共产党极盼马歇尔将军的莅临和预期的美国地位的澄清”^③。12月18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飞抵重庆,继续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同日,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欢迎杜鲁门总统的声明》。社论指出:“美国总统杜鲁门认为:一、中国的内战必须迅速设法停止;二、用政治协商的办法实现中国的团结、和平、民主;三、只有在这个基础上,美国才准备以信用贷款及其他方法协助中国。我们欢迎美国总统的这一声明,相信美总统的这一声明,将对中国时局和远东时局发生良好的影响。”

从12月20日起,马歇尔开始了为期10个月的国共调停活动。对于马歇尔调停,中国共产党给予了积极配合,同时又坚持原则,争

①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628页。

② [美]哈里·杜鲁门著,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77页。

③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174页。

取马歇尔在国共之间采取较为公正的立场。12月23日,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代表中共中央在重庆同马歇尔谈判中明确表示,为了促进国共两党间问题的解决,中国共产党方面希望看到盟国关心中国的内争,但要求盟国恪守“不干涉中国内政”的诺言,中国共产党愿意在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的基础上考虑问题。只要美国能够履行自己的诺言,中国共产党是愿意与美国合作的。中国共产党希望一个实现了和平与民主的中国不仅可以与美国建立友好的睦邻关系,而且可以成为美苏之间的桥梁,缓和它们在亚洲的冲突,从而有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合作^①。周恩来向马歇尔所阐明的观点体现了中共中央关于中立美国的策略思想。在马歇尔的斡旋下,国共达成了停战协定、政协协议和整军方案。对于马歇尔在调停初期采取的较为公正的立场和发挥的积极作用,中国共产党给予了高度评价。1946年2月9日,毛泽东向美联社记者发表谈话,称赞“马歇尔特使促成中国停止内战,推进团结、和平与民主,其功殊不可没”^②。1月31日,周恩来在会见马歇尔时也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注意到了马歇尔在处理停战问题上的公正和合理的态度,如果美国能在处理中国问题上持完全公正的态度,中国共产党准备在这种前提下与美国进行局部性和全国性的合作。”由于马歇尔的调停取得积极成果,中共中央曾对国内和平抱有很大希望,认为“从此中国即走上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③3月

① 章文晋:《周恩来与马歇尔使华》,载《周恩来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262页。

②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③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5页。

4日,毛泽东在延安会见马歇尔、张治中时甚至乐观地表示,政府改组后中共中央将搬到南京去,他个人怕热,不会住在南京,希望常住在淮安,开会时就到南京^①。

但是,中国共产党的良好愿望并没有能够实现。在马歇尔调停的后期,当蒋介石破坏停战协定、践踏政协协议,积极部署和挑动内战时,美国开始推行助蒋内战为主、促蒋和谈为次的双重政策。对此,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高度清醒的头脑,用革命的两手反对美国的双重政策,一方面坚决、彻底地揭露美国政策双重性的实质,谴责美国政府是在借调停作掩护,行援蒋内战之实;另一方面又希望马歇尔能站在公正立场上继续进行调处。这实质上是采用中立美国的策略,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为了中立美国,中共中央采取了两项具体措施:一是利用美苏矛盾,给马歇尔施加压力。中共中央本来就对美国单方参与调停国共冲突能否持公正立场表示怀疑,曾主张最好英国和苏联都参加,以免调停方案为美国所操纵。中共中央在一封电报中指出,“中国从来就是依靠几个国家互相牵制来保持独立,所谓以夷制夷政策,如中国只被一个强国把持,则早已灭亡”,因此,如“能作到英苏参加更好,如作不到只好让马单独参加”^②。中共中央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以苏联参与调停来牵制美国。因此,中国共产党代表在停战谈判期间多次邀请苏联出面,参与讨论东北和热河等有争议的问题。同时,中国共产党代表还向马歇尔提出,国共谈判中凡涉及中苏条约有关的问题,均应邀请苏联代表参加共同解决。但是,苏联奉行不介入国共谈判的方针,始终不肯出面。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提出邀请苏联参与调停本身,对马歇尔就是一种无形的

① 参见张治中:《我与共产党》,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第87页。

② 《中共中央给重庆代表团的电报》,1946年1月2日、3日。

压力,迫使他在调处中不能不考虑自己的立场。二是利用美蒋矛盾,争取马歇尔在调处中采取中立立场。6月17日,中共中央在致林彪、彭真的电报中指出:“在停战问题上国、美有矛盾,望注意利用。”^①在国共谈判中,中国共产党代表充分利用美国的调停政策与蒋介石的内战政策之间的分歧,一方面同蒋介石的内战政策进行坚决的斗争,捍卫自己的权益;另一方面又作出必要的让步和妥协。中国共产党利用矛盾的灵活策略,使马歇尔在调处中基本上没有采取公然偏袒国民党的行动。但是,由于蒋介石顽固坚持内战政策,而美国在对华政策上除了援蒋又别无选择的余地,这就注定了马歇尔的调处只能是无功而返。

中立美国策略的提出,是对中国共产党七大以来确立的防美政策的补充和发展,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战后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革命运动的关系的基本认识。这一策略的实施,对于促使美国在政治解决国共冲突中采取较为公正的立场起了一定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共产党所处的不利地位和面临的困难,争取到了短暂的和平时期,为对付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进攻做好了准备。虽然这一策略要达到的目的并没有完全实现,但在当时对中国共产党不利的特定条件下,作为一项外交策略仍不失为一个较好的选择。

^①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91页。

第四章

联苏反美: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确立

一、中国共产党联苏防美政策的终结

战后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制定和实施联苏防美政策时,考虑最多的主要有三个问题:一是战后美苏关系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二是苏联是否会采取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对华政策,三是美国是否会武装干涉中国内政。由于美国和苏联是与中国关系最为密切、影响最大的两个国家,因此,无论是美苏关系,还是美苏对华政策,都将直接影响中国共产党外交政策的选择范围。中国共产党对这三个问题的基本看法是:战后美苏两国的团结将继续下去,虽然两国在中国问题上存在着矛盾和斗争,但总的策略方针是以妥协为主,以斗争为辅,两国都不愿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也不愿中国发生内战;中国为美国所必争,美国将竭力保持它对中国的重要影响;苏联作为制约美国的一支重要力量,因受中苏条约的限制,不可能给中国共产党以更多的支持。正是根据这一基本认识,中国共产党战后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争取美苏赞助中国战后的国内和平,以避免内战。具体来讲,中国共产党对美国采取了既坚决反对其干涉中国内政的活动,又尽量避免其直接卷入中国内争,以争取其暂时中立的政策;对苏联则采取了体谅其外交处境,表面隔离、暗中联合的政策。但是,从1946年4月开

始，中国共产党对美苏关系、国共关系的认识又发生了变化。

从1946年3月起，国内外形势骤变。3月5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陪同下，在富尔顿斯敏斯特学院发表反苏反共演说，宣称：“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到亚德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条线的后面，坐落着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都城。——其居民无一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在远离俄国边界、遍布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里，共产党第五纵队已经建立。它绝对服从来自共产主义中心的指令。”他号召“所有讲英语的民族结成兄弟联盟”对抗共产主义。3月13日，斯大林对苏联《真理报》发表谈话，谴责丘吉尔的方针是进行战争的方针，是号召同苏联进行战争。这是美苏两国从战时合作走向战后冷战的转折点。虽然美苏冷战的焦点在欧洲，但在远东，在中国也时有表现。美苏冷战开始后，苏联决定从中国东北迅速撤军，并表示支持中国共产党在东北“放手大打”；而美国在调停国共冲突的同时，不断帮助国民党军队向东北运兵。美苏冷战直接导致了国共关系的急剧恶化。就在马歇尔于3月11日回国述职后，国民党公然撕毁了政协协议和东北停战协定，在东北发动了对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大举进攻，双方打得难解难分。正是在这一形势下，中共中央对内改变了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估计，对外改变了对美苏关系的看法。

4月间，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为了澄清国内外舆论关于“美苏必战”的错误认识，毛泽东撰写了《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一文。这篇文章短小精悍，内容博大精深，论述深刻透彻。它明确回答了当时人们最为关心的两个问题：美苏之间会不会爆发战争，中国共产党要不要同国民党进行坚决的斗争。对此，毛泽东提出了三点看法：第一，“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

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第二,“美、英、法同苏联的关系,不是或者妥协或者破裂的问题,而是或者较早妥协或者较迟妥协的问题”。但是,这种妥协是有限的,“不是说在一切国际问题上”,“是说在若干问题上,包括在某些重大问题上”。第三,“美、英、法同苏联之间的这种妥协,只能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向美、英、法反动力量作了坚决的和有效的斗争的结果”,但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①。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它不仅解决了如何认识战后美苏关系问题,而且解决了美苏关系与中国革命前途之间的关系问题。它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摆脱了以往美苏关系决定国共斗争这种观念的束缚,开始考虑冲破战后美苏妥协格局和苏联外交战略的约束,制定符合中国革命发展实际的战略和策略。毛泽东的这篇文章虽然当时并没有发表,只在部分高级干部中传阅,但它所阐述的重要思想,预示着在战后世界历史和中国革命发展的重大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正在酝酿新的转变。

东北局势恶化后,中国共产党为制止内战、挽救和平做出了巨大努力。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在军事上坚决顶住了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进攻;另一方面在外交上继续采取中立美国的政策。4月18日,马歇尔返回中国后继续调处国共矛盾。尽管中国共产党对美国帮助国民党军队向东北运兵深表不满,但仍希望马歇尔能打破僵局,压国民党军队停战,通过政治手段解决问题。因此,当周恩来为了阻止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军事进攻,准备向国民党和美国同时施加压力时,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指出:“不要准备对国美两方同时弄僵。”为了反对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4—1185页。

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方针,力争和平民主,中国共产党不怕与国民党弄僵,但对美国,则除非它恢复赫尔利政策,公开全面地赞助国民党实行内战与独裁,我们不应和他弄僵。电报还要求周恩来与马歇尔之间“仍应尽可能保持友好关系,使国民党无隙可乘”^①。中共中央认为,马歇尔虽然是助蒋的,但主张早日停战,维持和平,又与蒋介石存在着矛盾。因此,中国共产党有可能利用马歇尔对蒋介石施压来抑制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并避免美国对华政策转向公开支蒋内战。5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指出:“国民党除在东北大打外,积极准备全国内战,但因美国政策除一般扶蒋及助蒋在东北作战外,对全国内战尚不赞成,蒋对我军实力、国际舆论及国内人心有所顾虑,故尚不敢立即发动全国内战。”指示要求“改善与美人的关系,无论美如何偏蒋,我除据理力争,只要美不恢复赫尔利政策,策动全国内战,我应尽可能争取美人”^②。

然而,美国政府和马歇尔的所作所为,愈来愈使中国共产党感到失望。根据美国政府制定的战后对华政策,其基本点在于维持国民党的统治。因此,马歇尔调处国共冲突的底牌是:如果中国共产党拒绝合作,美国就全力支持国民党蒋介石,以控制中国;如果蒋介石国民党拒绝合作,美国“仍然必须继续支持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只不过是“在已宣布的美国政策的条款范围内”进行支持^③。这就是说,无论国共谈判的结果如何,无论国民党在谈判中的表现怎样,美国都将坚定不移地支持国民党蒋介石,只不过在如何支持和支持的程度上会有所变化。根据这一底牌,在马歇尔调处国共冲突的过程中,美国对蒋介石的援助从未中断过。具体表现在:一是到1946年5月中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36页。

② 《中央关于时局与对策的指示》,1946年5月15日。

③ 《美国外交文件》,1943年第7卷,第770页。

国战区撤销时,美国海军陆战队仍有数万人留驻华北,帮助国民党军队守卫着交通要道和要害部门。二是1946年3月,美国政府正式决定派遣军事顾问团,帮助训练国民党军队。三是至1946年6月,美国先后帮助国民党军队运送了9个军去东北扩大内战。四是延长租借援助,转让剩余物资。到1946年6月底,美国战后对华租借物资援助达到8.7亿美元。8月底,美国又向国民党政府转让了价值约9亿美元的战时剩余物资。美国政府的种种援助,至少产生了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它助长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嚣张气焰,使蒋介石摸清了美国政府的底牌,从而也使马歇尔不再拥有迫使蒋介石让步的力量。对此,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尖锐地指出:“狡猾的蒋介石看出美国有两个政策,一个是援蒋内战,这是基本的,一个是劝蒋停战,这是陪衬的或装饰的,因此他毫不踌躇地接受了美国的大炮而轰走了美国的鸽子。”^①另一方面,它使中国共产党逐渐失去了对马歇尔调停的信任,也使马歇尔失去了调停人的资格,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矛盾日益尖锐。如果说,在1946年3月以前,马歇尔尚能站在比较公正的立场上进行调停,那么在此之后,随着美苏关系的恶化和蒋介石态度的日趋强硬,马歇尔在调处中越来越偏袒国民党。每当蒋介石坚持无理要求时,马歇尔总是先进行批评,继而将对蒋让步,进而要求中国共产党作出妥协或对中国共产党横加指责,加之美国对蒋的援助源源不断,这不能不使中国共产党感到,这是美蒋在合谋玩弄假和平、真内战的骗局。马歇尔自然就失去了中国共产党方面的信任,其调停只能是以失败而告终。马歇尔调处的失败,宣告了美国既支持蒋介石又避免国共内战的发生、既插手中国内部事务又避免

① 《七个月的总结——评马歇尔、司徒雷登联合声明》,《解放日报》,1946年8月14日。

直接卷入内战政策的破产。

6月以后，中国共产党对美关系开始发生变化，态度日趋强硬，批评日渐增多。6月14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向参议院提交了《军事援华法案》。6月22日，毛泽东发表《反对美国对蒋军事援助法案的声明》，向美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国立即停止与收回一切对华军事援助，立即撤退在华美军。它指出，美国对蒋介石的军事援助“实际上只是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只是以强力支持国民党独裁政府继续陷中国于内战、分裂、混乱、恐怖和贫困，只是使中国不能实现整军复员和履行其对于联合国的义务，只是危害中国国家独立与领土主权完整，只是破坏中美两大民族的光荣友谊与中美贸易的发展前途”。因此，“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坚决反对美国政府继续以出售、租借、赠送或让渡等方式将军火交给中国的国民党独裁政府，坚决反对美国派遣军事使团来华，并坚决要求美国立即停止与收回对华的一切所谓军事援助，和立即撤回在华的美国军队”^①。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的身份发表公开谴责美国的声明，这在战后还是第一次，也是非同寻常的。这是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转向反美的信号。正如后来马歇尔所说：“这是我在华期间毛泽东发表的两项正式公开声明之一，而更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共产党发言人常常发表政策声明，毛本人却难得公开发表声明。”^②6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动员群众要求美国改变政策的指示》，要求发动群众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展开斗争。7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称美国为帝国主义，并将美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联系在一起。同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声明，严厉谴责美国政府的军事援蒋。7月7日，中

① 《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124页。

② 《马歇尔使华——美国特使马歇尔出使中国报告书》，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64页。

共中央为纪念“七七”事变九周年发表宣言,公开揭露“美国反动派……在中国反动派的合作下,企图代替日本的地位,变中国为美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地”^①。8月10日,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实际上承认调停已经失败。8月12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指出:今后“将有一个相当长时期是大打大闹时期,而主要靠打得好,消灭蒋力量来解决问题”。在谈判中对马歇尔仍可持某些保留态度,但对美国对华政策要彻底清算和批评^②。9月29日,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蒂尔的谈话中指出:“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在借所谓调解作掩护,以便从各方面加强蒋介石,并经过蒋介石的屠杀政策,压迫中国民主力量,使中国在实际上变为美国的殖民地。这一政策继续实行下去,必将激起全中国一切爱国人民起来作坚决的反抗。”^③11月1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一个文件中首次将美蒋视为“两个结合一体的敌人”,“我们在现阶段的基本政策,是对付美蒋两个结合一体的敌人,即是又反美国帝国主义又反蒋介石封建买办集团”^④。至此,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调停已不抱任何幻想,对美政策也由中立美国转向公开对抗,此后中国共产党与马歇尔的谈判只是为了配合军事自卫斗争,在政治上揭露美蒋的反动面目,以教育群众。

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的转变,表明中国共产党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本质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正如《解放日报》9月12日社论所指出:“中国人民,对于美国政府,并不希望它帮助中国人民,只希望它执行罗斯福的政策,即是说,希望它执行一个中间政策,不干涉中国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39页。

② 《中央关于马歇尔、司徒雷登发表公报后我党对策问题给周恩来的指示》,1946年8月12日。《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68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02页。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33页。

内政的政策，赞助中国实行一个从工农到蒋介石都有代表权的联合政府。”“中国人民抱着这种希望，一年之久，试验了两次，第一次是赫尔利魏德迈时期，第二次是马歇尔时期。经过了这两次试验，现在对于美国政府政策的帝国主义性质，是没有怀疑了。”“我们必须彻底抛弃对于美国政府的任何幻想。”^①毛泽东在一次党内会议上也提出，前一段工作中，我们也犯了一个错误，我们同蒋介石斗争多年，有丰富的经验，他的任何阴谋诡计都欺骗不了我们。但是我们同美帝国主义打交道，这是第一次，没有经验，上当了。有了这次经验教训，我们以后再也不会上当吃亏了。

全面内战爆发后，随着美国采取公开助蒋内战政策，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关系的彻底破裂已成为必然。但是，当时在党内还存在着对美蒋力量估计过高，因而不敢同美蒋反动派做坚决斗争的错误思想；在国际上，主要是苏联，也存在着对美国力量估计过高，对中国共产党力量估计不足，害怕国共内战引起新的世界大战，因而不敢公开支持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问题。为了澄清国内外种种错误思想和模糊认识，为中国共产党外交政策的转变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毛泽东先后发表了一系列谈话和文章，系统地提出了“中间地带”理论。1946年8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首次提出了“中间地带”的思想，但这一谈话内容直到1947年4月才发表。而1947年1月2日由陆定一署名发表的《对战后国际形势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解释》（该文在毛泽东指导下撰写并经毛泽东修改），最早披露了“中间地带”理论。其主要内容是：（1）战后世界的中心不是美苏必战，而是美国力图控制和侵略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中

^① 《解放日报》，1946年9月1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688页。

间地带”国家。这是因为在“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①。(2)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是广大中间地带人民与美国反动派之间的矛盾，是美国反动派同美国人民之间的矛盾，以及美国帝国主义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矛盾。这些矛盾不解决，美国便无法发动反苏战争。(3)为了反对美国的侵略和扩张，一切处于“中间地带”的国家和人民必须联合起来组成世界范围的统一战线，而这个统一战线无疑会得到苏联的同情和支持。

从中国革命与美苏关系的角度来看，“中间地带”理论的提出具有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是它对国际政治力量作了新的划分，阐明了中国革命在国际斗争格局中所处的地位和面对的敌友关系。二是它揭示了中国革命与苏联在国际范围内所进行的斗争之间的相互联系。正是从这个角度上可以说，“中间地带”理论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对美苏政策由联苏防美转向联苏反美的重要标志。也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彻底冲破了战后世界妥协格局的束缚，走上了独立自主、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正确道路。

二、中国共产党对美苏调整对华政策的回应

(一)美国对华政策的有限度调整

全面内战爆发后，美国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全力援助蒋介石，寄希望于蒋介石能在短期内能一举“剿灭”共产党，使中国走向统一并成为美国的附庸国。然而，美国的巨大努力和付出不但没有得到相应回报，反而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变得越来越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3页。

渺茫。1947年6月底,以刘邓大军挺进中原为标志,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这是一个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伟大事件,正如毛泽东指出的:“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①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正式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和纲领。此后,中国革命便发展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抗战后期,美国在确立和实施扶蒋反共政策时,一是寄希望于蒋介石能统一全中国并接受美国的影响与控制,二是担心中国共产党会在苏联支持下打败蒋介石并接受苏联的影响与控制。从美苏争霸全球的战略考虑,美国扶蒋反共顺理成章,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然而,历史的发展表明,蒋介石没有美国所想像的那样强大反而不堪一击,苏联也没有美国所想像的那样全力支持中共反而对中国共产党存在着种种疑虑。此时的美国对华政策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早在1946年7月,马歇尔在调处国共两党关系失败后曾表示,如果国共谈判破裂,他要建议用两三个月时间来重新审查美国的对华政策。1947年1月,马歇尔任美国国务卿后,便立即吩咐其下属对美国对华政策进行重新研究。2月7日,美国远东司司长范宣德拟就了备忘录。但是,美国国务院官员与美国军方之间,在是否应当鼓励国共两党实行合作、对国民党的援助是否应有先决条件、是否应当向国民党政府提供大规模的军事援助等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美国国务院官员认为,国共两党实行联合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国民党的根本问题在于腐败无能,美国的经济援助应以国民党政府实行政治和军事改革为前提,并反对向国民党政府提供大规模的军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4页。

事援助。而美国军方则认为,鼓励国共联合将导致中国共产党控制政府,并危及美国的军事安全,主张对国民党政府提供大规模的军事援助,且不附加任何条件。为了对中国的形势进行调查,为美国下一步可能采取的政策提供依据,1947年7月9日,杜鲁门采纳马歇尔的提议,任命陆军部计划作战司司长魏德迈为特使访问中国。杜鲁门在给魏德迈的指令中规定了他的访华使命:“就中国现在及未来的政治、经济、心理和军事的情况,作一个估量”;要向中国政府领袖表明,“只有中国政府能够提出令人满意的证据,证明其能采取有效措施以趋向中国元气的恢复,美国政府才能考虑援助复兴的计划”;“任何可能提供的援助,必须在有美国政府的代表监督的情况下,予以利用”^①。魏德迈使团在国统区调查了一个月,全面了解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况。9月19日,魏德迈向杜鲁门提交了一份长达10余万字的秘密报告。其主要内容是:(1)如果局势继续恶化,很可能出现一个共产党统治的中国,这对美国的利益是有害的;(2)国民党政府最迫切需要的是政府改组、政治经济的改革和外援,而一个援助计划的有效执行,可以支持对共产主义的抵抗;(3)国民党政府获得美援的交换条件是“满洲”由五强共管或联合国托管,国民党政府对美援的使用由美国顾问监督执行。对于这样一个企图把中国完全置于美国控制之下的报告,杜鲁门和马歇尔害怕遭到中国人民和苏联的强烈反对,一直未敢公之于世。

魏德迈来华调查后,美国政府明知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前景暗淡,但从“遏制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扩张”的政治目标出发,仍然决定为国民党提供援助。1948年2月,杜鲁门向国会提出了拨款5.7亿美元的经济援蒋方案。4月2日,美国国会通过了1948年《援华

^① 《美国外交文件》,1947年第7卷,第640页。

法》，答应今后一年内向国民党政府提供 4.63 亿美元的援助（后减为 4 亿美元），其中 3.38 亿美元（后减为 2.75 亿美元）为经济援助，1.25 亿美元为军事援助，美国把自己绑在国民党的战车上，一步步陷入中国内战的泥潭中不能自拔。

然而，美国的巨额军援未能挽救国民党失败的命运，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人民解放军的摧枯拉朽的强大攻势面前，不堪一击，迅速土崩瓦解。从 1948 年 9 月起，中国人民解放军连续发起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军队主力基本上被歼灭，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灭亡已成定局，同时也宣告了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彻底失败。至此，美国决策者才终于意识到：“中国的国民党政府正在退出历史舞台，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救不了它了。”因此有必要放弃援蒋内战这种出力不讨好的政策，使美国逐步从中国“脱身”，“和国民党这艘沉船拉开距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开始重新审视和调整原来的对华政策。

1948 年 9 月 8 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司起草了一份题为《重审并制定美国对华政策》的文件。该文件的基本观点是：（1）中国革命和中国目前事态发展的根源在于中国内部巨大的和根深蒂固的力量，国民党政府的失败是必然的，并非美国的力量所控制的。为蒋介石承担义务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不是最好的外交，它使美国没有别的选择余地，美国必须避免不可挽回地死走一条路线，或死抱住中国的一个派系。（2）根据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实力，没有理由认为苏联会对中国的潜在实力抱有幻想。中国在未来可能发生的任何战争中，最好不过是一个较弱的盟国，最糟也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敌人。（3）即使是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只要不变成苏联的政治、军事“附庸”，就不会对美国构成潜在威胁，而且随着中国共产党与苏联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矛盾的发展，美国也有机会可以利用。基于以上

考虑,文件得出的结论为,美国对华政策不应再采取全力扶持蒋介石这样一条代价巨大、没有尽头和十分冒险的行动路线,也不应再全力阻止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取胜,而应是:一是继续承认现在的国民政府;二是在可预料的国民党政府灭亡后,视当时情况决定承认谁的问题;三是“尽可能阻止中国成为苏联的政治、军事附庸”^①。这一文件是美国高层最早检讨扶蒋反共政策的不现实性并考虑调整的重要文件。尽管该文件在对华形势的分析和调整对华政策上颇有见地,但它建立在不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中国取得胜利和中共与苏联之间存在可供利用的矛盾的错误认识基础上,因而决定了美国对华政策不可能从根本上调整到完全符合中国现实的正确方面来。然而,就是这样一份带有明显缺陷的文件提出后,也未能引起重视和立即付诸实施,美国对华政策仍旧处于观望犹豫之中,一直到1949年2月初才得到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批准。1949年2月2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根据该文件精神 and 总统意见,明确提出此时美国政府应采取的对华政策是:(1)不再援助其他反共力量,除非它能证明即使没有外援也能有效地抗击共产党;(2)与中国各种成分保持最广泛的联系;(3)不断加强文化宣传工作,宣传美国对华的“传统政策”;(4)在谨慎避免干涉内政的条件下,尽量利用中苏之间的政治、经济磨擦^②。

根据新的对华政策,美国将不再援助反共力量,并停止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而是尽量利用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矛盾,以待时机,卷土重来。据此,美国在政治上开始抛弃蒋介石,支持李宗仁上台,取蒋而代之;在经济上拒绝向蒋介石提供新的援助;在军事

① 《美国外交文件》,1948年第7卷,第146—155页。

② 《美国外交文件》,1949年第8卷,第492—494页。

上撤回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并停止训练国民党军队。但是美国对华政策调整仅此而已,是十分不彻底的,美国并未完全停止对国民党军队的军事援助,并一再延长1948年《援华法》中关于经济和军事援助拨款的使用期限,在政治上美国还积极策划“南北分治”或“隔江而治”方案,以支持蒋介石政权苟延残喘。

美国政府不仅在扶持蒋介石的政策上的调整是有一定限度的,而且在反共政策方面的调整更是缺乏实际行动。从1948年起,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一方面是敌视,极力阻止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取胜是其既定方针;另一方面又心存侥幸心理,举棋不定。1949年2月,美国新任国务卿艾奇逊用“等待尘埃落定”一句话来概括美国的对华政策。他后来解释,当时美国对中国最为关心的是两件事:一是无论是谁统治中国,即使是魔鬼也没有关系,只要它是独立于苏联之外的;二是如果有可能,最好不是共产党掌权,因为它总是围着苏联转。如果是共产党掌权,可以采用两种办法:或者直接出兵打它,或者尽力将它与莫斯科分开,前者不可行,而应致力于后者,因为共产党不可避免地要与莫斯科发生冲突。艾奇逊的意思是,美国首先要尽一切努力来阻止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取得胜利,如果中共胜利了,则要尽一切力量来挑拨中共与苏联之间的矛盾,使中共政权垮台或倒向美国一边。1949年6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致美国国务卿的电报中则用“等着瞧”三个字来描绘美国的对华政策。司徒雷登声称,美国对即将成立的中共政权主要关注两个问题:第一,它是真正维护联合国宣言所规定的人权,还是采取极权主义或警察国家的通常做法。第二,它是否根据马列主义理论,赞成用暴力进行世界革命。司徒雷登想以中共放弃马克思主义立场并遵循美国的人权观为条件才与中共政权保持友好关系,而这是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接受的。事实上,无论是“等待尘埃落定”还是“等着瞧”,都说明美国一

直不愿抛弃对国民党的幻想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敌视,在对华政策的调整上只有弃蒋的设想而没有实际行动,有放弃反共的想法却竭力阻止中共取胜,最后面对急剧变化的中国形势,美国对华政策绕了一个圈子又重新回到扶蒋反共的轨道上来。1949年8月,美国政府发表的《美中关系的白皮书》向全世界公开表明,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质是扶蒋反共。

(二) 苏联对华政策的微妙变化

苏联的战后对华政策是建立在美苏妥协的基础之上的。苏联与美国之所以在中国问题上达成妥协,除了考虑其外交战略的重点在欧洲外,关键因素之一是苏联领导人过高估计国民党的力量和美国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过低估计中共的力量,对中国共产党能否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缺乏信心。正如斯大林所解释的那样:“当时我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会取胜。我那时认为美国人将全力扑灭中国的起义。”^①当内战已经打起来之后,斯大林仍然半信半疑。因此,苏联对国共两党采取的是脚踏两只船的两面政策,即既支持国民党统一中国,又有限度地支持中国共产党。然而,就在中国革命出现历史性转折,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取得胜利已经明朗化的条件下,苏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中国共产党能否解放全中国持保留态度,其对华政策的主导方向仍是谋求美苏妥协进而实现国共妥协,只是在具体政策上有些细微变化。

面对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取得的决定性胜利,苏联对华政策开始发生变化,主要表现在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心增强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早在1948年上半年,斯大林在同南斯拉

^① 爱德华·卡德尔著,李代军等译:《卡德尔回忆录(1944—1957)》,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130页。

夫领导人卡德尔等谈话中就曾承认,过去两年苏联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看法错了。斯大林说:“在战后,我们曾邀请中国同志来莫斯科讨论中国的形势。那时我们坦率告诉他们,我们认为在中国发动起义是没有前途的,中国同志应同蒋介石寻求一种暂时的协议,他们应加入蒋介石的政府,并解散他们的军队。但是,他们集合了力量,组织了军队,并且像我们现在见到的,他们正在打败蒋介石的军队。——现在我们承认我们错了,事实证明,正确的是中国同志,而不是我们。”^①斯大林主动承认错误表明,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终于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能够战胜国民党的强大力量,夺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在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进一步认识的基础上,苏联加强了同中国共产党的联系,增加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特别是东北地区的经济援助。1948年5、6月份,斯大林指示组织了以科瓦廖夫为组长的技术专家组前往中国,帮助中国共产党解决经济问题和修复铁路等技术问题^②。尽管如此,苏联在战后确立的对华基本政策并没有根本改变,仍然是维持在美苏妥协的基础上,在中国谋求国共两党的妥协。

对于苏美妥协,斯大林在1948年和1949年上半年仍几次强调这种妥协的必要性和可能性。1948年5月,斯大林在对美国前副总统华莱士的公开信所作的答复中,公开表示赞同华莱士信中所提的美苏妥协与合作的方案。1949年1月,斯大林在回答美国国际新闻社欧洲分社社长金斯伯利·史密斯的问题时,表示愿同美国一起发表共同合作的联合宣言,并表示愿就双方合作问题与美国总统杜鲁

① (南)弗拉吉米尔·杰吉耶尔著,叶周等译:《铁托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3年版,第118页。

② 《斯大林同毛泽东的对话》,参见《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2期。

门进行会晤和磋商。

对于国共妥协,在1947年年底之前,苏联曾反对参加国共关系的调解。当时,斯大林的理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可能不会接受苏联的调解,因为苏联已从延安召回了它的代表,“和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多少接触了”。他说,他的印象是,“中国共产党人是不会赞成苏联政府对中国问题的立场的”。所以,他认为,如果苏联打算调解并失败了,苏联政府就会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①。但是,从1947年年底以后,就在中国共产党从劣势转向优势,国共力量对比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时候,苏联却一反常态,对参加调解国共两党关系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空前的积极性。从1947年12月到1949年1月一年多时间内,苏联曾先后三次同意调解国共两党关系。第一次是1947年12月19日,苏联在华官员在宴请国民党政府官员时表示,中国共产党问题不能用军事解决,而应当由苏联出面调停,达成政治解决^②。在此前后,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罗申也向国民党官员张治中和邵力子等表示:苏联希望中国内战早日结束,并在蒋委员长的领导下恢复和平;假如中国政府邀请苏联出面调停国共内战,苏联愿在这方面协助,并保证中国共产党人也会停止战斗^③。不久,国民党政府就致信苏联政府,请求苏联居中调解国共冲突。苏联政府接信后将信转给中共中央,只说供你们参考,未作任何其他说明^④。然而苏联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实际上是愿意调解国共冲突,只是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想让中国共产党主动提出同意苏联调解。这件事

① [美]哈里曼、艾贝尔著,南京大学历史系对外关系史研究室译:《特使——与丘吉尔、斯大林周旋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391—392页。

② 《美国外交文件》,1947年第7卷,第411页。

③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309—310页。

④ 《在历史巨人身边——邵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67—368页。

后来由于中国共产党未予答复而不了了之。第二次是1949年1月8日,当国民党军队在三大战役中遭受重创后,蒋介石为争取喘息时间,又开始玩弄新的“和谈”阴谋,国民党政府向苏、美、英、法四国政府分别发去了要求调停内战的备忘录。斯大林当即把备忘录及草拟的复文转给毛泽东,征询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复文称:“苏联政府向来主张中国国内停战,并且建立和平,但是在未表明是否同意调解之前,苏联政府希望知道,对方,即中国共产党是否同意苏联承当调停。”他建议中共中央作出这样的答复:中国共产党一贯赞成和平,但主张与国民党直接谈判,不接受任何外国的调停,特别是不能接受实际介入中国内战国家的调停^①。这个复文的用意非常明显,名为征求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实则表示苏联同意参加调停,但反对美国介入。但是,这一次毛泽东通过修改斯大林给国民党政府的复电的方式婉言拒绝了苏联的调停愿望。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复函中说:“我们认为苏联政府对南京政府要求调停中国内战照会应作如下答复:即苏联政府历来是,现在仍然愿意看见一个和平的、民主的和统一的中国,但是用何种方法达到中国的和平、民主与统一,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苏联政府根据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未便参加中国内战双方之间的调和的工作。”毛泽东还告诉斯大林,中共中央倾向于要国民党政府无条件投降,并揭露其阴谋,不必再用迂回战术,推迟胜利的时间。第三次是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上台后,国共两党的最后一次和谈开始。李宗仁为了达到与中国共产党“两分天下”、“划江而治”的目的,便派人 with 苏联驻华使馆联系,希望苏联出面斡旋。苏联方面表示,只要国民党政府能在将来的任何国

^① 《1949年1月10日斯大林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党的文献》1989年第1期,第57—58页。

际冲突中严守中立,并在最大可能的范围内消除或削弱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建立中国与俄国间真正合作的基础,苏联就愿意进行调停^①。苏联政府非常清楚在这个时候参加调停显然意味着赞同李宗仁政府设计的同中国共产党“划江而治”的方案,而这一方案是中国共产党所坚决反对的。因此,苏联没有再征求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尽管如此,苏联仍采取了一系列对国民党政府表示友好的行动,如苏联驻华使馆随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离任升迁为李宗仁政府外交部部长时受到苏联政府的破格礼遇等。与此同时,苏联还试图对中国共产党施加影响,不赞成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担心会引起美国的军事干涉,中国会出现“南北朝”的局面^②。

苏联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同意调解国共关系,其深层原因是它在中国有特殊的民族权益,希望通过这种调停来阻止美国对中国的全面干涉,确保苏联在中国已经获得的民族权益,并排除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另一个原因涉及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和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结下的历史宿怨并没有因为中国共产党取得决定性胜利而冰释,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态度也没有因此而根本改变。相反,这种不信任感还有所加强。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使苏联对中国共产党与美蒋对抗的强大力量有所认识;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却使苏联感觉到,中国共产党脱离苏联的影响和控制的独立自主地位进一步得到加强。特别是在1948年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破裂,南斯拉夫共产党脱离苏联控制,公开走上与苏联对立的独立自主道路后,苏联害怕中国共产党会走南斯拉夫的道路,那样,苏联的在华权益及影响也将失去。第三个

①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335页。

② 刘晓:《出使苏联八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5页。

原因是苏联害怕自己对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会成为美国全面干涉中国内政的借口。由于害怕美国干涉,所以苏联在加强同中国共产党的联系和提供援助时,又尽可能限制这种联系和援助所可能产生的影响。如在1948年5月和1949年4月,当毛泽东先后两次提议并准备亲自赴莫斯科向斯大林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以争取苏联的支持时,斯大林都以中国革命的迅猛发展离不开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为由,婉转拒绝了毛泽东的请求。1949年1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到西柏坡中共中央所在地,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会谈时也是高度保密,生怕暴露自己。1949年4月中国共产党军队攻下南京后,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是唯一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的大使。6月底,当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公开宣布“一边倒”政策以后,苏联仍继续与国民党政府频繁交涉,努力争取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中苏贸易与经济合作之协定》。

因此,美国的直接干涉和国民党对中国的全面控制,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全面胜利并走南斯拉夫道路,都是苏联不希望出现并采取措施极力避免的。唯一的办法是在中国维持现状,即维持国共两党谁也不消灭谁的局面。这样,苏联可以继续保持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美国也可以继续保持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影响。这也是苏联赞成李宗仁提出的“划江而治”方案,而且不止一次地阻止中国共产党军队打过长江去的动因所在。

但是,苏联的调停显然极其有利于国民党,而极大地不利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对此毛泽东后来深刻地指出:“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1950两年对我们的压力

很大。”^①

1949年8、9月份,是苏联对华政策转变的转折点。8月,中国共产党军队攻占兰州后,国民党政府决定终止同苏联关于新疆贸易与经济合作协定的谈判。9月27日,国民党政府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向联合国大会提出控诉苏联违反中苏条约案。至此,苏联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关系不能再维持下去了,脚踏两只船的对华政策也走到了尽头。恰在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这样,苏联率先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尔后与国民党政府断绝了外交关系。

(三) 中国共产党彻底革命的坚定立场

在中国革命迅速发展的紧要关头,美苏对华政策的一举一动都对中国革命造成了一定影响。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形成,美国从无条件援蒋反共到有条件有限度地援蒋,以及苏联对中国共产党认识的加深和援助的加强,都是有利于中国革命发展的。而美国迟迟不愿从中国“脱身”,苏联热衷于调停国共关系,又无形中给中国共产党增加了不少压力,给中国革命的发展带来了一些困难。但是,无论是压力还是困难都没有动摇中国共产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勇气,都无法阻挡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在中国的胜利。1948年7月18日,中共中央在一份党内指示中指出:“反动派所谓和平运动,只是战争失败时求得喘息机会以利再战的阴谋计划。国民党反动政府必须打倒,反动军队必须解除武装,人民民主政府必须在全国建立,美国侵略势力必须退出中国,中国对外必须实现完全的独立,中国才能有真正的和平。否则所谓和平必定是假的,只是过渡到更残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90页。

酷的內战的一种手段。”“如果我们不愿意被敌人消灭，就必须把战争打到底，必须不要上反动派的当。”^①12月30日，针对蒋介石求和文告，毛泽东发表了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公开宣布了中国共产党彻底革命的坚定立场。针对蒋介石的“和平”阴谋，文章指出：“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在用单纯的军事斗争方法无法阻止中国革命胜利的情况下，开始一天比一天地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毛泽东提醒全国人民，“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针对美国的对华政策，文章指出：“美国政府的政策，已经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的反革命战争转变为两种方式的斗争：第一种，组织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和所谓地方势力在长江以南和边远省份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第二种，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进，则应带上温和的色彩。”毛泽东告诫全国人民决不要怜惜“像蛇一样的恶人”，要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针对苏联的担心和“劝告”，文章指出：“只有彻底地消灭了中国反动派，驱逐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中国才能有独立，才能有民主，才能有和平。”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②。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向世界公开宣布自己在彻底革命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对于美国，当中共中央准备进行战略进攻时，就已经估计到了美

① 《中共中央关于揭露敌人的和平阴谋的指示》，1949年7月18日。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4—1379页。

国的反应,并且预见到美国几乎没有进行直接军事干涉的可能,而且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美国直接干涉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小。中共中央认为,美国对华政策正“摇摆不定”,而且已经发生了某些变化,人民解放军只要坚决和迅速地取得军事斗争的胜利,“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就将愈减少,并且连同财政及武器援助国民党这件事也就可能要减少”^①。为了预防美国可能进行的军事干涉,中共中央在政治上发表声明,不允许任何国家干预中国内政,不接受任何国家的调处,并将外交工作的重点放在反对外国干涉中国内政上^②。1949年3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对美国外交斗争策略的指示》,强调:在反美斗争中,既要克服恐惧美国的思想,又要防止盲目主义,要动员一切力量反对美国对蒋介石的援助,尽可能地阻碍和减少这种援助;要善于利用美蒋矛盾,动摇和推迟这种援助,以利于孤立敌人,各个击破。在军事上中共中央也做了相应准备,采取了集中主力,先东南沿海,后西南西北内地,大纵深迂回,抢占沿海地区和封闭主要海口的战略部署。在具体行动上,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十分谨慎的做法:军事不挑衅,尽量避免与美军发生冲突,对侨民不伤害等。

对于苏联,中共中央一方面高度评价了苏联对华政策在限制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方面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也估计到苏联迟早是要与美国妥协的,而且这种妥协会影响苏联的对华政策。1948年9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指出,苏联在国际斗争中可能与美国作某些妥协,但这绝不意味着各国人民都必须向反动派妥协。毛泽东再次向全党敲响警钟,提醒全党要正确认识美苏之间的妥协,正确处理中国革命与苏联对华政策之间的关系。如果处理不当,就

① 《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1949年1月8日。

② 《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1949年1月19日。

会导致中国革命半途而废。1949年1月,针对苏联主张国共停战和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明确表示不希望苏联介入国共谈判。2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与来访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米高扬进行了三天的会谈。在会谈中,毛泽东详细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主客观条件,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以此来打消苏联阻止中国共产党渡江和调停国共关系的幻想。毛泽东说,到目前为止,中国革命的发展较为迅速,可能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打过长江,向南推进,占领南京、上海等大城市,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共产党的。中国革命夺取最后胜利的条件已经成熟,从主观上说,我们的军队斗志坚强、士气旺盛,我们的政策、口号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得到人民的拥戴,是人心所向、民心所归;从客观上说,美国并不想直接卷入中国内战,只是间接干预,不会出兵干涉。毛泽东强调,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各个阶段执行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是正确的,尽管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还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我们充满信心,正稳步地朝既定目标前进,不达胜利,誓不罢休。这是我们党的决心和信心,也是全国人民的决心和信心,是绝对不可动摇的^①。3月25日,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到北平后,毛泽东在与负责中共和苏共联络任务的科瓦廖夫及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馆负责人的谈话中,再次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一定要渡江南下和解放江南地区的决心和取得革命最后胜利的信心。毛泽东还多次致电斯大林,向他介绍中国革命的情况,征询他对中国革命的建议,争取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理解和支持。与此同时,4月21日,当国民党李宗仁政府拒绝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后,中国共产党毫不迟疑

^①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75—385页。

地在军事上发动了渡江战役,解放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以实际行动抵制了苏联阻止中国共产党军队渡江的意图,粉碎了美国阻挠中国共产党解放全中国的企图。这是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对美苏政策的伟大胜利。南京解放后,毛泽东以诗言志,用“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诗句,再次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

三、中国共产党外交上“一边倒”的战略抉择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特别是随着人民解放军由战略进攻阶段转入战略决战阶段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基本上被消灭,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迅速土崩瓦解。在这一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建立一个什么性质的国家,党和国家的内外政策是什么,这些问题非常现实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当时,美国希望中国共产党与苏联保持一定距离,苏联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心存疑虑,国内一些人士主张走“第三条道路”,向美苏两面靠拢。要正确解决这一问题,既要考虑到中国社会各阶级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影响,也要考虑当时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国共产党需要在世界两大阵营之间作出选择,并处理好与它们的关系。

尽管苏联对中国共产党充满了不信任感,对中国共产党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表示怀疑,但中国共产党对苏联始终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和拥护的态度。1947年9月,以苏联为首的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并提出了战后世界已形成以美国为“主导力量”的帝国主义阵营和苏联起“领导作用”的反帝国主义阵营的“两大阵营”理论。对此,不仅中国共产党的报纸客观地报道了情报局成立的消息,而且毛泽东在党中央十二月会议上所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第一次公开表示赞同情报局关于“两个阵营”

的理论。虽然毛泽东所理解的“两个阵营”理论与情报局所提出的“两个阵营”理论在内涵上有所不同,但毛泽东不再提“中间地带”理论而赞同“两个阵营”理论,说明中国共产党是站在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一边的。正如德国学者海茵茨希所说:“各种迹象表明,1947年秋,中共开始把未来共产党中国的对外政策,战略性地定位于苏联方面。”^①1948年6月,苏联共产党与南斯拉夫共产党发生冲突并导致了两党关系的破裂。随后,欧洲各国共产党相继在内部开展了反对所谓“铁托分子”的斗争。苏南冲突的发生,也对中国共产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这一件事的发生使苏联领导人进一步增加了对中国共产党走独立自主道路的怀疑,同时又给中国共产党敲响了警钟,如果处理不好与苏共的关系,就会对中国革命造成一些负面影响。经过慎重考虑,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既不得罪苏联,同时根据中国自己情况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的外交策略。为此,中共中央采取了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来改善与苏联的关系和争取苏联的支持。1948年4、5月内,毛泽东在指挥人民解放战争的紧要时刻,主动提出访问苏联,当面向苏联领导人陈述中国共产党的内外政策,争取苏联能在筹建新中国问题上予以大力支持,并廓清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对毛泽东本人和中国共产党的种种误解。毛泽东曾对他的卫士长李银桥说:“我是想到苏联去,要求他能带个好头,承认我们的新政府。成立联合政府,不仅国内要做好准备工作,在国际上也要做好准备工作。美国是支持蒋介石的,不会支持我们。苏联可以支持我们,苏联带了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能这样做。中国革命不是孤立的,不能孤立,在国际上有人支持,才能更好地站稳脚,说话才能更有力

^① 海茵茨希著,张斌、李丹琳等译:《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07页。

量。”^①1948年7月,情报局会议开除南斯拉夫共产党后,中共中央立即表明了自己站在苏联一边的态度。7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决议,肯定情报局会议关于开除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决议是正确的,并对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进行了批评和谴责。11月1日,刘少奇又发表《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长篇论文,代表中国共产党从理论上系统批判了南斯拉夫共产党反苏、反马列主义的立场,阐述了联合苏联,联合世界各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联合一切被压迫民族,对于争取民族解放斗争胜利的重要意义。文章指出,世界各民族已经划分为两大阵营,在两大阵营紧张斗争时期,“或者联合苏联,或者联合帝国主义,二者必居其一”。中立是不可能的,被压迫民族要求得解放,必须站在苏联领导的民主阵营一边^②。同月,毛泽东在情报局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上发表文章,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在政治思想上的一致性,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坚决拥护以苏联为首的世界革命统一战线的鲜明态度。文章强调指出:“假如没有苏联共产党,没有苏联,没有苏联领导的西方和东方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统一战线,还能设想战胜法西斯德意日及其走狗们吗?”毛泽东号召战后一切国家的革命力量团结起来,组成以苏联为首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否则不能胜利^③。1949年1月,中共中央就外交工作发出指示,规定对待苏联和东欧各国驻华外交机构和人员,要采取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态度,在对外贸易上要首先和尽量与苏联和东欧国家开展贸易。1949年2月,毛泽东会见米高扬,在谈到未来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时,明确表示新中国将

① 李银桥:《走向神坛的毛泽东》,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06—107页。

② 刘少奇:《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单行本。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57—1358页。

“奉行亲苏的方针”^①。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们必须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了，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的真正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②。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进一步密切了与苏联的联系，多次就中国革命和筹建新中国的有关问题向苏联领导人征询意见，以取得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更大支持。至此，中国共产党在外交上已经逐步实现了向“一边倒”的转变。

就在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关系日益密切，中国共产党在外交上转向“一边倒”的时候，美国也开始试探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关系的可能性。1949年3月，当国共和谈正在进行之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就向美国政府提出新建议，建议寻找适当的机会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建立联系。美国一些驻华外交官也建议美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以争取中国的新政权将来不反美。司徒雷登的建议获得了美国政府的默许。在一些已经解放的地区和大城市，美国外交官则能留就留，从不主动撤离。4月23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后，美国大使馆仍留在了南京。5、6月间，南京市军管会外办主任黄华与司徒雷登进行了多次会谈。中国共产党方面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但“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③，美国也不

① 《党的文献》，1996年第1期，第96页。

②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910—91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1页。

例外。黄华要求美国政府断绝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停止对国民党的援助,撤退驻华美军。司徒雷登通过其秘书傅泾波向黄华表示,他希望能在返美前赴北平与中共领导人进行非正式会晤。司徒雷登的动议很快获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同意,但遭到杜鲁门总统的否决,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指示司徒雷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①。与此同时,艾奇逊还提出了美国政府承认一个新政权的三项条件:一是在事实上控制该国的领土和行政机构,二是有能力并愿意履行国际义务,三是得到该国人民的普遍接受^②。在这三项条件中,关键是第二项。美国政府明知中国共产党历来是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主张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却以履行国际义务为名要中国共产党承认美国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这是中国共产党根本不可能接受的。这一切表明,美国对中国局势的发展仍然采取观望态度,既不肯公开放弃敌视中国革命的立场,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又不愿意断绝与国民政府的关系。这样,美国失去了最后一次与中共和解、建立关系的宝贵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已经别无选择,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1949年6月30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前夕,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公开宣布了中国共产党“一边倒”的外交决策。毛泽东在文章中分析了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政治发展的趋势和近百年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历史进程,指出:无论是国际上资本主义的衰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还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和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都说明“西

① 黄华:《南京解放初期我同司徒雷登的几次接触》,载《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30页。

② 《美国外交文件》,1949年第9卷,第21—23页。

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①。中国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必须采取的外交政策是：“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②这是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向国内外宣布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在外交问题上的基本立场。“一边倒”政策的提出，表明新中国在美苏对峙的世界政治格局中，将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一边倒”政策的提出，是美苏冷战、世界分裂为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尖锐对立阵营的必然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对美国顽固坚持援蒋内战政策作出的直接反应，也是战后中国共产党对美苏政策合乎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虽然理论界至今对这一政策还有不同看法，它却是在特定的国际背景和没有其他选择余地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作出的最为理智的抉择。它的提出，不仅具有重要的外交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

从外交意义上讲，“一边倒”政策为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孤立政策和发展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奠定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2—1473页。

了基础。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对中国革命基本上采取的是敌视态度,特别是从抗战后期以来,美国不顾中国共产党的强烈反对,大力支持和援助国民党政府,多次以调处国共关系为名,行助蒋压共之实,妄图迫使共产党就范,扑灭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直到中国革命完全胜利和新中国诞生前夕,美国的态度和政策仍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这就使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认为:“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①而苏联虽然对中国共产党存有疑虑,但基本上采取的是支持和援助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政策,特别是在中国革命胜利的前景十分明显的情况下,苏联和斯大林的态度逐渐明朗化,明确表示支持中国共产党和承认即将成立的新中国。这样,在美苏对立中,选择站在苏联一边,有利于抵制和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军事威胁、经济封锁和政治遏制,有利于发展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和经贸关系,从而避免新中国在外交上的孤立,获得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最担心的莫过于国际上的承认问题,“我们建国以后如果外国三天不承认,就有问题了”^②。实行“一边倒”,无疑是打破外交孤立的一件锐利武器。正如邓小平所说:“帝国主义的各种花样直到封锁,其目的在于迫我就范,我们的斗争也在于迫使帝国主义就范。”“打破封锁之道,毛主席强调从军事上迅速占领两广云贵川康青宁诸省,尽量求得早日占领沿海各岛及台湾。同时我们提出的外交政策的一面倒,愈早表现于行动则对我愈有利(毛主席说,这样主动的倒,免得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5页。

② 师哲:《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经过》,载《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8页。

将来被动的倒)。”^①

从政治意义上讲,“一边倒”政策为巩固中国革命的胜利成果和维护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创造了条件,为未来新中国的政治发展确定了方向。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之前,中国共产党在制定外交政策时,考虑的侧重点在于如何维护中国革命的利益,如何有利于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完全胜利的情况下,如何巩固中国革命已经取得的胜利成果和维护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制定外交政策时考虑的重点。实行“一边倒”,以苏联为后盾,就能够确保新中国的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完整不再受到帝国主义侵略的威胁,这是中国共产党为巩固革命胜利成果在外交上采取的一项重要决策。同时实行“一边倒”,还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在政治上将奉行与苏联相同的意识形态、在社会制度的选择上将走相同的道路,即以苏联为榜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对此,毛泽东曾明确地指出:“我们提出‘一边倒’,是意味着在政治上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团结起来,同社会主义国家站在一起,不能一脚跨在社会主义方面,一脚又跨在资本主义方面。所以‘一边倒’就表明我们在政治上同资产阶级国家断然分开,打消一切西方国家的幻想。”^②由此可见,“一边倒”政策的政治意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它决定了新中国将走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就在毛泽东宣布“一边倒”的同一天,美国政府指示司徒雷登,要他中断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络与接触,并迅速返回国内。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一方面把1844年以来美国对中国的侵略说成“友谊”,为其过去的对华政策进行辩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4页。

^② 转引自《中共党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55页。

护;另一方面又对中国革命进行种种诬蔑,表明其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敌对立场。白皮书一发表立刻受到中国共产党的严厉批判。毛泽东连续撰写和发表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5篇评论文章,系统地分析了中国革命发生、发展和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强烈谴责了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深刻揭露了美国的帝国主义本质,号召全国人民“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并再一次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一边倒”的政策。毛泽东指出,“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是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中国人民近百年来反帝斗争经验得出的必然结论。美国不甘心它在中国的失败,“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①他提醒那些在中美关系上存在幻想的人,必须丢掉幻想,准备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以美国政府白皮书的发表和中国共产党对白皮书的批判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完全断绝了与美国的接触与交往。

中国共产党“一边倒”政策的宣布,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中苏两党之间的隔阂和疑虑,为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关系的迅速发展扫清了道路。1949年6月26日至8月14日,刘少奇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这是自1940年周恩来、任弼时从莫斯科回国以来,中国共产党派出的第一个访问苏联的高级代表团。中共代表团的来访受到斯大林和苏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热烈欢迎。刘少奇在莫斯科期间与斯大林和苏联其他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会谈。刘少奇在会谈中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6—1487页。

详细介绍了中国革命现阶段的基本状况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阐述了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国家性质、组织构成、对外政策和未来的中苏关系等问题。斯大林对中共代表团提出的问题给予了较为满意的答复，并采取了允诺率先承认新中国、同意毛泽东访问苏联、承认1945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条约、愿意派遣苏联专家帮助中国建设等一系列友好行动。刘少奇访苏，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关系的发展。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10月2日，苏联第一个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12月，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经过谈判，双方正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联盟正式形成，中国也由此成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

与此同时，美国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犹豫之后，决定继续承认和支持国民党政府，并对中国共产党采取敌视政策，拒绝承认新中国。美国不但自己拒不承认新中国，还竭力拼凑所谓“联合阵线”，劝阻其他西方盟国和受其控制的国家承认新中国，企图把新中国排挤出国际政治大家庭。早在1949年5月13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指示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要他转告英、法等国驻华大使：“给共产党政权以事实上的承认将从政治上鼓励共产党，打击国民党”，“我们强烈反对任何大国匆匆忙忙给予中共以无论事实上还是法律上的承认”^①。10月3日，杜鲁门指示国务院不要匆忙承认中共政权。同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宣布，美国将继续承认国民党政府。这样，美国与新中国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处于敌对状态。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干涉朝鲜内战，直接威胁到新中国的安全利益，中国出兵援朝，中国共产党与美国逐步走上了在政治、军事、外交上全面

^① 《美国外交文件》，1949年第9卷，第16—23页。

对抗的道路。从此之后,中国共产党对美苏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第五章

历史丰碑：中国共产党发展和处理对外关系的历史经验和历史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演变原因透视

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主要是对美苏政策）演变的历史轨迹的考察，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共产党对美苏政策的演变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对美苏政策的总特征是亲苏联亲美。这一阶段是中国共产党对美苏政策的起源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的重点主要表现为拉美抗日，建立国际反日统一战线，而同苏政策的重点主要表现为摆脱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影响和控制，独立自主地制定对外政策。第二阶段，从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七大召开前夕，中国共产党对美苏政策的总特征是拥苏联亲美。这一阶段是中国共产党对美苏政策相对稳定和发展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重点转向联美抗日，主要表现为强调对美合作的必要性，制定对美合作政策和开展与美国的军事、政治合作，而同苏联则联系较少，主要表现为政治上的支持和拥护。第三阶段，从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七大召开到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中国共产党对美苏政策的总特征

是联苏防美。这一阶段是中国共产党对美苏政策的调整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重点由联美转向联苏,主要表现为配合苏联收复东北、协调对苏关系抢占东北,而对美国则由联合转为防范,采取中立美国的策略。第四阶段,从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对美苏政策的总特征是联苏反美。这一阶段是中国共产党对美苏政策的确立阶段,主要表现为争取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支持,反对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直至最后“一边倒”,即倒向苏联一边。当然,这些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因为中国共产党对美苏政策的转变往往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而是有一个不断认识、不断深化、不断修正的过程,其间自然不乏曲折和反复。

马克思曾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①一般说来,任何一个国家或政党在处理对外关系、制定对外政策时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都必然会受到它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社会和现实政治中各种因素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下面以最典型的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为例,说明中国共产党对美苏政策的变化受到了哪些主客观因素的影响。

(一) 国家的根本利益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往往利用政权机关来维护本阶级的利益,把本阶级的利益视为国家利益。从这一点上来说,国家利益具有阶级性。但另一方面,国家又是由一定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3页。

区域内特定民族长期融合而形成的社会集合体,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都是民族的一员,具有相同的语言、地域、文化和经济利益,双方在维护和发展共同的民族利益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因此,国家利益既具有阶级性,也具有民族性。在处理对外关系中,国家利益的民族性显得特别突出,是一个国家或政党制定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根本依据。

抗日战争时期和战后初期,美国和苏联正是以维护和发展本国的国家利益为基准,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来制定对华政策,处理与中国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的。美国和苏联由于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同欧洲有着特殊的密切关系,历来以欧洲为其战略利益重心之所在,但也非常关注自己在亚洲特别是中国的利益。抗战初期,面对德、日法西斯的巨大威胁,为了利用中国抗战牵制日本,以保障自身安全,苏联采取了援华制日的远东政策,而美国采取了绥靖日本的不干涉政策。抗战中期,为了全力对付德国法西斯在欧洲的侵略,苏联逐渐减少并停止了对华援助,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也时断时续,而美国为实现其“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则采取了与中国结盟、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政策。抗战后期和战后初期,美苏为了最大限度地谋求在华利益,两国通过秘密交易和相互妥协,采取了支持国民党政府统一中国这一协调一致的对华政策。由此可见,美苏之所以采取战时援华抗日、战后支蒋统一的对华政策,其根本目的并非真正为中国利益考虑,而是作为实现自己国家利益的手段。这就是,在战时维持中国抗战,苏联可以避免两线作战,美国可以确保“先欧后亚”战略的实施;在战后支蒋统一,苏联可以确保自己在中国东北的经济利益和在远东的安全利益,美国可以把中国培植为自己在远东抗衡苏联的重要伙伴和控制世界政治格局的得力助手。因此,尽管美苏两国的具体情况、具体政策和追求的目标有所不同,但其对华政策的根本

出发点都是为了谋求和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正如一位美国学者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本质所分析的那样,它“是为了美国的利益而构思,它并没有特别地注意到中国”,它“没有理由可以使美国人感到不满,而中国人也没有理由为它感激”^①。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最大、最高的国家利益是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和国内政治的民主化。对此,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是非常明确的。毛泽东指出:“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现在我们全国人民所要的东西,主要的是独立和民主。”^②当时,中国共产党虽然不是执政党,却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者。中国共产党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之中,从它诞生那时起,就既肩负着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中国工人阶级的阶级使命,又肩负着争取民族独立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民族使命。1935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指出:我们党不但代表了工农的利益,同时也代表了民族的利益,“去掉帝国主义的压迫,使中国自由独立,去掉地主的压迫,使中国离开半封建制度,这些事情就不但使工农得了利益,也使其他人民得了利益。总括工农及其他人民的全部利益,就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利益”。“所以我们有权利称我们自己是代表全民族的”^③。以国家独立、民族振兴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在制定对外政策、处理对外关系时,不是简单地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异同作标准,而是以是否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为基本出发点。1936年7月23日,毛泽东

① [美]罗伯特·达莱克著,伊伟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华政策(1932—1945)》,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1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9页。

与美国记者斯诺在谈到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关系时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员,但决不能说苏维埃中国是受莫斯科或共产国际统治的。它仅仅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它必须是全民族的代言人”,“它只能为中国群众的利益说话”^①。中国共产党对美苏政策演变的曲折过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当中华民族面临日本帝国主义吞并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和推动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苏联是唯一积极援华抗日的国家,中国共产党便将苏联作为外交的重点,确立了联苏制日的外交战略,积极推动国民党改善中苏关系,与苏联结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正式结盟抗日,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在抗日和民主问题上存在着共同利益。于是,中国共产党遂将外交的重点转向美国,制定了联美抗日政策,与美国进行了军事和政治合作,并借助美国的影响同国民党进行了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谈判。抗战后期和战后初期,当美国采取扶蒋反共政策、苏联出兵占领东北时,中国共产党及时地调整对美苏政策,由联美转向联苏防美,直至采取联苏反美政策。解放战争后期,当美国继续采取敌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政策、企图扼杀新中国时,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走上联合苏联、对抗美国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对美苏政策之所以多次调整,其根本目的无非是两个:一是对外打败日本侵略者,驱逐帝国主义侵华势力,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二是对内制止国民党的独裁、内战,建设一个和平、民主和统一的新中国。因此,争取国家独立,实现民族解放,是中国共产党对美苏政策的主题。

不可否认,中国长期遭受西方列强欺凌的历史,使中国共产党在

①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1页。

处理对美苏关系时特别重视国家利益。但是,中国共产党人绝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她重视自己的国家利益,但不会为了本国利益而不顾或牺牲他国和世界利益;她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但同时尊重和照顾别国的利益,注重维护世界人民的整体利益。在一点,在抗日战争时期体现得尤为明显。中国共产党始终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事业是一致的,中国和各反法西斯国家在制止法西斯侵略的斗争中有着密不可分的共同利益,中国的和平与统一将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毛泽东曾指出:“中国的长期抵抗,将使日本帝国主义本身走上崩溃的道路。从这一方面说,中国的抗战不但为了自救,且在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中尽了它的伟大责任。”^①事实上,无论是拥苏联美,还是联苏防美,中国共产党对美苏政策的每一次调整,都是着眼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局,充分照顾了包括美苏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了以国家利益为重,同时把国家利益与世界人民利益相结合的对外关系原则。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中国共产党与美苏在战时和战后长时期的友好合作关系。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除了维护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外,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二)意识形态的差异

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或政党政治和经济利益的一种表现形态,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的对外关系中亦占有一定的地位。一个国家或政党的对外政策一方面要受到本国的经济制度、政治结构、历史传统等因素的制约,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这种影响力往往可以直接左右或干预对外政策的实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5页。

施,成为制定对外政策时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国际无产阶级与国际资产阶级是根本对立的,世界社会主义与世界资本主义是根本对立的,这种阶级分野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制定对外政策和发展对外关系时不可能没有阶级意识、不可能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美国和苏联是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迥异的两个国家,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来说,对它们的政策,不可能是“等距离”的。其中,意识形态因素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从对苏政策来看,在整个民主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一直特别重视与苏联的友好合作关系,主张中国应实行积极的联苏外交政策。当苏联因与德国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与日本订立苏日中立条约而为舆论所指责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却耐心地向各方面解释,维护苏联的立场。当苏联废除苏日中立条约,准备参加远东战争时,中共中央立即发出指示,认为只有苏联才是最先支援中国人民抗日的国家,强调今后要着重宣传苏联力量的强大、宣传远东战争没有苏联参加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当苏联为中苏条约所约束,不但不能公开支持中国共产党,反而对中国共产党进行限制时,中共中央没有抱怨和指责,而是主动适应苏联政策的变化,调整自己的战略方针。从对美政策来看,中国共产党虽然在抗战时期确立了联美抗日政策,但从一开始就认为与美国的合作关系是有限的和靠不住的,美国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除了对日战争的需要外,就是为了保住蒋介石的统治地位,维护美国的在华利益。因此,中国共产党的联美政策只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这个策略原则的具体运用。当中国共产党确信美国在国共斗争中将站在国民党一边后,对美政策立即从联合转向防范和斗争。由此可见,受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对苏联与美国的政策是有本质区别的:联苏是根本的、必然的、牢固的,联美则是策略性的、阶段性

的、比较脆弱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在战时和战后发生磨擦和冲突的根源所在。

但是,国际斗争的实践表明,意识形态因素在国际关系中并不一定处在重要地位,更不是决定不同政治力量之间亲疏关系的唯一标准。意识形态只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属于国家政治利益的范畴,必须服从于国家的根本利益。在国际关系中,只有永久的国家利益,而没有政治上永久的敌人。任何一个国家或政党在作出外交上的重大决策时,起决定作用的往往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国家的根本利益。意识形态相同或相近的国家可能因国家利益的差异性而发生冲突甚至战争,意识形态不同或对立的国家也可能因国家利益的共同性而存在着合作。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作为非执政党,虽然涉及不到国家关系问题,但她懂得在捍卫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同时,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在发展对外关系上不应受意识形态的局限,而应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美苏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但意识形态并不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中国共产党在制定对美苏政策、处理对美苏关系时,逐步摆脱了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束缚,而是以是否反法西斯作为划分和联合的标准。对苏联,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因为意识形态的相同而对其盲从,接受控制和操纵,而是最大限度地坚持了自己在内政和外交上的独立性;对美国,中国共产党也没有因为意识形态的不同而拒绝与其合作,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合作关系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与苏联的合作关系。

总的来说,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在通常情况下是一致的、同一的,但有时也有差异。有时从国家利益出发作出的决定可能不符合意识形态的规范,有时从意识形态出发作出的决定可能有损于国家利益。但归根到底,国家利益高于意识形态。在国家、民族处于生死

存亡的危急关头的时候，意识形态的分歧最终要让位于挽救民族危亡的国家利益。中国共产党对美苏政策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大胆冲破意识形态的限制，与美苏开展了广泛的联系与合作，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影响，其意义重大而又深远。

（三）国际环境的变化

这里所讲的国际环境主要是指在抗战胜利前后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美苏关系和美苏对华政策的变动对中国共产党对美苏政策的影响。

抗战胜利前后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时期，也是美苏对中国内部事务干预最为频繁的时期。战时，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亚洲的战略支点；战后，中国是以美苏争霸为主要内容的远东国际关系的中心。美苏出于对各自战略利益的考虑，在中国问题上有合作，有斗争，有妥协，又有冲突。加上历史、政治的原因，美国与国民党、苏联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亲密关系，美苏关系及其对华政策的变化自然就成为影响中国共产党对美苏政策的重要因素。

美国是抗战胜利前后中国共产党接触最多、最频繁的国家，双方曾有过友好合作的“蜜月”时期。然而，双方的关系非但未日益密切，反而日渐恶化，最后走向对抗，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反动性。回顾起来，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的几次调整，都首先是对美国对华政策作出的直接或间接的反应。当美国采取支蒋容共抗日政策时，中国共产党立即采取了对美合作政策；当美国对华政策由支蒋容共向扶蒋反共转变时，中国共产党不但公开抨击美国的对华政策，而且开始准备应付美国的外来干涉；当美国在扶蒋反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时，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关系的破裂也就不可避免了。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密切关注着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并能独立、准确地做出判断，才有对美政策的不断修正和调整。

当然,由于国际形势瞬息万变,而中国共产党又尚未完全走出被封闭、被隔绝的状态,加上对美国的政治制度、外交决策过程了解不够,中国共产党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动向所做的分析有时并不十分准确,使得对美政策也难以避免地出现了一些曲折和反复。

苏联是对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影响最大的国家。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前,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它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主要是对美政策基本上都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来制定的。在共产国际解散后,苏联作为当时唯一的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它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并未因此而完全消失。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苏联对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影响,有时是积极的,有时则是消极的。当苏联的指示或建议符合国际形势发展的实际情况,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时,就能够对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产生正确的指导作用,反之亦然。抗战初期,在中国共产党确立国际反日统一战线政策的过程中,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作用功不可没。1939—1941年,中国共产党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发生误解并因此导致对美政策的逆转,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是一个重要原因。1945年8月,中共中央派毛泽东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也是在充分考虑了苏联的意见,权衡了各方利弊后作出决定的。尽管苏联会对中国共产党产生影响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在对外政策上是完全唯苏联马首是瞻,根据苏联外交战略的需要来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的。事实上,正如前文所述,在抗日战争中逐渐成熟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完全具备了独立自主制定对外政策的能力。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制定对外政策时考虑的重点并不是如何适应和配合苏联的外交政策,而是国际形势的变动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对于来自苏联的意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总是采取分析的态度,正确的就结合中

国的实际贯彻执行，错误的就巧妙地加以抵制。应当说，苏联在对外政策上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是有一定限度的。1946年1月，斯大林在会见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时曾表示，他和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多少接触，苏联政府派驻延安的三位代表已经召回，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并不大。他的印象是中国共产党人不会赞同苏联政府对中国问题的立场。他也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会接受他的意见。他还说，苏联不会对中国共产党采取主动的态度，但如果中国共产党征求他的意见，他是准备劝说中国共产党结束内战、努力和蒋政府达成一项协议的^①。斯大林的谈话虽然旨在说明苏联继续采取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对华政策，但也反映了当时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状况和对中国共产党影响的程度。

美苏关系也是影响中国共产党对美苏政策的重要因素。抗战胜利前后，国际政治局势的显著特点是以美苏为首的大国主宰世界。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实力和地位决定了她的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不是直接影响国际局势的发展，而是依据国际局势的变化，在既定的国际环境中寻求和选择最有利于中国革命发展的战略和策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看来，美苏关系与国共关系、中国革命是互相联系、密切相关的。在战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一直把美苏合作看成巩固国共合作的一个重要条件，并试图利用美苏合作来推进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在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曾有过利用美苏妥协促成国共妥协，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的设想。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内外政策的每一次调整，几乎都联系着美苏关系。然而，美苏关系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毕竟是外来因素，不是决定性的

^① [美]哈里曼、艾贝尔著，南京大学历史系对外关系史研究室译：《特使——与丘吉尔、斯大林周旋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391—392页。

因素。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认识到美苏之间的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的情况进行不同的斗争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对美苏关系与中国革命之间关系的认识开始发生了变化,即认为美苏关系不会对中国革命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因此,在美苏关系恶化后,国内外许多人士担心国共内战将导致美苏战争、美苏之争将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国共产党没有听从苏联的劝告,毅然开始了推翻美蒋反动派的武装斗争,从此结束了某些大国操纵中国命运的历史。

(四)国内斗争的需要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是为内政服务的。中国共产党在筹划和制定对美苏政策时首先考虑的是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由于中国是一个政治上不统一的国家,中国共产党又是有独立的武装和政权的政党,它在抗战时期的目标是打败日本侵略者,同时使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判断国际政治力量,决定是否联合时,既要看它们的对日政策,又要看它们对国共斗争的态度。在国、共、美、苏“三国四方”的关系中,美苏对国共斗争的态度和立场直接影响着国共关系的走向(紧张与缓和、分裂与合作)。因此,中国共产党对美苏采取何种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苏对国共斗争的态度和立场。中国共产党对美国或争取、或合作、或防范、或中立、或反对,对苏联或亲近、或疏远、或支持、或联合,贯穿始终的一个目的就是集中力量开展对蒋斗争,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共两党的斗争是影响中国共产党对美苏政策的重要因素。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纲领是“走团结和民主

的路线,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①。也就是:对外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完成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对内进行社会民主改革,实现国内和平统一,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为了实现这一纲领,中国共产党的对美苏政策不仅密切地与对日战争的战略需要相联系,而且密切地与国共关系的变化、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相联系。国共关系的变化往往成为反映中国共产党对美苏政策的晴雨表。在国共关系缓和,中国和平发展的前景较为光明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往往积极寻求与美苏的某种合作,与双方都建立友好关系;在国共关系恶化甚至破裂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往往会联合一方,防范或反对另一方。因为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美国是支持国民党的,而苏联迟早会支持中国共产党。

国内斗争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关系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国民党奉行两面性的对内政策。它既抗日又反共,既实行国共合作又准备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深知,无论政治、军事还是外交,都是实力的较量,是以实力为后盾的,没有实力,就没有自己应有的地位,实现革命纲领就成为一句空话。因此,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致力于抗战胜利和国内和平的实现;另一方面又十分关注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注重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力量。为了在国内斗争中占据有利地位,中国共产党曾多方寻求苏联的支持和援助。从道义上讲,苏联也理应支持中国共产党。然而,苏联从自身利益出发,在国共斗争中往往不是坚定而明确地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正义斗争,而是不问问题的是非曲直,片面地要求中国共产党作出重大让步,以改善与国民党的关系,甚至公开采取支持国民党而不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给国民党借苏压共造成可乘之机。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0页。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要保存和发展自己,势必在对苏政策上更多地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是中国共产党与苏联之间存在矛盾和分歧的主要原因。当然,中国共产党也尽其所能妥善处理国共斗争与苏联的关系,在国共斗争问题上的分歧并未导致两党关系的破裂。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争夺东北的斗争中,在对苏政策上一直采取配合和适应的方针,除了国内斗争方面的考虑外,也包含了协调对苏关系问题。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一直力图把与苏联的矛盾和分歧减少到最低限度,但这是以不妨碍同国民党的斗争为前提的。

国内斗争的需要对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的影响尤为明显。抗日战争时期和战后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关系的担心莫过于担心美国会支蒋反共。1939年前后,在国民党采取“限共、反共”政策,国共关系恶化,而美国援华抗日立场又不甚明确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曾一度放弃了拉美抗日政策。1941年前后,当国民党再次制造反共摩擦事件,而美国明确表示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要求国民党进行民主改革时,中国共产党认为有可能借助美国的影响来遏制国民党的反共倾向,敦促国民党实行政治民主化,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因而对美国开始采取积极的合作政策。抗战末期,当国民党一再拒绝进行实质性的民主改革,而美国对华政策又开始转向扶蒋反共时,防范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的主要内容。战后初期,当国民党积极准备发动反共内战,而美国采取调停国共冲突的对华政策时,中国共产党为了集中力量开展对蒋斗争,遂采取了中立美国的外交策略。当国民党公然发动内战,而美国对华政策转向公开助蒋内战时,中国共产党就不得不中断了与美国的联系,通过革命的激烈手段来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

总之,世界是复杂的,形势是多变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对美苏政

策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既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既有政治方面的,也有思想方面的。通过对这些因素的分析和研究,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中是如何正确处理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内政与外交的相互关系的,从而准确地把握中国共产党对美苏政策的实质及其演变的深层原因。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因素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的;它们对中国共产党对美苏政策的影响并不是单独地发生作用,而是结合在一起发生作用。只不过有时候某个因素的影响大些,而在别的时候另外的因素则更为突出些。正是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对美苏政策演变的历史轨迹。透过这一历史轨迹,我们不仅可以从中看到中国共产党在外交战线上逐步地从幼年走向了成熟,而且使我们更深切地感到,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工人阶级利益的忠实代表,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利益的忠实代表。

二、中国共产党外交策略思想的主要内容

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内容是十分具体和丰富的,这些内容有的见之于文字,通过中共中央文件或中共领导人的讲话表现出来,有的是在处理对外关系的具体实践中表现出来。无论其来源和表现形式如何,都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建立国际统一战线

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和打击最主要的敌人,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统一战线策略的根本原则,也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对外政策的重要指导思想。根据这一原则,中国共产党在对外政策方面的主要内容就是建立和发展国际统一战线。

国际统一战线在抗日战争时期表现为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战后初期表现为联合美苏,制止国

民党发动内战;在全面内战爆发后表现为争取苏联的同情和支持,反对美蒋反动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国际统一战线的中心内容是联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和民主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外国干涉中国内政。它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它要解决的问题是在世界政治力量中联合谁、打击谁,属于统一战线思想的范畴;另一方面,它又必然涉及中国共产党与英美苏等国家的关系问题,属于对外政策的内容。为了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在对外政策上,中国共产党放弃了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重新确定了对待帝国主义国家的策略。1935年年底,中国共产党在重新认识国际形势和中国对外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和平阵线相结合的任务,并产生了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以国际统一战线来加强和巩固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构想。1936年年底,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郑重建议:反战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应组成一个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组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思想的萌芽。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国际统一战线在理论上、实践上都进行了积极探索。具体表现在:

(1)深刻阐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争取与英美建立国际反日同盟。毛泽东认为,中日战争是20世纪30年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日本之间进行的一场殊死战争。双方力量对比悬殊,落后的中国要战胜强大的日本,除了组织全国一切抗日力量抗敌御侮外,还必须联合世界上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国家来制止侵略。当时,英美在中国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日本的侵略扩张直接威胁到英美的“理想和利益”,使英美与日

本的矛盾日益加深。英美主要是美国在“东方的利益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紧密连结在一起”^①，它们将支持中国抗战和暂时地赞助中国的统一与和平，因此，中国与英美建立反日同盟是完全必要和可能的。对中日战争形势和英美与日本之间矛盾的科学分析，是中国共产党提出与英美建立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的客观依据。但是，中国共产党对英美关系的认识也经历了一番波折。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建立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的最大障碍来自英美的“不干涉”政策和绥靖政策。为此，中国共产党被迫开展了反对英美绥靖主义的斗争。毛泽东不仅对英美的“不干涉”政策提出了尖锐批评，而且告诫英美等国，如果中国完全殖民地化，太平洋的未来就是一片黑暗；如果中国战败，它们“将不能安枕”，“援助中国就是援助他们自己”^②。中国共产党对英美的斗争归根到底也是为了早日与其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2) 正确提出划分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大阵线的标准，推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为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然而，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特有的复杂性，交战国的情况各不相同，既有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国家，又有法西斯国家，还有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联合谁、打击谁这一问题上缺乏一个划分营垒的明确标准。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原理，提出了以是否反对法西斯作为划分营垒的标准。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苏联是核心和领导力量，英美等国是参加者和联合的对象，德意日法西斯是世界

①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5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49页。

人民的敌人。这一标准完全突破了按国家的阶级性质划分世界阵线的传统观念,紧紧抓住了反对法西斯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主要矛盾,使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的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得以明朗化,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同时,这一标准的提出也使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相衔接,真正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3)努力维护同盟国的团结与合作,促进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重点转向加强与盟国的联系和合作,巩固反法西斯阵营的内部团结,争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早日到来。在战争期间,同盟国为协调对德意日作战进行了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如英、美、苏外交关系的改善,莫斯科会议、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的召开等。对此,中国共产党都给予了特别关注和高度评价,党的新闻媒体进行了大量宣传报道,突出强调了盟国间团结合作的重要性。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特地称赞“国际会议的决议都是有利于打败法西斯侵略者和维持世界和平的”^①。中国共产党还积极支持建立保障战后和平安全的结构——联合国,并派代表出席了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此外,中国共产党还为改善中苏邦交,巩固中美联盟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4)同美国建立直接的联系与合作,联美抑蒋,推进中国和平民主进程。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政策,不仅包含争取国际力量援华抗日的思想,而且包含利用国际力量遏止国民党投降反共倾向,促进战后中国政治向民主化方向发展的思想。中国共产党希望通过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实现战时打败日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4页。

本侵略者、战后建立一个有中共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的双重目标。中国共产党认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中心内容是抗日与民主合作，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是夺取抗战胜利和实现政治民主化的重要障碍。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仅凭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力量还不足以抑制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图谋，迫使蒋介石接受民主改革的主张。因此，必须借助国际上各种希望中国坚持抗战、实行民主改革的力量，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中国共产党在外交上采取了联美抑蒋的策略。一方面，采取主动、友好的姿态，积极寻求与美国官方的联系与合作；另一方面，利用美国的影响，推动国民党进行民主改革。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与美军观察组的军事合作、接受赫尔利斡旋国共谈判都体现了这一策略思想。

(5)争取苏联的同情和支持，反美倒蒋，夺取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抗日战争胜利后，特别是美苏冷战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破裂，出现了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由于美国全力支持蒋介石，千方百计阻止中国共产党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逐步放弃了与美国的联系与合作，转向加强与苏联的联系与团结。中国共产党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的前提下，不仅尽可能地避免与苏联发生公开冲突，而且尽可能地消除苏联对中共的误解和不满，努力改善双方关系，争取苏联在道义、物资上支持中国革命。米高扬的来访和刘少奇的访苏是中共与苏联关系日趋密切的重要标志。毛泽东宣布的“一边倒”，公开表明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由于争取了苏联做中国革命的坚强后盾，美国始终未敢公开武力干涉中国革命，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争取了一个极为有利的国际环境。

建立和发展国际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实施对美苏政策

的思想基础。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把本国民族利益与各国的共同利益相结合、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相结合、国内统一战线与国际统一战线相结合,不仅团结了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夺取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而且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

(二)独立自主地开展对外交往

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的一条基本原则,也是制定和实施对外政策中坚持的基本原则和根本立场。

所谓独立自主就是各国党根据本国的实际和自身条件,自己观察国际国内形势,自己决定在国际国内事务中的立场和主张。在处理对外关系中,能否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是衡量一个政党能否维护本民族利益和是否成熟的根本标准。当中国共产党人从延安走向世界开始处理和发展自己的对外关系时,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国内斗争与国际斗争相互交错的复杂局面,各种国际政治势力基于各自利益的需要都力图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来影响和干预中国的国内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没有无原则地妥协和退让,而是始终站稳自己的民族立场,既不依赖于任何外国势力,也不屈服于任何大国压力,独立自主地制定和实施自己的内外政策,有力地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革命利益。正如毛泽东对谢伟思所说:“中国共产党是完全独立自主的党,不受任何外国势力的支配。”“我们首先是中国人,我们寻求友好关系,但我们不听从任何人的指挥。我们要自己决定自己的事,要按中国的实际情况运用马克思主义。”^①

(1) 正确处理苏联利益和中国革命利益的关系,在国际共产主

① 谢伟思:《他目光远大》,《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第23页。

义运动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不可否认,苏联和共产国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曾给中国共产党以正确的指导,也曾给中国的抗战和中国革命以大力支持。但是,由于苏联和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国情,过多地强调苏联利益,忽视中国革命利益,过高地估计国民党的力量,忽视中共的地位和作用,要求中国共产党无原则地与国民党合作,无条件地服从苏联利益的需要,因而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领导权和军事战略战术等问题上与中国共产党存在着严重的思想分歧。对此,中国共产党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没有盲目服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瞎指挥,对其错误主张进行了积极的抵制,排除了其错误干扰,始终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既统一,又独立”的原则,拒绝了大规模出兵牵制日军的要求,并通过整风运动从根本上实现了自己的独立自主。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又坚决抵制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妥协逆流,理直气壮地拒绝了斯大林对中共放弃武装斗争、与国民党妥协的劝告,坚持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从而争取了在国内革命战争中的主动权,夺取了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

(2)正确处理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关系,在国际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抗日战争时期,在如何坚持抗战和争取国际援助问题上,中国共产党认为,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和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但战胜日寇主要还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方针是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利用外援,但决不能放弃自力更生去单纯地依赖外援。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既积极争取英美等国援华制日,又反对它们的企图牺牲中国的绥靖政策;既主动与美国进行合作,又反对它的企图左右中国政局的扶蒋反共政策;既希望获得美国的军事援助,又绝不以原则做交易。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做到了

不畏强权、不卑不亢,不依附于任何大国,不为任何大国的外交政策所左右,坚定地维护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自己的独立自主地位。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仍然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一方面尽力争取苏联的支持和援助,另一方面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是在没有外援或几乎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败美蒋反动派的。

(3)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反对任何外国干涉中国内政。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争取和平民主斗争中也曾多次面临以美苏协调对华政策和美国调处国共冲突为背景的外来干预。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警惕性,既不相信帝国主义的“好话”,也不害怕帝国主义的恐吓,一方面对马歇尔调停表示欢迎,努力争取美国的同情或中立;另一方面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对美国片面支持蒋介石、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进行揭露和斗争。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了独立自主,没有屈服于外来压力,不惧外来干涉,才有了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

(三)超越意识形态的合作与对话

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或政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在观念上的表现形态,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或政党在制定内政外交政策上采用的思想体系。意识形态对一个国家或政党的外交政策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关键在于能不能摆正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关系,这是衡量一个政党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曾有过以意识形态异同作为联合世界政治力量的标准而导致自我孤立和封闭的经验教训。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中国共产党紧紧抓住中日民族矛盾这一主要矛盾,主张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当时,虽然中国共产党仍将对苏关系摆在对外关系的首要地位,但也开始摆脱苏联外交格局的束缚,

区别对待不同政治势力,寻求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关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从建立和发展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出发,在理论上提出了不以意识形态划线发展对外关系的指导原则,在实践中与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开展了广泛的联系和合作。

不以意识形态划线,就排除了意识形态的干扰,能够以国家间的共同利益为基础,不受拘束地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开展合作和对话。在此以前,中共对外政策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很大,动辄以苏划线,非友即敌,不加区别地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宣战,使自己的对外关系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也不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和打击最主要的敌人。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不再戴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这一单向角度来观察世界,而是以是否反法西斯作为判断敌友的标准,即“凡助我者友之,凡助敌者敌之”^①。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不管是无产阶级政党,还是资产阶级政党,也不管是信仰共产主义,还是信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只要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共都表示欢迎,都愿意与其交往和合作。为此,中国共产党在继续保持与苏联的合作关系外,还积极开展了对美外交联络,先后接待了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与美军观察组进行了合作,配合了赫尔利调处国共关系的活动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战后与美国继续保持了一段时间的合作关系,并提出了与美国战后进行经济合作的设想。虽然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全面合作政策因美国对华政策的逆转而没有完全实现,但它赢得了国际社会对中共的广泛同情和支持,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地位和声望。

^① 毛泽东:《论目前形势与中国抗战》,《群众》周刊,第3卷第13期,第342页。

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以社会制度异同论亲疏,揭示了意识形态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使国际统一战线政策真正落到了实处,使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有了实现的保证。在抗战爆发之前,苏联正是以意识形态为纽带来控制 and 支配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共产党的行动为苏联的国家利益服务的。抗战胜利前后,中国共产党完全摆脱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束缚,开始按照国家利益的需要来调整对外关系,既与苏联联系,又与美国接触,不仅最大限度地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而且开创了对外关系的新局面,巩固和发展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美苏进行成功合作的事实,证明了世界上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的合作是可行的,也是行之有效的。

当然,不以意识形态划线,超越意识形态开展合作,并不是说中国共产党无视意识形态的存在,不重视意识形态的作用。事实上,正是考虑到意识形态的因素,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发展对苏关系放在自己对外关系的重要位置,在制定对外政策时特别强调社会主义苏联和资本主义各国的区别,在开展对美合作时保持着高度警惕。中国共产党对美苏政策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既重视意识形态的作用,又不为意识形态所束缚,没有把意识形态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更没有为意识形态而牺牲国家的根本利益。

(四)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

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是中国共产党在处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关系时坚持的一条策略方针,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对美苏关系时坚持的一条策略方针。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美苏两国出于对本国利益的考虑,在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时,其对华政策带有明显的两面性。就美国来说,它既有与中共联合抗日的一面,又有扶蒋压共、扶蒋反共的

一面。就苏联而言,它既有同情和支持中共的一面,又有重蒋轻共、支蒋限共的一面。针对美苏对中共政策的两面性,中国共产党对美苏政策中同样包含着联合与斗争两个方面。毛泽东指出,“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①。在这里,斗争只是手段,团结才是目的。如果只看见美苏对华政策中积极的一面,忽视其消极的一面,采取“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政策,就不能保持中共的独立自主的地位,也不能达到团结抗日的目的。反之,如果只看到美苏对华政策中消极的一面,忽视其积极的一面,采取“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政策,同样达不到团结抗日的目的,反而会失去国际统一战线。

在具体执行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方针时,中国共产党根据美苏的不同情况,采取了分别对待的办法。由于苏联毕竟是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从总体上是愿意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共产党对苏联主要是采取联合政策,尊重苏联的意见,重视与苏联的友谊,支持苏联的正义事业。但是另一方面,对苏联明显脱离中国实际、损害中国革命根本利益的错误主张和做法又进行了坚决抵制,独立自主地处理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和斗争。虽然美国在国际利益上与日本存在着冲突而成为反法西斯国家,在抗日和民主问题上与国民党存在矛盾,与中国共产党存在共同利益而主张国共合作,联共抗日,但美国在本质上仍是帝国主义国家,其根本目的是诱使中共交出军队和政权,最终控制国共两党,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因此,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把美国看做援助中国抗日,牵制国民党投降反共、独裁内战政策的一支重要力量,而与其进行政治和军事上的合作;另一方面,又对其推行扶蒋反共政策进行揭露和斗争,对其干涉中国内政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5页。

的危险性保持警惕,随时准备应付最困难、最严重的局面。所以,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是联合与斗争相结合,根据具体情况,时而以联合为主,时而以斗争为主。

中国共产党在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时还十分注意把握斗争的度,即以不破裂国际统一战线、损害中国革命利益为底线。对美国,中国共产党对其反共政策的斗争和批评虽然有时是非常尖锐和激烈的,但都严格遵循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毛泽东也时常提醒全党在对美蒋斗争中要留有余地、讲究策略,“只要它是打日本,我们就愿意同它合作”^①,除非它“公开全面地赞助国民党实行内战独裁”^②,我们不应和它弄僵。中国共产党对美国斗争的目的是促使它改变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以防止和推迟内战的爆发。对苏联,中国共产党在抵制其错误干预和摆脱其束缚的同时,十分注意维护与苏联的亲密关系,往往在一些不损害中国革命根本利益的问题上作出必要的妥协和让步。实践证明,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联合美苏时坚持原则,在开展斗争时掌握界线,从而使自己在处理对美苏关系时始终掌握了主动权,不仅保持了自己的独立自主的地位,而且有力地促进了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发展。

(五) 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促进中国革命的发展

马克思曾经强调指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③。这就是说,追求利益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动因。在国际关系中,国与国之间的冷热亲疏、国际力量的分化组合、国际格局的急

①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02页。

②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66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7页。

剧变化,无一不是国家自身的民族利益在其中发生作用的直接结果。外交作为内政的延伸,是为国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其根本宗旨就在于在国际社会中最大限度地谋求和发展本国的民族利益。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实施对美苏政策时除了依据对国内外形势的分析外,就是依据中华民族和中国革命的现实利益。因此,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为中国革命的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实施对美苏政策的主要目标和根本目的。

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是中国共产党对美苏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在中国社会各派政治力量中,只有中国共产党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具有远大的眼光和崇高的理想,它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利益的忠实代表,而且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利益的忠实代表,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中国其他党派和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一个显著特点和优点。毛泽东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华民族的最大利益就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外国干涉中国内政,实现中华民族独立。但是,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这一时期,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相互交织,国内斗争与国际斗争相互制约,认清民族利益固然重要,真正摆正党派利益与民族利益的关系更为重要。为此,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处理国内关系和国际关系的两条基本原则:一是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是一致的,“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着抗日)为出发点”^②。二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是一致的,“爱国主义就是国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9、109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9页。

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①。在这两条基本原则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的对美苏政策自始至终都是围绕着一个主题,即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抗日战争初期,中共倡导建立国际反法西斯战线,采取联苏抗日、拉美抗日政策,体现了以民族利益为重的外交原则。抗日战争中期,中国共产党把“过去采取慕尼黑政策危害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和目前放弃这个政策改为赞助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加以区别”,采取联美抗日政策,其直接目的是战胜日本侵略者,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抗日战争后期,针对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中国共产党采取联苏防美政策,警告美国“不要使自己的政策违背中国人民的意志”,也是为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着想的。不过,应当指出,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利益的认识上也曾一度出现过偏差。这集中体现在对《苏日中立条约》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态度上,只根据这两个条约所具有的和平性质就加以拥护,而没有指出其损害中国主权的民族利己主义的实质。总的来说,瑕不掩瑜,中国共产党对美苏政策是把民族利益放在首位,以捍卫民族利益为目的的。正如曾多次与毛泽东长谈的谢伟思所说:“毛的外交思想不是以政治观点为基准。他的外交思想是以中国的民族利益为出发点的,同时毛也认为任何国家的对外政策都是从本国利益出发的。”^②

促进中国革命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对美苏政策的根本目的。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革命发展极其重要的两个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与中国革命的根本任务是完全一致的,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实现民族独立,是中国共产党新民主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1页。

② 安德森:《延安与列强: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起源(1944—1946)》,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页。

主义革命的奋斗目标。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高利益的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制定和实施对美苏政策时不能不着重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借用国际力量促进国内政治民主化进程，变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使中华民族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制定对美苏政策时，一切以是否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作为判断是非、决定取舍的标准，实际上也就是以是否有利于促进中国革命的发展为标准。对有利于中华民族利益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则积极争取，对不利于中华民族利益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则坚决抵制，不论是来自美国，还是来自苏联。联合美国和苏联，争取它们的援助，是中国革命利益的需要；抵制苏联的错误主张，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也是中国革命发展的要求。

三、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基本特征

从中国共产党对美苏政策演变的历史过程和主要内容中不难看出，它不仅包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策略思想，而且充满着辩证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相结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点。

（一）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

无产阶级革命是国际性的事业，需要各国无产阶级的互相支援，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但是，无产阶级革命又首先是一个国家的事业，只有立足于本国，把本国的革命事业搞好，才能援助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

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①列宁也曾指出：“真正的国际主义只有一种，就是进行忘我的工作来发展本国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斗争，支持（用宣传、声援和物质来支持）无一例外的所有国家的同样的斗争、同样的路线，而且只支持这种斗争、这种路线。”^②显然，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是一致的。一方面，国际主义以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搞好本国的革命斗争为基础；另一方面，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发展本国的革命斗争本身也是国际主义的重要表现。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互关系的基本原理。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既肩负着领导中国人民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中国的重任，又承担着援助苏联和世界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义务。但是，由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同，在如何处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关系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苏联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忽视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民族利益，要中国共产党牺牲民族利益去捍卫苏联利益；二是把国际主义置于苏联利益之下，打着国际主义的旗号推行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汲取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苏联利益为中心的教训，从中国抗战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正确处理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毛泽东指出：“中国是被侵略的国家。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因为只有为着保卫祖国而战才能打败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被打倒了，同时也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284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页。

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因此,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①针对有人指责中国共产党是民族主义者或不要民族利益的国际主义者,毛泽东驳斥说:“中国共产党是国际主义者,他们主张世界大同运动;但同时又是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者,为了保卫祖国,愿意抵抗日本到最后一滴血。十五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是人人皆知的事实。这种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并不冲突,因为只有中国的独立解放,才有可能去参加世界的大同运动。”^②毛泽东的论述进一步明确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辩证关系,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正确的对美苏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础。

中国共产党对美苏政策特别是对苏政策集中体现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有机统一。中国共产党在抗战爆发后就提出了用民族自卫战争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号召,随后又提出了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主张。苏德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没有盲目出兵去牵制日军、保卫苏联,而是始终立足于本国的抗战事业,量力而行,从战略上、全局上去支持和援助苏联及其他国家的反法西斯斗争。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既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又发扬了国际主义精神,对日本法西斯进行了顽强的斗争,牵制和消灭了大量日军,才使日本法西斯最终放弃了北攻苏联的企图,推迟了南进太平洋的计划,有力地支援了苏联的抗德战争,减轻了同盟国在太平洋战场的军事压力,为早日结束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无论是倡导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争取美苏援华抗日,还是积极抵制苏联的错误主张,与美国进行合作,这些爱国主义的正义行动,都是国际主义在中国的实现。中国共产党正是在保卫祖国的斗争中履行援助苏联和世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0—521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84页。

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国际主义义务的。可以说,这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把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结合得最好最完美的表现。

(二) 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相结合

由于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因此,如何处理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中国革命与国际援助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在制定和实施对美苏政策中必然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此,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方针是“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弃一切可能争取的外援”^①。

首先,中国共产党是站在中华民族前途的立场上把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相结合的。早在1935年年底,毛泽东就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但是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不要国际援助;不,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②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对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关系,作了更为明确的阐述。毛泽东认为,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战争的一部分,中国抗战需要世界人民的支援,因此,必须努力争取外援。但是,中国需要外援,并不是说没有外援中国就不能抗战。战胜日寇主要还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他说:“中国无论何时也应以自力更生为基本立脚点。但中国不是孤立也不能孤立,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的事实,也是我们的立脚点,而且必须成为我们的立脚点。”^③他强调指出:“我们的根本方针和国民党相反,是在坚持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尽可能地利用外援,而不是如同国民党那样放弃独立战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35页。

争和自力更生去依赖外援,或投靠任何帝国主义的集团。”^①“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②根据这一原则,中国共产党在制定对美苏政策时,既反对忽视或不要外援的孤立主义,竭力冲破国民党的封锁限制,主动争取美苏的援助,又没有完全寄希望于美苏援助,听任美苏的控制和摆布,而是立足于自力更生,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坚持持久抗战。事实上,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是在几乎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坚持抗战和反对美蒋的。

其次,中国共产党是站在中国革命前途的立场上把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相结合的。抗战胜利后,苏联占领东北,这客观上造成了对中国共产党有利的斗争局面。中共中央在考虑对美苏政策时最大的希望就是获得苏联的支持。但中共中央根据对美苏关系、中苏关系的分析,认为获得苏联援助的可能性很小,中国革命斗争仍要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③同时,中国共产党还根据自己的经验相信,只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才能获得国际援助,外援也才能转化为革命的促进力量。1946年7月7日,陈云在为东北局起草的《东北的形势和任务》的决议中指出,争取东北,“主要应依靠自力而不应依赖外力。只有自力更生,自立自强,自己有办法,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国际和国内各方助我之力量才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2页。

能发生作用。……否则就是不可靠的,是危险的”^①。实践证明,任何外援都只能是起辅助作用的外因,中国革命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广大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革命能量,唯有依靠广大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中国革命才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战后对美苏政策,从联合苏联到中立美国,再到反对美国,都是建立在依靠自己力量,依靠组织起来的中国广大民众的基础上的。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历史的转折关头,才有力量、有勇气抵制来自国际上的压力和恫吓,冲破大国体系的束缚,根据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推动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但是,中国共产党也十分重视外援的作用,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离不开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对此,毛泽东明确指出:“‘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这是错误的想法。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②

(三)求同存异与区别对待相结合

没有共性就没有统一,没有差异就没有斗争,任何统一战线都是充满着矛盾运动的统一体。由于中国共产党与美苏之间既有在共同目标下联合统一的一面,又有因利益差异存在冲突和斗争的一面,因此,坚持求同存异与区别对待相结合的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对美苏政策的重要前提。

所谓求同,就是要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要求、共同的目标,这是团结和联合的基础。任何国家与国家、阶级与阶级、政党与政党之间的联合都是以存在的共同的利益关系为基础的,没有共同利益也就

① 《陈云文选(1926—1949)》,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3—1474页。

没有联合。国际统一战线就是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国家和政治集团,在反对法西斯侵略的共同目标下而结成的联合体。求同,在不同历史时期、同一时期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内容。在战时,中国共产党与美苏两国之间存在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共同利益,在战后存在赞成中国和平统一的共同利益。在抗日和民主问题上存在共同利益,是中国共产党与美苏联合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对美苏的合作政策正是这种共同利益的体现。所谓存异,就是允许同盟者内部存在差异,其中包括民族利益、阶级立场、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根本目的的差异等。这些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不承认差异或不允许存在差异,就不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在制定对美苏政策时,对共同利益的认识是非常明确的,始终做到了求大同,存小异,既没有因为苏联重蒋轻共甚至支蒋限共而改变对苏联支持、联合的立场,也没有因为美国扶蒋压共而放弃与美国的合作。

但是,求同存异并不是不加区别。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中国共产党对美苏政策还贯穿着区别对待的方针。中国共产党在制定对美苏政策的过程中,始终是将资本主义的美国与社会主义的苏联相区别,把同情、支持中国抗日的美国与坚持侵略中国的日本相区别,把苏德战争前主张绥靖日本的美国与苏德战争后援华抗日的美国相区别,把抗战时期援华抗日的美国与内战爆发后援蒋反共的美国相区别,把美国政府与美国人民相区别,把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者与不决定政策者相区别。其中,把美国与苏联相区别,是中国共产党联苏防美政策的基础;把美国与日本相区别,是中国共产党联美抗日政策的基础;把美国政府与美国人民、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者与不决定政策者相区别,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对美斗争时没有采取笼统反美政策的重要依据;把援华抗日的美国与援蒋反共的美国相区别,是中国共产党最终走上与美国全面对抗道路的前提。正是由于有了这些区

别,才有中国共产党对美苏不同的政策,才有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美苏政策的调整 and 变化。

求同存异与区别对待相结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美苏政策的开放性和多层次性。其开放性表现在:无论是姓“资”还是姓“社”,也无论信仰如何,只要赞助中国抗日和民主,不赞成国民党独裁内战,中国共产党都愿与其合作。其多层次性表现在:由于存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不同的利益追求,中国共产党对苏政策是根本的,对美政策是次要的;对苏政策是一贯的,对美政策是易变的。中国共产党对美苏政策的开放性和多层次性,说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善于独立自主地制定自己的对外政策,能够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根据中国革命的需要而不是某个大国的态度如何来推进中国的革命事业。这些正是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对美苏关系时能够做到随机应变、游刃有余的重要条件。

(四)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

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的辩证统一,是建立和发展对美苏关系的必要条件。在国际政治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与美苏之间在实力和地位上悬殊,加上国民党又垄断了中国的外交大权,这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与美苏关系有关的许多问题上往往不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共产党不能坚持原则,那就没有自己的应有地位。同样,如果中国共产党不能保持策略的灵活性,就不能巩固和发展与美苏的关系。

在制定和实施对美苏政策中,中国共产党坚持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高度统一。首先,坚持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和处理对美苏关系的前提和基础,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肩负的历史使命所决定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对美苏关系时,凡是涉及重大原则和大是大非的问题,历来都态度鲜明,坚定不移,决不妥

协和让步。这一点在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中和重要历史转折关头表现得最为明显。如皖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共行为决不轻言让步、委曲求全;在抗战胜利前后,中国共产党坚持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坚决反对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人民解放战争转入进攻后,中国共产党坚定地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彻底、干净地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显然,如果中国共产党放弃原则,一味妥协,必然会损害中华民族和中国革命的根本利益。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对外政策上形成了一些基本原则,如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独立自主地处理国内外事务、反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国际合作不以意识形态划线、开展合作不忘斗争等。抗战胜利前后中国共产党的外交实践活动已证明这些原则是正确的。

与此同时,在不损害中华民族和中国革命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又非常重视策略的灵活性,往往能够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采取灵活变通的途径、方式和方法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甚至在必要时,作出一些妥协和让步,以求得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法。如战后初期,中国共产党接受苏联的建议,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接受马歇尔的调停,同国民党进行停战谈判;在争取东北的斗争中,采取中立美国的政策等。这些都是策略的灵活性的具体运用。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与赫尔利的谈判斗争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生动体现和光辉范例。早在赫尔利来延安同中国共产党谈判之前,毛泽东就预见到赫尔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以国民党的微小让步来换取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妥协,使国民党获得“救命的大益”^①。

^①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55页。

因此,在谈判过程中,一方面,在建立联合政府这个根本原则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毫不含糊,决不让步,毛泽东对赫尔利带来的方案逐字逐条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又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除了拒绝牺牲联合政府和民主原则外,其他一切都可以谈判和商量。据此,中国共产党在接受蒋介石作为抗日领导,中国共产党军队接受全国军事委员会的统一指挥和美援物资的分配方面均作了让步。中国共产党坚定的原则性和灵活务实的态度,促使赫尔利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的意见。对此,中国共产党也给予了积极评价。但是,当赫尔利背弃诺言,转而支持蒋介石要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和政权的三点反建议,并企图以美国的援助为诱饵和苏联支持国民党为压力,劝说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妥协时,毛泽东不为所动,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决不会在这个问题上让步,因为“我们不能被反绑着双手去战斗”,并且,“我们不像蒋介石,我们并非必须要别的支持。我们能够挺立着,像自由的人们一样自由地行走”^①。毛泽东同时还表示,除了联合政府外,其他问题都好商量,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与美国合作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这种一张一弛的斗争艺术,不仅使赫尔利“没有苏联的支持,中国共产党终将成为一个政治党派参加国民政府”的预言成为泡影,而且有利于扩大美蒋矛盾,赢得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抗日和民主斗争的同情和支持。

四、中国共产党发展和处理对外关系的历史经验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外国势力

^① [美]包瑞德著,万高潮等译:《美军观察组在延安》,战士出版社1984年版,第94、95页。

干涉中国内政,争取中华民族解放和中国革命胜利这一基本目标出发,在与美苏的接触和交往过程中,制定和实施了正确的对美苏政策,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对美苏关系的新局面,加快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虽然,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外交只是“半独立的外交”,与美苏的接触范围有限,一些政策还带有时代的烙印,但是,当我们翻阅历史档案,追溯中国共产党在对外关系上留下的历史轨迹时,深深感到它们为我们留下的不仅仅是历史的真相,更多的是值得深思和借鉴的历史经验。

(一)独立自主

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在制定和实施对美苏政策时坚持的首要原则和基本立场。中国共产党在制定对美苏政策时特别强调独立自主,这是深刻总结中国外交和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结果。在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百年的外交史上,在如何对待外国问题上,存在着“排外”和“惧外”两种错误倾向,要么盲目排外、闭目塞听,要么崇洋媚外、妄自菲薄。正是这两种错误倾向,直接导致了中国外交的屡次失败。在中国革命史上也曾有过放弃独立自主,盲目服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导而使革命事业惨遭失败的教训。因此,能否坚持独立自主,是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利益和中国革命成败的重要问题。

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制定对美苏政策、发展和处理对美苏关系时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二是国民党的封锁限制,三是美苏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中国共产党对美苏政策的内容和目标归结到一点,就是反对日本的侵略和反对美苏的干涉。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共产党坚定地站在民族立场上,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既不依附也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国际国内事务。具体表现在:对苏联,一是从思想上对来自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进行了

有效的清算和克服；二是在政治上对苏联和共产国际不切合中国实际的错误指示进行了积极抵制；三是在军事上拒绝了苏联要中国共产党盲目出兵援助苏联的要求；四是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拒绝了苏联要中国共产党交枪妥协和不要过长江的劝告。对美国，一是不依赖美国的外援，自力更生地开展抗日战争；二是顶住美国的政治和军事压力，坚持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三是坚决揭露和反对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维护国家主权和革命利益；四是不怕美国的恐吓，坚决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由于坚持了独立自主，既寻求合作又反对外来干涉，既争取外援又不依赖外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不但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实施对美苏政策的主要经验，是中国共产党自主外交与国民党屈辱外交的根本区别所在。其内容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中国共产党的内外政策由中国共产党自己做主，根据国内外形势和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态度和立场，不容许外国有任何干涉；（2）站稳民族立场，坚持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对任何大国、强国都不准有奴颜婢膝、卑躬屈节的表现；（3）坚持自力更生，不依赖任何外国；（4）尊重别国，不损害别国的主权和利益；（5）坚持合作与斗争相结合的方针，该合作时就合作，该斗争时就斗争。这些内容是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和毛泽东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历史证明，中华民族的独立不可能靠外国恩赐，中国革命的胜利也不可能由外国包办。自立自强，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才是争取中华民族解放和中国革命胜利的唯一出路。正是坚持了独立自主，才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真正的外交历史，才有了后来中国革命的彻

底胜利。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站在新的历史高度来审视这段历史时,明确指出:“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①在对历史进行反思的基础上,邓小平得出结论,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②可以说,这是必然结论。

(二)平等互利

平等互利是中国共产党处理与美苏关系的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策略并不是一厢情愿,而是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反对法西斯侵略,维护世界和平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它既符合中国抗战和中国革命的利益,也符合美苏的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中国共产党需要美苏的援助,美苏也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配合。正是这种符合双方利益需要的共同点,才促成了国际统一战线的建立。在国际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主张国家不分强弱,政党不分大小,阶级不论信仰,都应互相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首次明确地把平等互利规定为中国共产党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之一。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版,第319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版,第3页。

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①

平等意味着双方互不歧视、平等相待,这是合作的政治前提;互利意味着相互帮助、双方受益,这是合作的必然结果。中国共产党在与美苏的交往中从一开始就摒弃了意识形态的色彩,主张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合作应当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在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和赫尔利、马歇尔调处国共关系期间,中国共产党对美国采取了积极配合的态度,从政治到军事都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合作。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向美国提出了给予军事援助和贷款的要求。但是,美国始终没有在政治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提供援助,反而企图控制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便毅然中断了与美方的外交来往。合作是以互利为条件的,互利是以平等为基础的,没有平等,只能是一方得利,一方受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合作。中国共产党与美国之间的关系由合作走向对抗,其中固然有国际国内局势因素的影响,但美国缺乏平等互利的精神,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毛泽东后来深刻地指出:“无论是人与人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都必须是互利的,而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如果一方受到损害,合作就不能维持下去。”^②

坚持平等互利就必须反对大国主义、大党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与美苏之间实质上是一种不平等关系,合作往往是单向的。因此,要实现真正的平等互利,就必须以实力作后盾,必须靠斗争去争取。中国共产党对美苏政策之所以能取得显著成效,根本原因在于她没有寄希望于美苏的恩赐,而是始终注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4—1085页。

②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页。

重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军事力量,注重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有了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实力,对外政策才有分量,外交斗争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如果没有一定的实力作后盾,就不可能有苏联对中国共产党争取东北斗争的支持,就不会有美国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中国共产党也就不敢理直气壮地抵制和反对美苏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预,也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平等地位。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实施对美苏政策的历史表明,在国际关系中,只有坚持平等互利原则,才能促进相互之间的团结与合作,只有不断增强自己的综合实力,才能享有真正的平等地位。

(三) 利用矛盾

利用矛盾,中立次要之敌,集中力量孤立和打击最主要的敌人,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重要策略原则,也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实施对美苏政策的重要经验。由于中国是由几个西方大国共同侵略和支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它们在中国存在着不同的利益关系,彼此之间既相互勾结,共同攫取中国的种种权益,又相互争夺,为扩展自己的势力而排斥他国,这在客观上为中国共产党利用它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在外交上纵横捭阖创造了条件。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国际统一战线主张,其思想基础就根源于对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矛盾的认识和分析。毛泽东认为,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差不多一百年以来,中国之所以还保持了一种半独立地位,这不仅是中国人民长期反帝斗争的结果,而且是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的斗争”^①。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使日本与英美等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这“对于革命的人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148页。

民却是有用的”^①。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共产党制定对外政策的历史经验时,第一次提出了对各种国际势力区别对待的方针,并将党的对外政策的策略原则概括为“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②。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将利用矛盾这一策略原则运用于处理对美苏关系之中。由于受各自利益的驱动,在国共美苏“三国四方”关系中,美国与苏联之间、美国与国民党政府之间、苏联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甚至美苏内部都存在着矛盾和分歧。美苏两国在中国问题上有着妥协的一面,但更多的是争斗。美国与国民党政府之间在反共问题上有一致的一面,但在抗日、民主、和平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矛盾。苏联与国民党政府之间在接收东北问题上有一致又有分歧。在对华政策上,美国既扶蒋反共又不愿中国发生内战,苏联既支持国民党统一中国又不愿看到美蒋勾结、独占中国。在这些矛盾中,中国共产党一直是把苏联看做制约美国的一支重要力量,又把美国看做制约国民党反共内战政策的一支国际力量。为了集中力量开展对蒋斗争,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了美苏之间、美蒋之间、苏蒋之间一切可以利用的矛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国民党的反共内战倾向,发展和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减少了在国内斗争中面临的困难。当赫尔利、马歇尔在调处国共关系初期赞同以联合政府方案来解决中国政治民主化问题时,中国共产党不仅给予了积极配合,而且做出了必要让步,通过美国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实现了在国共斗争中中立美国,防止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目的。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还曾提出过让苏联也参与调停,以便牵制美国的设想。当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4页。

苏联与国民党政府和美国在东北问题上发生利益冲突时，中国共产党充分照顾苏联外交斗争的需要，主动调整战略方针，从而抢先进入东北，建立了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善于利用矛盾，为我所用，是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不断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处理对外关系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一条不可或缺的战线，还发挥着配合和推动军事战线斗争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并且在战后短短几年内迅速夺取中国革命胜利，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坚持独立自主地开展斗争，并成功地利用了美苏、美蒋、苏蒋之间一切可以利用的矛盾。

（四）讲究策略

外交工作本身就是一门充满了斗争艺术的科学。外交活动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娴熟地运用外交策略。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国际国内斗争复杂多变，要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争得一席之地，在外交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学会恰当、灵活地运用外交策略。当时，中国共产党首次登上国际政治舞台，又是与美国和苏联这样的世界大国打交道，外交经验明显不足，但她非常注重外交策略的学习和运用。为了在对外关系中争取主动，使国际力量有利于中国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把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些策略原则运用于处理对美苏关系，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些策略原则主要有：既坚持原则，又善于妥协；又联合又斗争；利用矛盾，各个击破；求同存异，区别对待；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等。比如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的关系，是否进行合作，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合作，在合作中如何开展斗争，斗争的矛头对准谁，斗争到什么程度，中国共产党都依据客观形势的变化经过周密考虑，恰当地掌握了合作与斗争的分寸和火候。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争夺东北的斗争中,外交策略运用之巧妙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当时,美国扮演着调停者的角色,它企图利用自己的实力和地位,通过和谈帮助国民党稳固在全国的统治。苏联虽然同情中国革命,但它受中苏条约的限制,不愿也不敢公开支持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既有美国的大力援助,又得到了苏联的公开支持。在这种不利的国际态势下,中国共产党既要反对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又要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既要寻求苏联的支持和援助,又要冲破苏联的限制,发展和壮大自己,外交策略的巧妙运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此,中国共产党在对美关系上采取了缓和与美国关系、防止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中立美国的策略,在对苏关系上采取了体谅苏联外交处境、充分利用中苏条约可利用之处的斗争策略。可以说,如果没有灵活的外交斗争策略相配合,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中立美国,抑制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进攻。同样,如果没有正确的外交策略作保障,中国共产党也不可能取得苏联一定程度的支持和援助,改变自己的被动局面。中国共产党最终能够争取到东北,与外交策略的灵活运用显然是分不开的。

策略从来都是为一定的政治目标服务的,在对外关系中讲究策略,其意义绝不仅仅限于外交关系本身,它可以有效地配合政治和军事战线的斗争,有利于扩大自己的国际影响,争取更多的同情和支持,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劣势中求得主动。应当说,讲究策略,这是中国共产党处理对美苏关系时取得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是中国革命能够迅速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

五、中国共产党发展和处理对外关系的历史意义

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对美苏关系是中国革命这部伟大史诗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的转折年代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从

闭塞走向开放,从农村走向世界,以至于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就在于她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顺应了时代潮流,抓住了历史机遇,制定了正确的对外政策,采取了灵活的外交策略,独立自主地开展了与美苏的联系与合作,从而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世界的和平进步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因此,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在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史上,在中国外交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一) 中国外交从屈辱走向自主的开端

中国是世界文明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也是开展对外交往最早的国家之一。外交,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曾经有过辉煌的记录,上起汉唐盛世,下止清朝康乾年代,中外交往连绵不断,高潮迭起。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永载史册的郑和下西洋,是古代中国开展对外交往的成功范例。虽然这些还不是近现代意义上的外交活动,只是封建王朝借以向外炫耀其强盛和声威的手段,但它对于促进中国历史发展和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起了积极作用。

然而,到了近代,伴随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和中国封建王朝的衰落,中国外交开始与丧权辱国相联系。外交也不再是封建王朝的政治附属物,而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侵略者依靠船坚炮利敲开了古老的中国大门。从此之后,一个个不平等条约接踵而至,华夏大地被践踏得满目疮痍。中国的领土被鲸吞蚕食,主权惨遭蹂躏,外交被人把持,一个拥有数万万人口和辽阔疆域的泱泱大国被贬称为“东亚病夫”。中国的统治者虽然也曾展开过一系列的外交活动,但无一不是以丧权辱国而告终。“落后就要挨打”、“弱国无外交”这些至理名言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一再得到充分的印证。正如周恩来所指出:“中国的反动分子,在外交上一贯是神经衰弱怕帝国主义。清朝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

凯,国民党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倒在地上办外交呢?中国一百年来
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①

在近代中国,中国人民对不平等的最强烈感受是外交受制于人,国家没有主权和尊严可言,中华民族蒙受耻辱。从鸦片战争开始,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武力恫吓和外交讹诈,中国的清王朝统治者虽然也曾经进行过一定的抵制,但为了苟延残喘,维护自身统治,最终在攘外与媚外之间选择了后者,奉行“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外交政策,甘愿充当“洋人的朝廷”,中国沦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国家。当历史进入20世纪时,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辛亥革命一举摧毁了清王朝的统治,但随之而来的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依旧奉行投降卖国的对外政策,玩弄“以夷制夷”的传统外交手腕,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预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日益加强,中国人民遭受列强欺凌,中国外交受制于人的局面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即使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作为反法西斯侵略的同盟国和“四强”之一,依然遭受列强的歧视,中国主权常常成为大国之间秘密交易的筹码。中国所谓的大国地位和废除不平等条约只是徒有虚名。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晚清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中国外交在本质上都是屈辱外交。

国破山河在,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一百多年来,一向自强不息的中国人民为抵御外侮,争取民族独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从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的“自强求富”,从太平军的“太平天国”到义和团的“扶清灭洋”,从戊戌维新的“变法图强”到辛亥革命的“民主共和”,一批批仁人志士、一个个政治派别前赴后继,苦苦寻觅救国图强的计。尽管囿于阶级和时代

^① 《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5页。

的局限,他们的动机和手段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要改变中国的屈辱地位,让中华民族平等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正是有了他们的顽强斗争,我们的国家、民族才历尽劫难而不死,屡遭侵略而未亡。然而,历史给我们留下的不是成功的喜悦,而是血腥的悲壮,中国人民始终没有将帝国主义侵华势力赶出神州大地,中华民族始终没有摆脱屈辱的地位。残酷的历史现实表明,中华民族要获得独立与尊严,中国外交要摆脱屈辱与困境,就需要有新的政治力量、新的领导集团、新的指导思想,在新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中,重新塑造中国的对外关系。这个新的政治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历经数代人为之奋斗而未能实现的独立、平等的强烈愿望,在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解放的急先锋,是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统治、废除不平等条约、争取中华民族完全独立这一主张的首倡者和矢志不渝的坚持者。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全心全意地致力于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恢复中华民族在国际上的应有地位和尊严。从五卅运动到北伐战争,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站在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最前列。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华民族空前觉醒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带领全国人民武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同时,又开辟了抗日外交战线,独立自主地开展与美苏的交往和斗争。在对外交往中,与国民党妥协让步、苟且偷生、逆来顺受不同,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放在首位,对任何国家都绝不奴颜婢膝,唯命是从,坚决反对外国干涉中国内政,反对大国主义和强权政治,主张独立自主,平等相待。中国共产党鲜明的外交立场,赢得了世界各国的重视。虽然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执掌国家政权,外交还处于探索时期,但从中国共产党对美苏政策的内容和对美苏的立场中,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共产党对美苏关

系史也是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历史,中国近百年的屈辱外交正是从中国共产党开始摆脱困境,逐步走上自主道路的。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周恩来代表中国人民向全世界郑重宣布独立自主为新中国的基本国策。毛泽东指出:“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①周恩来也指出:“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我们愿意和一切以平等待我之国家合作。我们不排除外,不挑衅,但必须站稳立场,否则就只能倒在外国人的怀里。”^②从此,中国外交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二) 中国革命史上最为重要和成功的外交实践活动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诞生以来,就以反对帝国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独立为己任。中国共产党不仅提出了基本的反帝主张和具体斗争目标,而且积极投身于反帝爱国运动之中。但是,在抗日战争以前,中国共产党由于自身的幼稚和弱小,没有真正独立地处理过与外国的关系。在国民革命期间实行的是国共合作,实际上是以国民党为主。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处于被封锁隔绝的状态,党内又是“左”倾关门主义占统治地位,就连获取外部信息都受到极大限制,更谈不上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了。在这两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只是机械地照搬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对世界、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比较片面和肤浅,还谈不上有具体的对某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更没有具体的外交实践活动。当时,中国共产党对外联系的主要渠道是共产国际,联系的主要对象是苏联,而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之间又是上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5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1、322页。

下级关系,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只能无条件地执行,也就不存在所谓对外关系问题。中国共产党虽然也提出了一些关于对外关系的基本主张,如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废除不平等条约、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等,但这些主张还停留在理论宣传的层面上,并没有反映在具体的外交实践上,它只是在推动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方面发挥间接的外交作用。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战争风雨的锤炼下逐步地从幼年走向成熟,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独立自主地制定自己的内外政策。在对外关系上,最能体现中国共产党成熟的就是对美、对苏政策了。美苏是当时对中国有重大影响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大国。同时,美苏对华政策又与中国抗战和中国革命前途息息相关。因此,能否处理好与美苏的关系问题,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并不是一次单纯的外交活动,它涉及思想观念的根本转变、外交策略的巧妙运用、斗争方式的灵活多变等一系列问题,是对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是否成熟的一次全面检验。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是中国共产党在对外关系上最为活跃的时期。中华民族的空前觉醒、美苏等大国在中国的利益冲突,为中国共产党在外交上发挥重大作用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国共产党妥善地处理了对美、对苏关系。在美国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恪守独立自主的原则,对其抗日和民主的一面,求同存异,积极合作,对其反共的一面,则针锋相对,坚决斗争。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与美国政府的代表进行了正式接触,双方关系两次经历了由合作到失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抗战后期和战后初期,中国共产党不为美援的诱惑所动心,不惧怕美国的政治压力和军事恐吓,没有交出军队和政权,从而避免了中国重新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老路上。对于苏联,中国共产党一方面积极拥护苏

联的和平外交政策,另一方面又不盲目追随和屈从,在竭力争取苏联的支持和援助的同时,既发扬国际主义,又注重维护中华民族和中国革命的利益,大胆地冲破苏联的约束和限制,最大限度地保持自己在内政和外交上的独立性。

最成功的外交是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成果。由于正确处理了中美苏关系,为中国革命的发展赢得了—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人民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中国共产党不仅成为国内政局中—支决定性的力量,而且成为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重要政治力量。从此以后,任何大国在制定对华政策时都不能不把中国共产党这一因素考虑在内,任何大国都不再可能操纵中国的革命运动,左右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国共产党在对外关系中的崛起和发展,是中华民族从软弱走向强盛的重要标志。

(三)为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培养了人才和积累了经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从—个在野党、非法政党、革命党成为全国性的执政党,党的对外政策以国家意志的形式升华为国家的外交政策,党的对外关系主要通过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体现出来。随着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关系的建立,新中国迫切需要尽快向世界各国派出驻外使节,因而对外交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新中国是在几乎完全空白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之所以能够很快适应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在外交战线上纵横捭阖,迅速打开中国外交的新局面,是与民主革命时期在与美苏打交道过程中培养了大批外交人才分不开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以至于之后很长时期内我国外交战线上的许多人才和领导干部都是这一时期培养出来的,特别是周恩来,长期站在外交战线的最前沿,在与美苏的接触和谈判中表现出非凡的斗争艺术和纯熟的驾驭局势的能力,带领出—支政治素质过硬、业务素质精良、斗

争艺术高超的外交队伍,不仅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为开创新中国外交新局面建立了不朽功勋。

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在走向世界和反对外来侵略与干涉的过程中,在发展和处理与美苏等大国关系的过程中,一方面阐明了自己对国际关系的基本观点,如关于战后世界仍将存在矛盾和斗争的思想,关于战争危险依然存在、克服和制止战争危险是可能的思想,关于美苏之间存在着辽阔的“中间地带”的思想,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思想等;另一方面还逐步形成了一系列处理对外关系和制定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和经验,如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平等互利、相互合作,利用矛盾、团结多数,坚持原则、讲究策略等。这些思想和经验虽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其内涵发生了新的变化,但其基本精神一直在指导着中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对外关系的发展,对未来中国外交产生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

(四)奠定了新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

1949年9月29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通过了新中国的临时宪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了新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它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主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其具体政策是:“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各项条约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

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①这就是毛泽东用简洁、形象的语言所概括的“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大外交方针。这三大外交方针构成了新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框架。它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新中国外交与旧中国屈辱外交实行彻底的决裂,在相互尊重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各国人民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二是新中国外交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维护世界和平。

新中国三大外交方针的提出不是偶然的,而是以一定的历史和理论为基础的,是对民主革命时期,主要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实施对美苏政策的经验总结。早在1938年10月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曾指出,我们所要建立的国家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国家。它是一个独立国,它不受任何外国干涉,同时也不去干涉任何外国”。“同时,无论它强盛到什么程度,决不把自己变为帝国主义,而是以平等精神同一切尊重中国独立的友邦和平往来,共存互惠。”^②在1945年中国共产党七大上,毛泽东又详细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以独立自主、平等互利、维护世界和平为核心内容的外交政策。毛泽东所提出的中国“不受任何外国干涉”也不“干涉任何外国”、“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以及保持世界和平等思想,不仅对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关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而且奠定了未来新中国外交的政策基础。虽然当时中国共产党尚未进入真正的外交时代,她所处理的对外关系还不是完全意义

① 许崇智主编:《中国宪法参考资料选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13.5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33—634页。

上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但她所确立的对外政策的指导原则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和指导意义,与新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有着直接的联系。可以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美苏政策是新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渊源所在。

新中国三大外交方针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在新形势下的延续和具体运用。所谓“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新中国要在新的基础上,即按照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完整和平等互利的原则,通过谈判与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只有与旧的外交关系一刀两断,不受过去的屈辱外交传统的束缚,才能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在政治上真正实现独立自主。所谓“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是不急于与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在与它们建交之前,先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残余势力及其影响。这一方针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鲜明立场,是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又一具体体现。所谓“一边倒”,就是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但是,“一边倒”不是倒向苏联的怀抱,成为苏联的附庸,而是从当时国内形势和世界政治格局的现实情况出发,在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上,加强中国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系,站在世界人民一边。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一边倒”并没有背弃独立自主的原则。

新中国成立近60年来,中国外交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高举和平与发展的旗帜,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周边环境国际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得到进一步恢复和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威望显著提高;中国积极参与多边外交活动,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这一切成就的取得固然是中国政治稳定、经

济繁荣、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结果,但也与中国共产党始终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有着密切关系。应当说,没有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就没有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大国外交地位。

主要参考书目

-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 3.《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 4.《毛泽东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5.《毛泽东文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3、1996年版。
- 6.《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 7.《毛泽东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
- 8.《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 9.《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 10.《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 11.《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 12.《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
- 13.《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 15.《陈云文选（1926—1949）》，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 16.《彭真文选(1941—1990)》，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17.《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 18.《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 19.《中央文件汇集》(1943—1947)，中央档案馆1959、1960年编印。
- 2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992年版。
- 21.《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上、下卷，档案出版社1984、1986年版。
- 22.《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
- 23.《六大以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 24.《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
- 25.《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 26.《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
- 27.《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
- 28.薛衔天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45—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 29.《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 30.王铁崖主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
- 31.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 32.《毛泽东年谱(1893—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 33.《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9 年版。

34. 王德贵等编:《八·一五前后的中国政局》,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35.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

36.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

37. 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38. 陶文钊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年版。

39. 崔奇主编:《周恩来政论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3 年版。

40. [苏]瓦·崔可夫著,万成才译:《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新华出版社 1980 年版。

41. [德]奥托·布劳恩著,李逸六等译:《中国纪事(1932—1939)》,现代史料编刊社 1980 年版。

42. [苏]彼得·弗拉基米洛夫著,吕文饒等译:《延安日记》,现代史料编刊社 1980 年版。

43. [美]约瑟夫·埃谢里克著,罗清等译:《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9 年版。

44. [美]邹说:《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45. [美]赫伯特·菲斯著,林海等译:《中国的纠葛》,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46. 程同祖编译:《史迪威资料》,中华书局 1978 年版。

47. 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6 年版。

48. [美]哈里·杜鲁门著,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第1—2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版。

49. [美]迈克尔·沙勒著,郭济祖译:《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50. 项立岭:《转折的一年——赫尔利使华与美国对华政策》,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

51. 王真:《没有硝烟的战线——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外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52.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

53. 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54. 罗志刚:《中苏外交关系研究(1931—1945)》,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55. [英]安东尼·艾登著,武雄等译:《艾登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

56. [美]伊·卡恩著,陈亮等译:《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57. [美]冈瑟·斯坦著,马飞海等译:《红色中国的挑战》,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

58. 《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59. [西]费尔南多·克劳丁著,廖东等译:《共产国际、斯大林与中国革命》,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

60. 杨云若等:《中国革命与对外关系》,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61. 王真:《动荡中的同盟——抗战时期的中苏关系》,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62. 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63. 《周恩来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

64. [美] 哈里曼、艾贝尔著，南京大学历史系英美对外关系史研究室译：《特使——与丘吉尔、斯大林周旋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8 年版。

65. 袁明、[美] 哈里·哈丁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66. [美] 伊·卡恩著，徐隋林等译：《毛泽东的胜利与美国外交官的悲剧》，群众出版社 1990 年版。

67. 《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 1、2 辑，重庆出版社 1986、1988 年版。

67. 《新的视野——中美关系论文集》，第 3 辑，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68. 汪熙主编：《中美关系史论丛》，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69. 刘德喜：《延安时期毛泽东外交战略》，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

70. [美] 包瑞德著，万高潮等译：《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 1984 年版。

71.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文集》，下卷，《抗日外交》，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6 年版。

72. [美] 谢伟思著，王益等译：《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73. [美] 罗伯特·达莱克著，伊伟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华政

策(1932—1945)》，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74. 吴东之主编：《中国外交史(1911—1949)》，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75. 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76. [美]巴巴拉·塔奇曼著，陆增平译：《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77.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78. 《战后中苏关系走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79. 《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80.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二)(三)，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

81. 王淇主编：《从中立到结盟——抗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82.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第1—2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1976年版。

83. 《胡适任驻华大使期间来往电稿》，中华书局1978年版。

84. 郭荣赵：《从珍珠港到雅尔塔——中美战时合作之悲剧》，台北中国研究中心出版社1979年版。

85. 梁敬婷：《史迪威事件》，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

86. [美]舍伍德著，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译：《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二次大战期间白宫实录》，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87. [苏]葛罗米柯、波诺马廖夫主编，韩正文等译：《苏联对外政策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88. 李嘉谷:《合作与冲突——1931—1945 年的中苏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89. 唐培吉主编:《抗战时期的对外关系》,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7 年版。
90. 杨云若:《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纪事(1919—194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91. 屠传德:《美国特使在中国》,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92. 《马歇尔使华——美国特使马歇尔出使中国报告书》,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93.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5 年版。
94. [英]琼斯等著,复旦大学外语系译:《1942—1946 年的远东》,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9 年版。
95. [美]哈里森·福尔曼著,陶岱译:《北行漫记》,新华出版社 1988 年版。
96. 《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重庆出版社 1992 年版。
97. 荣孟源:《蒋家王朝》,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0 年版。
98. 《斯诺文集》(一),新华出版社 1984 年版。
99. [南]弗拉吉米尔·杰吉耶尔著,叶周等译:《铁托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7 年版。
100. 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49)》,重庆出版社 1987 年版。
101. 尚明轩、唐宝林:《宋庆龄传》,北京出版社 1990 年版。
102. 袁克安:《斯诺在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2 年版。
103. [美]米契尔·布赖克福特著,肖东川等译:《卡尔逊与中

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5 年版。

104. 张其昀:《党史概要》,第3册,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 1979 年版。

105.《停战谈判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106. 薛光前:《八年对日抗战之国民政府》,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8 年版。

107. 周文琪、褚良如:《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1919—1991)》,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108. 黄修荣主编:《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新探》,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年版。

109. [美]肯尼斯·休梅克著,郑志宁译:《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9 年版。

110.《张治中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5 年版。

111.《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纪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

112. 孙其明:《中苏关系始末》,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113. 薛衔天:《中苏关系史》,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114.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

115. [苏]鲍里索夫著,肖东川等译:《苏中关系(1945—1980)》,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2 年版。

116.《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的文献资料选编》,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5 年版。

117.《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0 年版。

118. 师哲口述,李海文整理:《中苏关系见证录》,当代中国出版

社 2005 年版。

119. [美]卡特著,陈发兵译:《延安使命》,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4 年版。

120. 王庭科主编:《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的历史发展》,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121. 《新华日报》。

122. 《解放日报》。

123. The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24. Cordell Hull, *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 New York 1948.

125. Russell D. Buhite, *Patrick J. Hurle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ornell University 1973.

126. Charles B. McLancho, *Soviet Policy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1931-1946*, New York 1958.

127. James Reardon-Anderson, *Yenan and the Power: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 1944-1946*,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后 记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中共对美苏政策研究(1943—1946)》的基础上,在听取了部分专家和同行的意见,经过进一步搜集资料和补充修改后完成的。同时,本书又是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研究(1921—1949)”的最终成果。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是自己近几年才开始涉猎的研究领域,其资料之庞杂、头绪之烦琐,超乎我的想像。因此,当书稿交付出版社后,我并没有如释重负之感,而是忐忑不安、喜忧交加。喜的是数年寒窗、多年积累,终有所得;忧的是本书的结构是否合理、论述是否周全、逻辑是否严密、评价是否公允,还有待专家、学者和同行的评判。我深知,科学研究需要渊博的知识、扎实的理论功底,尽管自己也借鉴了相关学科的知识,积累和研究了大量文献资料,在艰苦的写作过程中,力图突破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尽自己所能提出新的见解,但受学识和水平所限还不能说完全如愿以偿。本书无论是在体系的构建、史料的选择方面,抑或在立论等方面,肯定存在着许多不足,恳请同行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我要由衷地感谢我的博士生导师罗正楷教授和硕士生导师李良

志教授。从选题、文献的搜集到写作都得到了他们的悉心指导,字里行间凝聚着他们的教诲和心血。他们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蔼可亲的性格,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我终生受益。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部分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由于篇幅所限,并未在书中一一列出,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孙金伟

2006年9月

责任编辑 蔡 瑛
责任校对 赵红利
封面设计 李健强
版式设计 胡颖君

ISBN 978-7-215-06345-7



9 787215 063457 >

定价：20.00 元